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重把乾綱握？——滿洲國帝制之成立與時人認識

Restoring the Sceptre?

The Establishment and the Acknowledgement of

Manchukuo Monarchy

黃昱翰

Yu-Han Huang

指導教授：周婉窈 博士

Advisor: Wan-Yao Chou, Ph.D.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June 2013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重把乾綱握？——滿洲國帝制之成立與時人認識

Restoring the Sceptre?

The Establishment and the Acknowledgement of Manchukuo Monarchy

本論文係 黃昱翰 君（學號 R98123010）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2 年 5 月 29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周婉窈

（指導教授）

鍾淑敏

林素宗





## 自序

滿洲國帝制這個主題的形成，起源於大學時期的一些閱讀經驗。在一些描繪戰爭的日本文學作品、漫畫、電影當中，我發現「滿洲國」的身影經常隱隱浮現其中。後來我慢慢意識到，這個臺灣教科書裡的「傀儡政權」對於日本人的歷史認識的影響超乎我的想像。在這些作品中，漫畫家川口開治的描述令我印象深刻；他將滿洲國描寫成虛幻的海市蜃樓，他還指出一件事：滿洲國始終沒有制定國籍法，於是在法律上，它其實是個「沒有國民的國家」。

多麼怵目驚心但又引人好奇的形容！在大學三年級，經由日治臺灣史的閱讀、學習經驗，我也開始接觸日本殖民帝國史的相關課題。日本殖民的經驗在臺灣留下了各種各樣的歷史遺產，深深影響了戰後至今近七十年間的歷史發展。直至今日，我們的生活仍或多或少地體現了殖民地經驗的遺絮。而在我成長、求學的這段期間，臺灣社會也歷經了劇烈變化。政治環境的轉變牽動了臺灣人歷史認識、自我認同的移轉、拉扯，而這也動搖並重新型塑了既有的國家認同。舊認同搖搖欲墜，新認同猶未成型，或許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沒有國家的國民」將會是最重要的、有待處理的歷史課題。在人心紛亂不安、各種爭議方興未艾的當下，這篇研究在某種程度上，或許也呼應了當前國家、社會面臨的種種問題吧。

這篇論文的完成必須歸功於許多師長、朋友的支持。首先必須感謝的是我的指導老師周婉窈先生。我在大學時期便修習過先生講授的課程，考入研究所後，也一直受到先生的諸多照顧、鼓勵。多年以來，周先生對我的啟發不僅在智識方面，對於我史觀、問題意識的形成亦有深遠影響；更重要的是，她也啟發我思考學術工作者應如何關照現實社會，以及歷史學與國家、社會前途的關聯。我對她的感激實非筆墨所能表示。

在就讀研究所期間，我選修了鍾淑敏先生講授的「殖民政策研究」和「臺灣總督府檔案選讀」兩門課程。鍾先生的指導對於我的研究有著極大的幫助，在他的督促勉勵下我才練就了一些日文檔案史料判讀的能力，增進了一點對於日本殖民帝國史、殖民地研究的理解；她的勉勵提點帶給我極大的收穫。我也衷心感謝林志宏先生願意擔任我的論文口試委員，並且在本文寫成前後提供了非常多寶貴的建議，也為我往後的研究課題提示了種種可能。我和林



先生此前並不熟識，但他仍慷慨地幫助、指點我這冒昧前來的後生晚輩，我在此對他致上真摯的謝意。

在求學的過程中，眾多師長的提攜、關懷令我收獲良多。感謝劉慧、秦曼儀兩位先生的信任，讓我多次擔任他們的課程助教。獲取知識固然重要，但傳遞知識的意義卻也一樣可貴，兩位老師的提點對我而言受用無窮。此外，我也感謝甘懷真、唐啟華、呂紹理、楊肅猷、吳密察、劉巧楣、黃美娥、楊典錕、顏杏如等諸位先生的指教和啟發。

同儕朋友的砥礪、協助，對於這篇論文的完成也有著極大貢獻。我尤其感謝陳榮聲、陳力航兩位學長，多次與我討論論文的發展方向、相關領域研究以及時間規劃。感謝李鎧揚、邱建智、李冠廷、李東諺、黃旨彥、傅揚、林盈君、曾寶滿、許妝莊等學長姊，在學習、研究、工作乃至於生活上的種種關心、幫助。感謝我同班的諸位學友：歐陽宣、邱柏翔、劉昱妤、王瑋筑、蘇婉婷、黃庭碩、陳冠辰，同窗的情誼是難得的，感謝你們和我一同度過了充實美好的碩士班生活，與你們的歡顏笑語和思辨交流我將始終銘記在心。同時，也特別感謝吳鴻誼在移花宴上的建議以及修訂英文摘要時的幫助。此外也請容我在此感謝幾位朋友這些年間的相互鼓勵及陪伴：林育如、鄭佩容、陳冠蓉、張瑋麟、曾沅芷。

要特別提到的還是幾位友伴：昱丞、元亨、和謙。在這杜鵑花城廝混多年，一晃眼竟也已可以「老朋友」歸類彼此。人生難得能有志同道合而相知的朋友，與你們相聚縱酒、高談闊論、共喜同愁的時光是我永難忘懷的美好回憶。而今各自的道路已在眼前開展，前途尚遠，但願情誼長存。

最後我必須感謝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在我成長的過程中給予我無限的支持和最大的理解，多年以來，他們從不干涉我的種種選擇，放任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們總是默默表達無私的關懷，卻也始終對我抱以信任。若沒有他們，我必然不會有機會、能力完成我的學業。對於媽媽，我只有無盡的感激之情，這些年來她一直關心、照顧我的生活，給了我許多智慧之言，我對她的愛實非言語所能表達於萬一。爸爸長年以來致力工作，使家庭衣食無虞，他的正直、慷慨與寬厚也是我心目中的典範。很遺憾地，他在論文撰寫期間便離開人世，無法親睹這篇論文的問世。僅將這本論文獻給他，希望他在天上能為我這微不足道的成就感到一絲欣慰。

2013 年 8 月 8 日 於臺大歷史系研究生研究室



## 摘要

滿洲國在近代東亞歷史上，是一個頗具爭議的存在。這個國家是日本軍國主義擴張的產物，是日本殖民帝國的一部份；它的國家地位始終未曾得到國際社會普遍承認，在戰後的歷史敘事中常被視為「偽」國。然而，滿洲國卻也擁有作為一獨立國家的形式和意識形態，而許多當地政治人物和復辟派遣老也參與了國家建構與意識形態塑造的過程，這使它和日本其他的殖民地有著顯著的差異。

滿洲國的形成立於 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關東軍的一批青年將校發動了這場軍事冒險行動，將張學良勢力從東北驅逐出去，並試圖整合東北各省地方勢力和復辟派，建立獨立政權。但在這個過程中，關東軍對於當地輿論走向的掌握能力相當有限；具日資背景的《盛京時報》等主要媒體對建立新國家、擁立溥儀為元首等議題的立場曖昧不明。各種跡象顯示，當地多數居民難以萌發對於新國家的認同，也難以產生對作為元首的溥儀的忠誠。

1934 年滿洲國實施帝制，溥儀登極成為滿洲國皇帝。滿洲國「王道主義」、「民族協和」意識形態強調傳統道德的恢復，是對民國的共和政體和三民主義意識形態的反動。於是王道主義的實踐，自然讓滿洲國的政治體制導向君主制政體。滿洲國帝制在理念和制度設計上兼具近代性與傳統性的特性，但對於帝制的支持者來說，溥儀作為清王朝繼承者的傳統性身份顯然更能激起其共鳴。在官方散佈的論述中，雖然始終否定滿洲國帝制與清朝復辟的關聯，但也將溥儀前清遜帝的身份與前清的歷史、政治遺產視為其正當性的來源。

滿日兩國關係的論述是日本對滿洲國實行支配的正當性來源。溥儀登極為皇帝後，於 1935 年赴日訪問，他的行程安排，以及他與日本皇族成員的互動，則可說是對滿日兩國間的權力關係架構的追認，而這種「日主滿從」的關係架構則透過傳媒的報導呈現在滿洲國人民眼前。回國後，溥儀積極介入〈回鑾訓民詔書〉的草擬，希望能藉機確立其政治權威，但這個意圖在詔書傳佈的過程中未能得遂。隨著關東軍逐漸強化對滿支配以及全面戰爭的爆發，滿洲國最終徹底淪為日本的附庸，直至它在 1945 年因日本戰敗而覆亡。

**關鍵字：**滿洲國、國體、關東軍、九一八事變、溥儀、盛京時報、回鑾訓民詔書





##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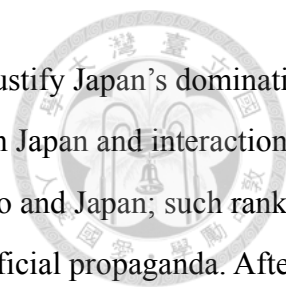


The state of Manchukuo is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modern East Asian histor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Manchukuo is usually regarded as a puppet state of Japanese Empire, a “false” state dominated by the Kwantung Army in mainstream historical narrative. Nevertheless, Manchukuo was different from other Japanese colonies for having its own form and ideology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Such phenomenon just reveals the complexity of the history and status of Manchukuo.

The Mukden Incident(九一八事變), which occurred in 1931, was the prelude to Manchukuo. Throughout the incident the Kwantung Army expelled Zhang Xueliang(張學良) and his Northern East Army, and attempted to integrate local forces to found a new state. In spite of its victories in battlefields, the Kwantung Army could not completely control mass media in Manchuria. *Shengjingshibao*(《盛京時報》), the most popular and Japanese invested newspaper in Manchuria, presented indefinite attitude on two important issues: founding a new state and supporting Puyi(溥儀) as the headman. At the same time, most inhabitants in Manchuria were deficient in loyalty and identification to newborn Manchukuo and Puyi.

As Manchukuo established its monarchy in 1934, Puyi was enthroned as the emperor of country. For a long time, Puyi and his courtiers seek to restore Qing dynasty and to rebuild traditional morality and order. Their restorable ideas affecte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y and political system of Manchukuo. Theref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nchukuo monarchy and its *Wangdao*(王道, kingly-way), *Minzuxiehe*(民族協和, ethnic concordia) ideology blended traditional and modern factors.

To ensure that Manchukuo is an independent state separating from China, the Kwantung Army and Manchukuo government must negativ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founding of monarchy and the restoration of Qing. However, official propaganda materials usually took advantage of Puyi’s status as the deposed emperor and the successor of Qing dynasty to prove the legitimacy of Manchukuo monarchy and arouse people’s loyalty and patriotism toward the country. In fact, many supporters of Puyi also recognized his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 rather than “modern” one.



The discourse of Manchukuo-Japan relation was an important basis to justify Japan's domination in Manchukuo. After enthroned, Puyi visited Japan in 1935. His itinerary in Japan and interaction with Japanese royal family members certified the rank between Manchukuo and Japan; such rank performed in front of people of Manchukuo throughout mass media and official propaganda. After the visit, Puyi had endeavored to confirm his authority by promulgating *the Edict of Instruction to Subjects after Return*(〈回鑾訓民詔書〉). In spite of these efforts, Puyi finally failed to dominate the state. As the Kwantung Army strengthened its domination, especially after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broke out in 1937, Manchukuo finally reduced to a puppet of Japan until the termination of the war in 1945.

**Key Words:** Manchukuo, state system, Kwantung Army, Mukden Incident, Puyi, *Sengjingshibao*, *Edict of Instruction to Subjects after Return*







## 目次

自序	i
摘要	iii
Abstract	v
目次	ix
圖表目錄	xi
緒論 在復國與建國之間	1
第一章 倉促成軍：從九一八事變到滿洲「建國」	10
第一節 九一八事變及其後續發展	11
第二節 溥儀登場與滿洲國建國	21
第三節 小結	26
第二章 願謏天之明命：「皇帝」登極	31
第一節 「民為邦本」：政權合法性、國體問題與帝制運動	31
第二節 「天與人歸」：即位儀式與慶祝活動	40
第三節 製造康德皇帝：傳媒上的溥儀形象	47
第四節 小結	51
第三章 1935 年溥儀訪日與滿日關係結構	56
第一節 滿洲國建國後的滿日關係論述	57
第二節 溥儀在日本	63
第三節 〈回鑾訓民詔書〉及其頒行	71
第四節 小結	76
結論 滿洲國歷史重構的嘗試	84



徵引書目	93
附錄	97
附件一 滿洲國、中華民國、日本年號與公曆年對照表	97
附件二 滿洲國建國宣言	98
附件三 即位詔書	100
附件四 回鑾訓民詔書	101



## 圖表目錄

表 1-1	九一八事變後《盛京時報》和《滿洲日報》社論標題比較	12
表 1-2	《盛京時報》對溥儀、文繡離婚案之報導文章列表	22
表 3-1	1935 年溥儀訪日行程略表	82
圖 1-1	滿洲國地圖(1933)	28
圖 1-2	1931 年 9 月 19 日日軍進入瀋陽	29
圖 1-3	1932 年 2 月「建國會議」	29
圖 1-4	溥儀抵達新京(長春)，1932 年 3 月 8 日	29
圖 1-5	《盛京時報》對溥儀就任執政的報導，1932 年 3 月 9 日	29
圖 2-1	溥儀像	53
圖 2-2	溥儀墨跡：「願諗天之明命」	53
圖 2-3	鄭孝胥像	53
圖 2-4	陳寶琛墨跡：「旁觀者清」	53
圖 2-5	溥儀祭天	54
圖 2-6	穆儒丐〈登極恭禮記〉	54
圖 2-7	東京《朝日新聞》對溥儀登極的報導	54
圖 3-1	遞信協會「滿洲國皇帝陛下御來訪繪葉書」廣告	78
圖 3-2	平凡社「滿洲國皇帝陛下奉迎畫報」廣告	78
圖 3-3	朝日新聞社「友邦皇帝御來訪映畫」影片公映廣告	79
圖 3-4	大連西川商店「海軍人牌香菸」廣告	79
圖 3-5	《扈從訪日恭記》書影	79
圖 3-7	溥儀接受裕仁天皇、秩父宮親王歡迎照片	80
圖 3-8	〈滿洲國皇帝陛下奉迎歌〉	81









## 緒論 在復國與建國之間



民眾三千萬，都興故主恩。由天還帝運，近日照邦基。  
重把乾綱握，新凝鼎命施。我皇登九五，盛典頌丹楹。

王鶴齡，〈大典祝詩〉<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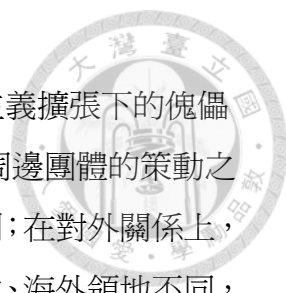
1934 年 3 月 1 日，「末代皇帝」溥儀在滿洲國新京（長春）的即位大典上正式登極成為「滿洲帝國」的皇帝，年號「康德」。這天起溥儀將以皇帝的身份君臨滿洲國，直到 1945 年滿洲國因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而滅亡為止。這是溥儀一生中第三度登基為皇帝，也是他的三段皇帝生涯中歷時最長、最富戲劇性的一段。溥儀年僅三歲時便登基成為清帝國的皇帝，六歲時在辛亥革命的烽火中遜位。之後十多年間，他都夢想著要匡復清室，重登大寶，最後才終於在滿洲國這誕生於日本帝國擴張政策下的「國家」一償宿願。

頗堪玩味的是，儘管滿洲國自 1932 年在關東軍的扶植下成立之初就奉溥儀為國家元首，溥儀正式登上帝位卻是建國後兩年的事情。在這之前，溥儀是以「執政」的頭銜出任滿洲國的領袖，而這個名稱曖昧的頭銜當時也令他與他的一些臣子忿忿難平。在滿洲國國體問題上，日本方面對時局的判斷與溥儀等人的期望顯然是有落差的。

溥儀從「滿洲國執政」成為「滿洲帝國皇帝」的過程，代表的是他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當初前往滿洲的目標；但與此同時，這也表示對日本方面而言，滿洲建國近兩年後的客觀局勢以及策略需求，相較於九一八事變時期已有了相當大的改變。從「執政」到「皇帝」遠不只是頭銜的改變，同時也涉及到滿洲國國家意識形態與論述策略的調整。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這些意識形態論述是如何向民間傳佈，而當時生活在滿洲國的一般民眾又是如何認識國家機器試圖散播的訊息。

### 省思「滿洲國史」

<sup>1</sup> 王鶴齡，〈大典祝詩〉，《盛京時報》（1934 年 3 月 1 日，第十五版）



在戰後的主流歷史論述中，滿洲國多半被視為日本帝國主義擴張下的傀儡政權，是日本侵華戰略的一部分。滿洲國是在關東軍以及各類周邊團體的策動之下建立，它的政策制定、施行也受到了來自日本方面的影響牽制；在對外關係上，滿洲國從未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然而，與日本其它殖民地、海外領地不同，滿洲國至少在表面上仍擁有獨立國家的主權與國家機構，也有著相應的國家法理論述與意識形態。在日本帝國域內，滿洲國可說是極其特殊的存在。

早期歷史學者對於滿洲國史的認識，多是將其置於中日關係史或者日本帝國擴張史、殖民史的脈絡之下，後來才有以滿洲國為研究主體的專書、論文大量出現。在日本學界，系統性的滿洲國研究約起始於 1970 年代，許多擁有滿洲國經驗的官方人士的手記、回憶錄在此時期開始出版；與此同時，由於 1972 年中日建交、「遺留孤兒」等重大議題的影響，日本民間與學界對滿洲國歷史的關注日漸提升。

然而，這些出版品所呈現的滿洲國歷史圖像，一般是在強調日本人在滿洲的戮力經營建設，以及滿洲經驗對於戰後日本重建復興的影響與正向意義。這樣「有如夢幻樂土亞特蘭提斯一般」的歷史敘述，被認為是在美化、合理化日本對華侵略，而受到一些學者的強烈批判。<sup>2</sup>

另一方面，中國學界系統性的滿洲國研究同樣也是這股風潮下的產物。當時的中國學者為了回應、批判「日本右翼勢力叫囂所促進的偽滿洲國史研究」，<sup>3</sup>而展開了對「東北淪陷史」的研究；他們強調日本對東北四省（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的殖民壓迫，以及東北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抵抗。在基本立場上，中國學者否定滿洲國政權的合法性，而視之為「偽」國。這也就形成了中國的滿洲國研究的主要解釋框架。從中日兩國早期學者的討論脈絡，也可以看出滿洲國史在近代史研究領域中的複雜性。

滿洲國雖然是在日本人的策劃下形成，但在當時的滿洲地區同時也存在著各式各樣的地方勢力；它們在滿洲「建國」的過程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九

---

<sup>2</sup> 相關批評可見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国の肖像(増補版)》(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4)，頁 11；田中隆一，《滿洲国と日本の帝国支配》(東京：有志舎，2007)，頁 8。

<sup>3</sup> 解學詩，《偽滿洲國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前言，頁 1。

一八事變後，盤據東北且立場反日的張學良政權被驅逐出去，關東軍開始整合殘存的東北各省地方派系，這些在地勢力的成員後來形成了滿洲國第一代的中國人官僚。對這些人來說，加入滿洲國的動機可能是在於維持自身的地位與利益，他們也在新成立的政權中彼此傾軋競爭。但在關東軍與日本官僚的主導下，他們的影響力不斷地遭到侵蝕，最後被有日本背景的新一代中國人官僚取而代之。<sup>4</sup>

而對於跟隨溥儀的前清遺臣來說，滿洲國的意義又更顯複雜。這些遺臣不願意認同顛覆清廷的民國，對於二十世紀 20 年代興起的共產主義思潮心懷恐懼，也反對時下新知識分子們大力提倡的新文化運動，於是滿洲國的出現令其中一些遺臣有了寄託與效忠的對象。<sup>5</sup>但這些遺臣對於滿洲國的觀感也是複雜多向的。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溥儀身邊的一些遺臣對日本人在東北的擴張行為深感疑慮，對於溥儀是否應該前往東北也莫衷一是。<sup>6</sup>與其說他們認同滿洲國，毋寧說是對於故主和傳統道德文化的忠誠。

這些背景、立場、理念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人們，懷著各自的動機投身滿洲國，形成了有趣而多面向的歷史圖像。滿洲國可說是一個同床異夢的結合。此外不應忽視的是，滿洲國也吸納了許多來自關內、日本本土、朝鮮、臺灣、俄羅斯等地的人士與移民來此發展、定居；滿洲國也因這樣的多元性，成為了非常特殊的歷史場域。

## 主要相關研究成果回顧、問題意識與章節安排

本研究將討論九一八事變後到溥儀於 1934 年即位為滿洲國皇帝、並於 1935 年首次前往日本訪問期間所出現的各種宣傳論述。日本方面與溥儀約於 1933 年末達成推動帝制的共識，並在 34 年初開始緊鑼密鼓地發動輿論鼓吹帝制，相關的宣傳在當年 3 月 1 日的即位儀式前後達到高潮。溥儀登極之後隨即接受日本皇室的邀約，於翌年（1935）赴日訪問。兩位君主的交往也在日滿兩國掀起了一陣熱潮，一時有大量報導性文字、影像在坊間出現。

---

<sup>4</sup> 可見浜口裕子，《日本統治と東アジア社会：植民地期朝鮮と満洲の比較研究》（東京都：勁草書房，1996）第三章「満洲国の中国人官吏」，頁 103-142。

<sup>5</sup>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2009），第七章「王道樂土：情感的抵制和參與『滿洲國』」，頁 307-359。

<sup>6</sup>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頁 322-327。

近來學界已有不少關於滿洲國實施帝制的研究，學者對帝制實行的決策過程、各方勢力的互動關係以及內在動機、意識形態都作了極有價值的探討。然而，在當時生活在滿洲國的大多數人們眼中，國體的變更有什麼意義呢？他們眼中的溥儀是什麼樣的形象？他們如何接收國家所灌輸的意識形態？他們所收受的資訊，又是否與國家的權力者們所欲灌輸的訊息相一致？

本研究希望能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思考一般人民對於這些宣傳策略可能的理解，並試著探討國家的政治運作、宣傳如何滲透到社會大眾之中，並如何被人們理解。簡而言之，本研究試圖呈現的，是滿洲國國體往帝制過渡的過程中，滿洲國當局與其人民之間的互動關係。

一般而言，日本 1905 年在日俄戰爭的勝利，被視為日本正式以國家力量在滿洲展開經略的開端。根據《樸茨茅斯條約》，日本取得了關東州租借地、南滿鐵路以及鐵路沿線的鐵道附屬地等相關權益，並成立了軍政機關「關東總督府」以及特許公司「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作為經營滿洲的主要機構。此後近四十年間，滿鐵便扮演著主導滿洲開發的角色；而作為關東州統治機構的關東總督府則在數次改組改名之後，於 1919 年實施軍民政分離，設立關東軍司令部，負責保衛日本在關東州以及鐵道附屬地的權益。自此以後，關東軍逐漸發展為在滿洲舉足輕重的一股力量。

日本軍方內部早已有構想在滿洲、內蒙古地區扶植一獨立國家，以因應日本的大陸擴張之需求並作為與蘇聯之間的緩衝，這些構想最終在 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付諸實現。<sup>7</sup>九一八事變是由關東軍的青年將校所主導的軍事冒險行動，其主要目標是在排除割據滿洲多年的張家勢力，並將滿洲納入日本的控制範圍。在造成軍事佔領滿洲的既成事實之後，關東軍經過內部討論，決定放棄直接併吞滿洲的計畫，轉向尋求在地勢力的合作，在日方主導下建立一個以中國人為主的政權。<sup>8</sup>此時的溥儀，便是日本方面屬意的最佳人選。

依據山室信一的研究，日方之所以屬意以溥儀為新國家的元首，主要原因包括下述幾點：溥儀身為遜帝的政治聲望以及他的滿族背景；在政治立場上他與

---

<sup>7</sup> 關東軍對於滿蒙地區的戰略思想之發展過程，可見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国の肖像》第一章「日本の生くる唯一の途——関東軍・滿蒙領有論の射程」，頁 19-60。

<sup>8</sup> Rana Mitter,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73-75.

蔣介石、張學良針鋒相對，幾無合作可能；溥儀自身在當地欠缺政治實力，勢必更加仰賴關東軍的支持；最後，擁立溥儀可以回避東北各省派系之間的矛盾。除此之外，考慮到滿洲國的疆域往內蒙古發展的可能，溥儀對於蒙人的號召力對關東軍而言也有利用價值。<sup>9</sup>但是，為什麼滿洲國要到建國兩年之後才真正建立帝制呢？

在早期的滿洲國史研究中，並未將滿洲國實施帝制一事視作重要問題。例如「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著的《滿洲国史》（東京：財団法人滿蒙同胞援護會，1970）是日本早期滿洲國研究的代表性作品，逾兩千頁的皇皇巨著中卻僅有其中十餘頁的篇幅在討論此問題，內容也只是簡單交代建立帝制的決策、實行過程。<sup>10</sup>又如姜念東等人合著的《偽滿洲國史》（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作為早期中國學者滿洲國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但本書是對於改行帝制的陳述卻只有「日本帝國主義爲了把這個所謂的『滿洲國』，打扮得更像個『王道國家』，把它改名爲『滿洲帝國』」等寥寥數語，<sup>11</sup>

在較晚近的滿洲國史著作中，對於改行帝制開始有較細膩的討論。解學詩認為，滿洲國原本的執政制只是建國之初，臧式毅等地方勢力派與熙洽等復辟派妥協的產物。解氏認為執政制僅是通往帝制的過渡。<sup>12</sup>此外，解氏也認為關東軍經由對帝制的支持再度確認了日本方面對滿洲國國家政策的指導權，他強調帝制的實行是日本完全兼併滿洲的一個步驟。<sup>13</sup>這些解釋強調了日本一方在帝制問題上的主導性與實行帝制的策略性。

山室信一的研究則指出，滿洲國意識形態與制度的設計最終都屈從於日本擴張政策的需求之下，於是滿洲國的國家理念與意識形態建構，也就反證了這個國家的虛構性質；建國運動終歸只是由關東軍與一小群人製造出來的，與當地「滿系」人民真正的認同是斷裂的。而在此狀況下，滿洲國皇帝制度的建立無法帶給溥儀真正的權力基礎。<sup>14</sup>

<sup>9</sup> 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国の肖像》，頁 142-143。

<sup>10</sup> 滿洲国史編纂刊行會編，《滿洲国史・総論》（東京：財団法人滿蒙同胞援護會，1970），頁 409-416。

<sup>11</sup> 姜念東、伊文成、解學詩、呂元明、張輔麟，《偽滿洲國史》（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頁 148。

<sup>12</sup> 解學詩，《偽滿洲國史新編》，頁 206。

<sup>13</sup> 解學詩，《偽滿洲國史新編》，頁 207-208。

<sup>14</sup> 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国の肖像》，頁 230-232。

波多野勝的研究將重點放在溥儀與日本皇室成員的互動上。他認為溥儀在即位後與日方的互動以及 1935 年出訪日本，反映了溥儀本身鞏固自身地位的意圖以及關東軍謀求「日滿一體」的政治算計。波多野氏發現溥儀深刻地介入了訪日歸國之後所發佈的〈回鑾訓民詔書〉的草擬，並由這份重要文獻以及他在這段期間的動向，判斷他本人已經在「日滿一體」的立場上與關東軍達成同謀關係，甚至因此疏遠了鄭孝胥等復辟派舊臣。<sup>15</sup>波多野氏認為溥儀在滿洲國的政治體系中，扮演了一個相當主動的角色，積極爭取其政治資本。

樋口秀實的研究則是在探討滿洲國皇帝本身在國家權力體系中的地位，以及權力體系建構的過程中，精神性因素的作用。他主張中國人官僚在滿洲國政治領域中有其能動性，而不只是日人的傀儡。<sup>16</sup>他認為帝制的成立牽涉到滿洲國內中國人官僚的權力鬥爭，最終導致了政治權利中央集權化。<sup>17</sup>樋口氏也認為，滿洲國皇帝制度的成立與即位儀式的安排，是在解消滿洲國內因政體問題而產生的各方勢力間的對立，並強化以溥儀為中心的國內精神紐帶。於是皇帝制度的建立，對關東軍而言是一種調解滿洲國國內政治衝突，以因應 1933 年前後美蘇建交等國際局勢的變遷與危機的手段。<sup>18</sup>

駒込武則從日本帝國域內文化統合的角度，考察了滿洲國王道主義理念的形成與論述以及其中的種種內在矛盾。他認為滿洲國的皇帝制度不可避免地引入了日本的天皇制意識形態，並與原本利用儒教傳統論述而理念化的王道主義產生矛盾；最後王道主義漸漸從滿洲國的國家統治理念中被排擠出去，而這也就預示了滿洲國後期的全面日本化。<sup>19</sup>駒込氏也指出，在天皇制意識形態之下，「天意」取代了中國儒教政治論述的「民意」成為君王正統延續性的基礎；而滿洲國皇帝所依歸的天意，實際上就是日本天皇的意旨，<sup>20</sup>於是滿洲國最終在文化上也被統合成為日本殖民帝國的一部份。

在關東軍與滿洲國當局以外，在滿洲的許多社團、宗教團體的活動也呼應

---

<sup>15</sup> 波多野勝，《昭和天皇とラストエンペラー：溥儀と満州国の真実》（東京：草思社，2007），頁 156-162。

<sup>16</sup> 樋口秀実，〈満洲国皇帝制度の成立と皇帝即位儀礼〉，《国史学》第 200 号（2010，東京），頁 148。

<sup>17</sup> 樋口秀実，〈満洲国皇帝制度の成立と皇帝即位儀礼〉，頁 159-163。

<sup>18</sup> 樋口秀実，〈満洲国皇帝制度の成立と皇帝即位儀礼〉，頁 179-180。

<sup>19</sup> 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頁 270、276-282。

<sup>20</sup> 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頁 278-279。



著滿洲國的國家理念與意識形態。杜贊奇(Prajensit Duara)將視角放在滿洲國意識形態的形成以及破滅。他認為滿洲國的誕生有其理想性，也具有類似近代民族國家的性格。他指出關東軍必須在滿洲尋求與當地重要集團(包括中國人與日本人)的合作，而建構日滿一體經濟的理念則受到大亞洲主義理念的滲透，這同時也助長了各類日本意見團體在滿洲的(論述上的與實際影響上的)發展。<sup>21</sup>此外杜氏也注意到這個傾向更加突顯了滿洲國相對於日本政府與財閥勢力的獨立性。<sup>22</sup>

綜觀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發現近來的研究者們已認識到，雖然日本當局無疑是滿洲國國家政策的重要主導者，但滿洲國的中國人官員以及在地人士也同樣對這個國家有相當的影響力。關東軍在滿洲國的各種決策，儘管有極大成分是要謀求日本的國家戰略利益，但同時也必須關照在滿洲的其他勢力的意見，並且對當地的種種客觀形勢條件作出回應。而歷來的諸多研究者們，則已為我們提供了各色人群之間豐富多樣的互動圖像。

本研究所關心的問題在於，在滿洲國皇帝制度形成的過程中，當局以及報刊傳媒如何詮釋改變國體的必要性與正當性；而這些詮釋與滿洲國官方所揭櫫的意識形態、建國理論之間是否有其落差，又是如何與滿洲國當時的政治局面、滿日兩國間的權力結構連結。此外，也希望能從這些宣傳文章當中，整理出時人對於這些政治活動可能的認識，進而思考時人對於滿洲國政權的觀感、看法，並且進一步深化對於滿洲國早期歷史的理解。

本文第一章將討論九一八事變以降到滿洲國建國期間，當地居民對於這一變局的可能理解。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東北三省旋即陷入了混亂的局面，關東軍一方面以軍事行動排除東北軍，一方面也極力策動東北各地方勢力加入「建國」事業。而對於這段過程，當地人民可能抱持著怎麼樣的認識呢？同時，溥儀在關東軍的策劃下投身滿洲「建國」，但當地人民又是怎麼看待這位其實和東北無甚淵源的「末代皇帝」呢？這些問題的討論，將有助於理解滿洲國政權的形成，以及它在政權正當性上遭遇的困境。

第二章將討論的是 1934 年滿洲國施行帝制前後，當局以及新聞媒體的宣傳論述。滿洲國帝制的成立是在日本方面的操縱下進行，官方的立場、宣傳口徑理

---

<sup>21</sup>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4), pp. 61-62.

<sup>22</sup>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P.68.

論上應該符合日方的設定，與滿清的復辟劃清界線，但實情又是如何呢？而這些宣傳文字以及當時一些人對建立帝制發表的感言、評論，也可讓我們一窺時人對於滿洲國帝制的理解與想像，並幫助我們探究滿洲國帝制的實質意涵。

第三章將討論 1935 年溥儀首次訪日的輿論宣傳以及〈回鑾訓民詔書〉的頒佈。溥儀訪日是帝制建立後的重要事件，他和裕仁天皇以及日本皇族成員的互動在當時備受矚目。兩國元首的互動關係與兩國的關係架構密切相關，此一關係架構是如何透過當局的宣傳與新聞媒體的渲染呈現在當時人民的眼前；而〈回鑾訓民詔書〉的頒佈，又如何影響了此後兩國的權力關係。

## 使用史料說明

本研究將採用報紙、期刊、宣傳品等第一手資料，期望能釐清作為表層的宣傳策略與底層的意識型態之間的對應關係。除此之外，也將以當時代的文學著作、史地讀物、口述訪談等資料作為補充，以期能呈現出一個較完整的歷史圖像。

在報刊中，以奉天（瀋陽）為據點的日資漢文報紙《盛京時報》為最具影響力者。《盛京時報》成立於 1907 年，經過長時間發展後成為東北地區第一大報，執東北言論界之牛耳。該報在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時，係「滿鐵」出資持有的報社，在日軍的保護下成為當時唯一得以穩定發刊的報紙。<sup>23</sup>滿洲國建國後，更持續擴張規模，是當時東北少數能長期、穩定發行的大報，其社論和報導取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方與滿洲國官方的觀點。

除此之外，上海的《申報》以及日本的《朝日新聞》等，則可做為前述滿洲國當地刊物的對照，以幫助吾人理解滿洲境外的觀點，並從反面推論日、滿方面宣傳策略的效果。滿鐵的外圍組織「滿蒙文化協會」的機關誌《滿蒙》，則是當時以橘樸為首的理論家、知識分子討論滿洲問題與國際局勢的重要刊物，亦具有參考價值。

而在報刊之外，政府檔案也對理解當局決策過程以及對時局的認識有重要的價值。本研究使用的檔案資料主要來自日本外務省編纂的《日本外交文書》，以及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彙整

---

<sup>23</sup> 關於《盛京時報》之相關研究，可見吳素惠，《盛京時報之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碩士論文，1995。

的外交、軍事檔案。

此外，爲了向一般民眾宣傳、灌輸滿洲國的建國理念，以及宣揚溥儀個人的德行與聲望，一些由當時知名人物撰寫的小冊子也是常見的宣傳品。諸如記述滿洲建國的歷史合法性與意義的鄭孝胥〈滿洲建國溯源史略〉、記錄溥儀個人生活的沈瑞麟〈皇上乾德恭記〉、以及記錄溥儀 1935 年訪日行程的林出賢次郎《扈從訪日恭紀》等，也都是可以反映時人如何接觸、認知國家意圖傳播的訊息的史料。

最後，則是歷史當事者們遺留的各種作品與陳述。例如文集、詩集、日記，這類文獻可以幫助研究者瞭解這些人物如何思考當時的局勢與問題。而在戰後，這些一度位居高津的人物多半淪爲戰犯或者「漢奸」遭到治罪，而在審訊過程中留下了許多的口供、筆供，儘管這類文本的內容不見得完全發乎當事者本意，但仍可以提供研究者一些訊息。此外，近年來也出版了許多有滿洲國經驗人士的口述訪談資料、回憶錄、傳記等文獻，對研究者來說更是可貴的參考資料。



## 第一章 倉促成軍：從九一八事變到滿洲「建國」

對 1920 年代的日本而言，東亞局勢可謂危機四伏：新興的蘇俄共黨政權是日本在東北亞潛在的大敵；國民黨的北伐使軍閥割據的中國走向統一，國民政府「收回國權」的外交方針和中國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對日本在華利益造成了極大威脅。<sup>1</sup>此外，20 年代末全球經濟恐慌的衝擊，以及 1930 年倫敦裁軍條約問題，也刺激了日本軍方鞏固國家「生命線」的危機感和擴張主義傾向。<sup>2</sup>

日本軍方長期以來將所謂「滿蒙」地區視作禁臠，在當地持續擴張勢力。自 1905 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勝以來，日本勢力便伸入滿洲，數十年來以關東軍和滿鐵為中心，在當地有極大的影響力。至 1930 年代初期，陸軍內部已經確定以武力控制滿洲的方針。<sup>3</sup>另一方面，溥儀和部分忠於前清的「遺老」長期以來一直有圖謀復辟之心，東三省的一些地方派系也對張學良政權心懷不滿，他們也因此成為了關東軍爭取支持、合作的對象。<sup>4</sup>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與滿洲國的誕生，可說是這些內外條件作用下的結果。事變爆發之後不久，關東軍開始積極策動滿蒙獨立。在這段期間，日本軍政當局一方面對此進行內部討論，一方面也進行各種宣傳製造輿論，為新國家的成立塑造合法性。自 1931 年 9 月至 1932 年 3 月間，滿洲本地與中外報刊對於滿蒙獨立和新國家國體等問題的討論之變化，不但反映了滿洲局勢的發展以及事變爆發之初日方決策調整的過程，也呈現出時人對於時局可能的理解。

本章將分析九一八事變後到滿洲國建國期間，《盛京時報》等中外報刊對相關事件的報導、評論，討論事變爆發後媒體對於事變局勢的詮釋、新國家建構的

<sup>1</sup> 半藤一利，《昭和史（1926-1945）》（東京：平凡社，2004），頁 22-23。

<sup>2</sup> 林明德，《近代中日關係史》（臺北：三民書局，2005 修訂二版），頁 156-164；半藤一利，《昭和史（1926-1945）》，頁 56。

<sup>3</sup> 〈滿洲問題解決方針の大綱〉。

<sup>4</sup> 關於民國初期復辟派、復辟運動與滿洲國關係之研究，可見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2009）。

論述。也將分析九一八事變前後對於溥儀其人的報導，討論見諸媒體的報導與各方勢力實際的政治活動的落差，藉以思考當地一般人民對滿洲國形成過程可能的認識。



## 第一節 九一八事變及其後續發展

1931 年 9 月 18 日晚間，關東軍中尉河本末守帶領數名官兵，爆破位於柳條湖的南滿鐵路軌道。關東軍隨即向鐵道附近的北大營進攻，並向駐紮東北各地的中國軍隊發起攻擊。關東軍宣稱這是因鐵路遭到中方襲擊發起的「反擊」行動，並於短時間內佔領了瀋陽、長春、安東、撫順、營口等主要城鎮。<sup>5</sup>此即九一八事變的發端。

日本政府事前曾試圖阻止關東軍的激進行為；事變爆發後，內閣於 9 月 19 日開始緊急集會討論如何善後。內閣先是在 21 日的會議上定調，將事變的責任歸咎於中國方面的挑釁，接著於 24 日發表「不擴大事態方針」的聲明，表示願與中方透過談判解決爭端。但這項聲明並無法遏止關東軍的行動，滿洲的戰事仍然持續擴大。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部內部對於如何實質控制滿洲也有著不同的意見。在陸軍參謀本部於昭和六年（1931）提出的年度「情勢判斷」中，對於佔領滿洲的計畫提出了三個步驟：一、於滿洲建立取代張學良政權的親日政權，但在形式上仍置於中國主權之下；二、「滿蒙組成一個政權」，並從中國獨立，建立一受日本控制的國家；三、正式佔領滿蒙，將其納入日本版圖。<sup>6</sup>此構想雖只有概念性的陳述，其影響卻也反映在事變後日方對於滿洲問題的討論與處理方式上。

9 月 19 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與事變主謀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人會晤。<sup>7</sup>會中決定依照「情勢判斷」制定的方針，先在滿洲建立起

<sup>5</sup> 關於九一八事變的始末，坊間許多出版品已有所陳述。其中較全面的專書有梁敬錫，《九一八事變史述》（紐約：聖若望大學亞洲學院、中美文化公司，1964）、易顯石等著，《九一八事變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1）、馬越山，《九一八事變實錄》（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等；此外，一些滿洲國史研究者也對事變的背景、因果與影響有所解釋，如解學詩，《偽滿洲國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国の肖像》（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4 增補版）等。

<sup>6</sup> 轉引自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国の肖像》頁 65-66。

<sup>7</sup> 事變爆發前夕，日本陸軍當局為了阻止關東軍的冒險行為，派遣建川美次前往瀋陽進行勸說，這也促使了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人決定提前於 9 月 18 日展開行動。但事實上，建川本人對

取代張學良的新政權。<sup>8</sup>於是在 9 月 21 日，於瀋陽成立了以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為市長的市政府，並在 25 日成立了由當地士紳組成的「地方維持委員會」，作為過渡性的政治機構。對當時的滿洲居民而言，提供這些消息的資訊來源，最重要者當屬《盛京時報》。

《盛京時報》在事變期間是極少數穩定發刊的大報。作為滿洲的主要日資媒體之一，該報在這段期間對事變的報導大體均依循日方的「官方說法」：宣稱引發衝突的責任在於中國政府煽動民間排日情緒，<sup>9</sup>強調關東軍正逐步控制局面，安定市面秩序。<sup>10</sup>於是在一些研究當中，《盛京時報》常被視為是侵略的幫兇，為關東軍的行動提供輿論、宣傳的支援。<sup>11</sup>

然而，若仔細分析《盛京時報》在事變爆發後的表現，卻可以發現該報在立場上似乎與關東軍的作為並不完全一致，而其報導的內容也沒有明確的論述策略。此一現象應如何解釋尚未有定論，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盛京時報》作為一份面向中國讀者的漢文報紙，必須更加謹慎地報導中日兩國間的敏感議題。<sup>12</sup>若將該報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一個月間的社論標題與大連的日文報紙《滿洲日報》相較，便可以看出《盛京時報》在相關議題上立場的曖昧性。

表 1-1 九一八事變後《盛京時報》和《滿洲日報》社論標題比較

日期	盛京時報	文章主旨	註記	滿洲日報
09/20	--	--		日中兩軍之衝突
09/21	--	--		

於關東軍的行動亦採取了放任、默許的態度。

<sup>8</sup> 片倉衷，〈滿洲事變機密攻略日誌 其一〉，9 月 19 日。收入小林龍夫、島田俊彥編，《現代史資料 7-滿洲事變》（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頁 184。

<sup>9</sup> 中日局勢當時原已相當緊繃，1931 年間的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均激化了中日兩國在滿洲地區的緊張關係。1931 年 9 月間，《盛京時報》、《滿洲日報》等日資報紙，均持續報導這兩次衝突事件的後續消息。此外，這些日資報紙也相當注意當時中國的排日運動，並以社論或者援引日本官方發言加以譴責；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它們更以相當大的篇幅報導了中國各地的反日示威和抵制日貨運動。

<sup>10</sup> 〈日軍佔領後之市面情形 非搶案即竊案並未發生 洋車夫利市三倍〉，《盛京時報》，民國 20 年 9 月 21 日第二版。

<sup>11</sup> 類似主張可見於諸多相關研究。例如：李玉敏，〈《盛京時報》關於「九一八」事變報導評析〉。《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 年第 3 期，北京。

<sup>12</sup> Rana Mitter 指出，《盛京時報》在東北地區能擁有廣泛的輿論影響力，正因為它對當地居民而言不只是日人的宣傳機構，而是更具批判性的言論機關。見氏著，《The Manchurian Myth》，pp.44-47。

09/22	閻馮出洋問題	評論中原戰後中央處理閻錫山、馮玉祥二人之問題。		國立臺灣大學
09/23	因太平洋學會問題有感	由中國主辦第四屆太平洋國際學會一事討論中國外交處境。		日中軍事衝突與國際法、非戰公約和國際聯盟
09/24	小學校論	批判中國國內小學之亂象。		國際聯盟理事會之決議難以解決事態
09/25	談發展機器手工業	討論中國適於發展機器手工業，並批評南京當局「節制資本」的思想。		誰在擴大事件
09/26	從災前的農村說起	批判中國商品化農業經濟致使農村走向破產。		第二階段的問題、重大時期與我等官民的靜思
09/27	(未出刊)			國際聯盟的諒解
09/28	--	--		滿洲之特殊性，普及於歐美人可也。
09/29	過渡期之急務	批評張學良長期排日反日招致中日衝突；討論張政權崩潰後東北局勢。	傲霜庵	滿洲良民之願望：盜權閥之滅絕，王道自治之施行
09/30	駁不抵抗主義	批判國府不抵抗主義以及東北軍無力抗敵，並指散兵反將危害治安。	傲霜庵	東四省的自治
10/01	不求人求己	批評中國求助於國際聯盟實屬無謂；批評國民黨內鬥爭誤國。	傲霜庵	無欲於領土
10/02	治安上之諸問題	討論日軍入瀋後治安問題。	傲霜庵	
10/03	最後破產與分付主義	批評張學良政權以躁進方式對日交涉權益問題；認為東北新政權應檢討對日政策，循序漸進爭取國權。	傲霜庵	政權乃中國人之選擇，與日本人無關：蔣公使的誤解
10/04	如何對付滿洲事件	批評中國依賴國聯罔顧局勢，指出日本此次將不會輕易讓步；主張中日直接交涉，迅速解決。	傲霜庵	南京、廣東妥協，合流政府的外交方針
10/05	--			
10/06	如何對付滿洲事件			共存共榮的樂土，永遠和平善鄰的交誼
10/07	繁榮北平之基本問題	評論中央政府應注意北平之建設，並舉出多種方法。		
10/08	(上、下)			華中危機，我政府之

				抗議與中國反省之必要
10/09	太平洋之完全征服	藉美人罕敦、潘克班駕機橫越太平洋討論世界航空事業之進步。	傲霜庵	
10/10	中央銀行與幣制問題	論各國中央銀行應成立國際金融交換制度，促進貨幣流動。		
10/11	(未出刊)			事件擴大乃中國之責任，中國敵對行為違反國聯決議
10/12	--			
10/13	中央銀行與幣制問題			國聯理事會與事實的認識、日中關係始末、中國兵的素質
10/14				
10/15	沉著鎮定不屈服	批評中國官吏欠責任心，遇事(日海軍艦艇進入長江示威)逕自恐慌。		
10/16	十四日以後	批評政府依賴國聯調處之無益以及蔣介石煽動反日情緒之不負責任。	傲霜庵	日本之權益及其功績，芳澤代表應促進外人之認識
10/17	這是很奇怪的社會？	批判中國社會反日浪潮下之亂象。	傲霜庵	美國代表參加國聯於法理上不當：理事會的面目
10/18	法國黃金外交之勝利	評論法國以充沛的資本作為外交手段的策略與歐洲局勢。	外電譯稿	
10/19	--			
10/20	法國黃金外交之勝利			期望各國深思時局的遠因與國民的主張

在滿洲南部的戰事初步告一段落後，《盛京時報》的報導大抵著重在幾個方面：中日兩國政府的外交交涉與各國反應、東北各界發起的「自治」運動、張學良政權的動態等。以下將就這些主題分別進行分析、討論：

### 中日兩國政府的外交交涉與各國反應

中國於 9 月 21 日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訴，要求國聯介入調處；日本外務省則發表聲明，表示關東軍的行為是要保障日本在滿的特殊權益，合於中日之間簽署



的各相關條約規定，主張事變善後應由中日兩國直接進行交涉，國聯不應干涉。在日方保證日軍將於短期內撤回鐵路附屬地後，國聯理事會於 9 月 30 日決議接受日方「對滿洲無領土企圖」的聲明，要求日本將軍隊撤回鐵路附屬地，同時也要求中方負責在華日僑的生命財產安全。<sup>13</sup>

在中方向國聯提出申訴後，《盛京時報》便持續注意國聯的動態以及國際輿論的反應。9 月 28 日，該報以頭版報導 25 日國聯理事會「表明對日本措置之理解與滿足」，將不干預中日交涉。<sup>14</sup>《盛京時報》將此事視作日方的外交勝利，該報主筆菊池貞二於 10 月 1 日以筆名「傲霜庵」發表社論，嘲諷南京政府求助於國聯有如「情急抱佛腳」，認為國聯無力保障中國權益，呼籲中方應與日本直接進行談判。<sup>15</sup>10 月 4 日、6 日兩天，菊池又發表了〈如何對付滿洲事件〉一文，批評國民政府仰仗國際干預的策略不切實際，並指出拖延對日談判對中國有害無利：

……惟在滿洲，則日本平素駐有軍隊。……或曰日本已向中外聲明，從速撤兵……所可注意者，為日本在滿洲獲有一萬數千之駐兵權，所以中國若持遷延策，不肯迅速解決之時，日本當以其重兵集中附屬地內，仍然採取作戰姿勢……果爾，則無論日本撤兵與否，中國官民所受之脅威，始終如一。……<sup>16</sup>

菊池主張對中國而言「直接交涉」、「迅速解決」應是處理事變最有利的方式。<sup>17</sup>從上述論述來看，菊池的立論反映了日本外務省在滿洲問題的立場：經由交涉確保日本在滿特殊權益，排除第三國干預，且不願在滿洲擴大軍事行動。事實上，當時的國際輿情確實對日本有利，歐美各國也沒有積極意願介入遠東局勢。<sup>18</sup>然

<sup>13</sup> 洪嵐，《南京國民政府的國聯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頁 84-89。

<sup>14</sup> 〈聯盟對滿洲事變完全諒解日本態度 聯盟對中日問題停止干涉〉，《盛京時報》民國 20 年 9 月 28 日第一版。

<sup>15</sup> 傲霜庵，〈不求人求己〉，《盛京時報》民國 20 年 10 月 1 日第一版。菊池貞二（1884-?），宮城縣人，曾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求學，其後前往東北進入《盛京時報》任主筆，期間多次撰文抨擊張作霖政權之弊，針砭時政，在東北輿論界頗有聲望。

<sup>16</sup> 傲霜庵，〈如何對付滿洲事件〉，《盛京時報》民國 20 年 10 月 6 日第一版。

<sup>17</sup> 傲霜庵，〈如何對付滿洲事件〉。

<sup>18</sup> 洪嵐指出，英國當時經濟疲弱，海軍優勢漸消，無力介入遠東問題；美國出於門戶開放政策的指導方針，亟欲中日兩國和平解決爭端；蘇聯致力於發展國內經濟，也不願與日本起衝突。此

而，錦州事件的爆發卻讓日本失去了道德正當性，也讓各國重新思考介入滿洲問題的可能。

瀋陽失守後，張學良授意張作相、米春霖等人在錦州重建遼寧省政府以及「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作為其在東北最後的根據地。關東軍亟欲將東北軍逐出錦州。10月8日，十二架日本軍機轟炸錦州城，當地軍民傷亡慘重，是為錦州事件。錦州位於遼寧西南部，距離鐵路附屬地甚遠，日本並無在此駐軍或派兵的合法權利。日軍轟炸錦州是嚴重違反中日間相關條約的行為，因而造成了極大的爭議。

錦州事件之後，各國紛紛譴責日本違反國聯決議、國際條約的行為，國際輿論漸傾向同情中國。<sup>19</sup>國聯理事會最終於10月24日通過決議，要求日軍限期撤回鐵路附屬地，實質上支持了中國「先撤兵後談判」的基本立場。日方隨即發表聲明，表示拒絕接受此決議。<sup>20</sup>中國方面，則由駐日公使蔣作賓提出與日本商討撤軍的要求，並宣佈組織「東北接收委員會」，處理接收事務與保護日僑事宜。

21

這段期間，《盛京時報》報導的內容，大抵不脫日本外務省對國聯提出的說明以及呼籲中國直接談判。11月3日，該報引述電通社消息報導了中方「東北接收委員會」成立的消息，並分析該委員會的成員多數親張學良，日方或許會因而質疑其代表性；但由於該委員會畢竟是由國民政府指派，因此日方也「不能絕對拒絕」與之接觸。這名記者推測，該委員會「將來或與北平日本公使館開始重要協議，亦未可知」。<sup>22</sup>由此或可推論，即使事件發展至此，《盛京時報》的編者

---

外，歐洲各國當時普遍認為，相較於積弱混亂的中國，強盛的日本是東亞地區的穩定因素，因此在中日發生衝突時，往往傾向支持、同情日本。見氏著，《南京國民政府的國聯外交》，頁83。  
<sup>19</sup> 錦州事件爆發後，美國國務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致電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嚴厲譴責日軍在錦州的行為，並質疑日方實踐國聯理事會決議的誠意；英、法等國亦對日方表達不滿。見洪嵐，《南京國民政府的國聯外交》，頁91-92。

<sup>20</sup> 日本外務省在10月26日發佈的聲明大致有下列幾項重點：國聯理事會未達成共識，因此決議應屬無效；事變責任在中國軍憲之尋釁，日方出兵是出於自衛；指責中方煽動反日，且無力保障在滿日僑生命財產安全；尊重中國主權，呼籲兩國互不侵犯；呼籲中方取締反日行為；呼籲中方尊重條約規定之日本在滿的特殊權益；主張就中日關係基本原則與撤軍問題進行直接談判。聲明全文可參見〈滿洲事變に關する日本政府第二次聲明〉，昭和6年10月26日。本文收入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滿洲事變》第一卷第二冊（東京：外務省，1977），頁357-361。

<sup>21</sup>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滿洲事變》第一卷第二冊，頁364；〈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特種外交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記錄〉，收入劉維開編，《國民政府處理九一八事變之重要文獻》（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2），頁97-99。

<sup>22</sup> 〈接收東北組織委員會 國府決任接收委員〉，《盛京時報》，民國20年11月3日第二版。

仍認為中日雙方有透過談判解決問題的可能。然而從事後的發展來看，此刻中日的衝突已不可能以談判解決了。



## 東北各界發起的「自治」運動

關東軍佔領瀋陽之後，糾集了一些地方士紳、政治人物成立所謂「地方維持委員會」。<sup>23</sup>在瀋陽的「地方維持委員會」以外，東北各省還出現了許多與日方合作的大小團體。隨著關東軍一路推進，以及熙洽、張海鵬、張景惠等地方軍政領袖的倒戈，日軍控制下的各城鎮紛紛倣效瀋陽的前例，發起了「自治」運動。<sup>24</sup>那麼，這些運動在媒體上呈現出什麼樣貌呢？以下以瀋陽的狀況為例進行分析。

依照《盛京時報》的報導，瀋陽「地方維持委員會」的成立，是由於袁金鎧、于冲漢等地方政治人物有感於事變後「金融機關，猶未恢復；食糧問題，亦不容易」，乃決定發起以維持地方秩序。<sup>25</sup>而對關東軍來說，佔領瀋陽後雖建立了臨時市政府，並聘用了若干中國籍顧問參與市政，但考慮到當地居民的觀感，仍需要本地重要人物「自發地」投入地方事務與善後工作。<sup>26</sup>更重要的是，關東軍也希望藉此逐步製造滿蒙獨立的輿論。

《盛京時報》主筆菊池貞二在 9 月 29 日首次針對九一八事變發表評論。此時滿洲南部大部地區已為日軍控制，張學良敗像已露，於是這篇社論所討論的便是張學良政權瓦解後的滿洲政局。<sup>27</sup>菊池指出，「地方維持委員會」的性質近於諮詢機關，「恐難使之充分發揮其能力」，認為應該強化委員會的功能與組織；菊

---

接收委員會成員包括委員長顧維鈞、委員張作相、張群、吳鐵城、羅文幹、湯爾和、劉哲。

<sup>23</sup> 駒込武的研究指出，「地方維持委員會」是為了爭取在東北的中國人，特別是農民階層的認同。他認為袁、于等人在關東軍看來，是當地地主階層的代表人物，與提倡民族工業、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張學良之間存在結構性的矛盾；此外，駒込氏也認為對關東軍而言，吸收袁、于等人，有助於吸收東北的農村基層社會，進而解消東北的中國民族主義。見氏著，《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頁 249-252。

<sup>24</sup> 關於九一八事變前後，東北地區官紳與日本人合作的背景脈絡，可參考 Rana Mitter,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sup>25</sup> 〈地方維持委員會成立 袁金鎧等慨然出任 于冲漢亦力疾馳往參與〉，《盛京時報》，民國 20 年 9 月 26 日第四版。

<sup>26</sup> 〈奉天における地方維持委員會の組織について〉，昭和 6 年 9 月 26 日，《日本外交文書・滿洲事変》第一卷第一冊（東京：外務省，1977），頁 301。

<sup>27</sup> 傲霜庵，〈過渡期之急務〉，《盛京時報》，民國 20 年 9 月 29 日第一版。

池也主張應比照熙洽在吉林建立臨時省政府之例，儘快將遼寧省、瀋陽市的政務交付給中國人自行辦理。<sup>28</sup>由其立論觀之，菊池並未主張滿洲自中國獨立出來，而是將「地方維持委員會」以及熙洽的「吉林省長官公署」視作取代張家政權的親日地方政權。

雖說是在關東軍扶植下成立，此時的「地方維持委員會」代表人物還沒有表現出強烈的反張、分離主義立場，如袁金鎧對於關東軍謀劃的滿蒙獨立、另組政權，態度就顯得相當消極。<sup>29</sup>《盛京時報》於10月3日訪問袁金鎧時，袁否認有將委員會擴充為省政府的意圖，並且表示張學良在錦州的省政府已經成立，「遼寧一省絕無組織兩個政府之必要」。<sup>30</sup>10月8日，委員會「全體委員」又發表聲明，表示該委員會只是過渡性質，「當於最近期間即行撤銷」，絕無另組省政府或宣言獨立之意。<sup>31</sup>

這些報導、評論除了表現出袁金鎧等地方士紳的躊躇不安，也反映了「地方維持委員會」的尷尬處境。委員會成員遭到關內人士攻訐質疑，在地方上的評價也欠佳，甚至當地人被視為日本方面的傀儡。<sup>32</sup>袁金鎧的消極態度並非台面下的秘密，坊間也流傳他可能辭職的傳言，關東軍甚至必須透過報紙對外辟謠。<sup>33</sup>這類消息在報上頻繁出現，也可以想見事變初期關東軍對於媒體輿論可能還沒有充分的操作策略與控制能力。

瀋陽「地方維持委員會」曖昧保留的態度，也影響了關東軍在東北各地的活動。十月上旬，東北各地紛紛宣告「自治」，建立新的地方政權，然而這些日人支持的新政權卻在地方上遭遇各種困難，無法如關東軍所期望地順利推行「獨立建國」的活動。<sup>34</sup>十月下旬，關東軍開始對袁金鎧、于冲漢等人施加壓力，欲

<sup>28</sup> 傲霜庵，〈過渡期之急務〉。

<sup>29</sup> 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頁253-254；Rana Mitter, *The Manchurian Myth*, pp. 80-81.

<sup>30</sup> 〈遼省組織自治政府說 袁潔老絕對否認〉，《盛京時報》，民國20年10月4日第二版。

<sup>31</sup> 〈維持會發表宣言 既非組織政府 亦非宣言獨立〉，《盛京時報》，民國20年10月8日第四版。

<sup>32</sup> 時任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在向日本外務省提出的報告中表示，「地方維持委員會」等同於日本軍政下市政公署的附屬機構，又無獨立財源，地方民眾對其並無好感；張學良在錦州重建遼寧省政府，也對委員會的立場造成壓力。見〈奉天地方委員会による新政權樹立の挫折について〉，昭和6年10月3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一卷第一冊，頁315-316。

<sup>33</sup> 〈維持委員會經費有着 平方亦相昂勉 袁金鎧辭意打銷〉，《盛京時報》，民國20年10月6日第四版。

<sup>34</sup> 例如在撫順，當地人士對「獨立宣言新政府樹立計劃」之討論，因瀋陽的袁金鎧、闕朝璽兩

令他們在委員會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同時也在委員會下增設各種行政機關。<sup>35</sup>10月22日，委員會「接管（瀋陽）市政」，以趙欣伯任市長。「地方維持委員會」從此由過渡性機關一變而成行政機構，關東軍也開始籌劃將委員會改組為正式的省政府。

至11月7日，《盛京時報》報導「地方維持委員會」改組為新省政府幾已成定局。這篇報導還轉載了「草擬中」的宣言稿，但也提及委員會在6日早上集會時，對於是否要與國民政府決裂仍有異議。<sup>36</sup>然而就在當天晚上，關東軍將袁金鎧傳喚至司令部，以恫嚇要脅的方式迫令他在宣言上署名。<sup>37</sup>於是「地方維持委員會」便在關東軍的指使下於7日發表聲明，宣告與張學良政權及南京國民政府脫離關係，最終於12月15日成立新的「奉天省政府」，以原遼寧省主席臧式毅為省長。至此，滿洲自中國「獨立」已成定局，而《盛京時報》在滿洲問題上的論調也逐漸定調，開始鼓吹滿洲獨立建國。

### 張學良與其政權的動態

自張學良於1928年繼承其父張作霖的地位，他的東北政權與日本的關係就一直很緊繃。一方面，關東軍在皇姑屯事件謀害張作霖，激起了張學良的反日情緒；<sup>38</sup>另一方面，張學良政權在東北推動各項經濟改革、建設計劃，企圖降低東北對日本的經濟依賴，這也令日方感到相當不安。<sup>39</sup>

---

派意見相執未決，而處於觀望態度（見〈新政權樹立等政治策動に関する情報について〉，昭和6年10月8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一卷第一冊，頁337-340）；在局子街，當地的農工商聯合會對熙洽的吉林省政府和新縣政府的成立大為憤慨，群起反對，至十月中雖取得共識服從「新政府」命令，但「於精神上仍信任（南京）中央政府，靜待國際聯盟裁決與時勢之推移」（見〈吉林省獨立に対する局子街各界の反対について〉，昭和6年10月10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一卷第一冊，頁347-348；〈局子街地方各機關の時局に対する態度について〉，昭和6年10月22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一卷第一冊，頁361）。

<sup>35</sup> 袁金鎧在與林久治郎的密談中對此事大吐苦水。見〈治安維持会その他袁金鎧の時局に関する内話について〉，昭和6年10月22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一卷第一冊，頁360-361。

<sup>36</sup> 〈新省府成立在即 對張斷絕固也 惟與國府斷絕猶有問題〉，《盛京時報》，民國20年11月7日第四版。

<sup>37</sup> 關於當晚的情境，片倉衷記錄道，袁金鎧「感到生命的危險而戰戰兢兢」。見片倉衷，〈滿洲事變機密攻略日誌 其二〉，11月6日。收入小林龍夫、島田俊彦編，《現代史資料7・滿洲事變》，頁247。

<sup>38</sup> 林明德，《近代中日關係史》，頁161-162。

<sup>39</sup> 張學良的這些影響日本經濟利益的政策，也讓關東軍有信心國內輿論將會支持其行動。見Rana Mitter, *The Manchurian Myth*, pp. 66-68.

《盛京時報》與張家政權關係向來不睦，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該報對張學良的態度也頗不友善。<sup>40</sup>菊池貞二在9月29日發表的社論中批判張學良輕忽東北局勢的複雜性，一再對日挑釁，最終導致衝突爆發；<sup>41</sup>10月3日，又批評張學良的收回利權運動過於躁進。<sup>42</sup>在這些文章中，菊池批判的重點在於張學良政權無力妥善處理對日關係，激化反日情緒，最終引爆衝突。十月初以後，張學良政權的控制範圍已退縮至以錦州為中心的遼西一隅，東北地區是否會建立新政權成為最重要的問題。

事變爆發時張學良人在北平；事變爆發後，他便留在北平處理後續。9月28日《盛京時報》報導「省垣（瀋陽）各界有力分子」組成的「遼寧省各方面團體聯合會」於25日集會，決議建請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阻止張學良返回東北。<sup>43</sup>29日，又報導「遼寧紳民解決時局方策討論會」集會決議「自治獨立」。<sup>44</sup>這是「民意」要求排除在東北的張學良勢力的開端。關於張家政權以及張學良個人的負面評述，也開始在報端出現：一篇引述聯合社消息的報導表示張學良「將發表引罪自責之通電」並引退；<sup>45</sup>另一篇報導則稱張學良派員與本庄協商將其留在瀋陽的家產送往北平。<sup>46</sup>此外，該報也多次在報導中，描述張學良「焦慮」、「自暴自棄」，指他無力應對時局。<sup>47</sup>

但另一方面，《盛京時報》刊載的一些消息，卻也暗示了張學良對於東北政局仍有相當的影響力。該報於10月6日的報導稱，外傳擔任遼寧「地方維持委員會」委員長的袁金鎧有意辭職，但因各方勸慰以及委員會獲得財源保障，已「打

---

<sup>40</sup> 《盛京時報》與張家政權的對立其來有自。張作霖時期，該報即多次批評他積極涉入北京政局，發動內戰。1922年，張作霖曾下令禁售《盛京時報》，在當時激起了輿論不滿。至張學良時期，該報也屢次抨擊其「收回利權」運動。見吳惠美，《盛京時報之研究》第四章「盛京時報與東北政情」。

<sup>41</sup> 傲霜庵，〈過渡期之急務〉。

<sup>42</sup> 傲霜庵，〈最後破產與分付主義〉，《盛京時報》，民國20年10月3日第一版。

<sup>43</sup> 〈各方面團體聯合會呈請拒絕張學良東返〉，《盛京時報》，民國20年9月28日第二版。但這一「聯合會」此後便銷聲匿跡，無從判斷其組成與性質。

<sup>44</sup> 〈時局解決方策討論會 決計與國府斷絕 打銷青白旗訂定新國旗〉，《盛京時報》，民國20年9月29日第四版。「遼寧紳民解決時局方策討論會」是由闕朝璽、趙欣伯等人發起，但報端文章並未提及發起者。趙欣伯還發起了「遼寧四民臨時維持會」（四民係指農、工、商、學），鼓吹東北四省獨立。

<sup>45</sup> 〈張罪已通電 將發表實行隱退〉，《盛京時報》，民國20年10月6日第二版。

<sup>46</sup> 〈張家私產包裝送平〉，《盛京時報》，民國20年10月8日第四版。

<sup>47</sup> 〈張學良焦慮〉，《盛京時報》，民國20年10月8日第二版；〈張學良憤慨 呈自暴自棄的態度〉，《盛京時報》，民國20年10月14日第二版。

消辭意」；這篇報導宣稱，在北平的張學良也支持袁留任。<sup>48</sup>此外，10月24日的另一篇報導，指出張學良的副手、吉林省主席張作相從北平發電給吉林各地方官員和軍官，命令他們接受熙洽的「長官公署」的節度，於是「現在吉林全省軍政，即唯長官公署之命是聽」。<sup>49</sup>這類消息基本上並無實據，但經由這些新聞的流傳，或可推測張學良的「支持」有助於強化這些團體在地方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sup>50</sup>

瀋陽失陷後，張學良在錦州重建遼寧省政府，關東軍對其亟欲除之而後快。10月24日國聯理事會作成決議後，日方便透過外交手段要求中國軍隊撤出錦州。《盛京時報》將交涉過程形容成中方一味抗拒日方交涉的要求，還不時發佈對錦州方面不利的新聞。事變後張學良失去了東北大部分的地盤，難以負擔東北軍十餘萬官兵的軍費以及文職人員的費用，《盛京時報》便數次針對此事大做文章，指出錦州政權的脆弱與不得人心。<sup>51</sup>另外，《盛京時報》也不時報導張學良與東北軍其他將領間貌合神離的關係。<sup>52</sup>但大致而言，此時期對於張學良政權的負面報導、評述，多是在為日軍在東北的行動塑造正當性，而較少有對於張家政權施政的批判。張學良最後於十二月底放棄錦州，將軍隊撤回關內，張家父子在東北的統治至此宣告完結。

## 第二節 溥儀登場與滿洲國建國

溥儀 1924 年被馮玉祥逐出紫禁城後，翌年在鄭孝胥等人和日本人的策動下秘密離開北京，前往天津日租界寓居。由於特殊的身份，他的動向不時會引起國人的關注；而他本人在近臣的建議之下，也頗費了一番心思打理自己在報刊版面上的形象。<sup>53</sup>在局勢風起雲湧的 1931 年九月，溥儀再度躍上了新聞版面。然而使溥儀又一次成為媒體焦點的原因，卻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官司：他的妃子文繡向他提出了離婚要求。

<sup>48</sup> 〈維持委員會經費有着 平方亦相勗勉 袁金鎧辭意打銷〉。

<sup>49</sup> 〈張對熙洽諒解 諭屬一體遵從長官命令〉，《盛京時報》，民國 20 年 10 月 24 日第五版。

<sup>50</sup> 實際上直至十二月中，吉林省境內都還有忠於張作相的地方官員和軍官，執意與熙洽對抗。

<sup>51</sup> 如〈財政支絀平張狼狽 親者乃提前發薪 疎者仍積欠累累〉，《盛京時報》，民國 20 年 10 月 25 日第四版。

<sup>52</sup> 如〈張學良束手興嘆 萬福麟圖脫身〉，《盛京時報》，民國 20 年 10 月 6 日第四版。

<sup>53</sup> 溥儀謫居紫禁城期間便曾多次捐善款賑濟貧民。他自陳其動機是因為「懂得了社會輿論的價值」，見氏著，《我的前半生（全本）》（北京：群眾出版社，2007），頁 118-119。

文繡於 1922 年嫁入宮中成為溥儀的妾，其後受冊封為淑妃，但婚姻生活並不美滿。1931 年 8 月 25 日，文繡在其妹文珊的策劃下逃脫，並延聘律師向法院提出離婚訴訟。消息一出，國內各媒體隨即大幅報導這一新聞。上海《申報》在 8 月 27 日詳細報導了文繡脫逃的過程；報導指出，文繡表示他在溥儀家「絕對無行動自由，飽受凌虐」。<sup>54</sup>這件事對於清皇室而言當然很難堪，文繡逃走的隔日，溥儀便與近臣、遺老們開起御前會議，討論如何處理此事，但並無明確結論。

55

瀋陽《盛京時報》也報導了這項新聞，並在數日後的 9 月 2 日詳細刊載了文繡的離婚申訴；文章提到文繡在宮中倍受溥儀冷落，還遭遇言語恐嚇和精神壓力。這篇文章繪聲繪影地宣稱文繡「事帝九年未蒙一幸」，並稱文繡向律師泣訴希望能「依法保障我應享的人權」。<sup>56</sup>在接下來的一個月間，雙方透過律師交涉條件，而一些花邊新聞也在報端陸續出現。《盛京時報》對此公案的進展相當關注，不時登載相關消息，直至兩人最終達成離婚協議（見表 1-2）。《盛京時報》這一系列報導多半是放在具有八卦軼聞性質的「世界珍聞及其他」版，對於溥儀與文繡婚姻關係的種種敘述也頗有獵奇的色彩。此時期溥儀在報上的形象，顯然並沒有那麼體面。

表 1-2 《盛京時報》對溥儀、文繡離婚案之報導文章列表

日期	標題
09/01	事帝九年未蒙一幸 十年相隨依然處女 宣統淑妃之離異申訴
09/09	宣統妾因不堪虐待 曾做絕命書
09/12	宣統離婚案 溥儀出面調解
09/19	溥儀離婚案 雙方條件協商就緒 溥儀證明妃非處女
09/19	淑妃文繡之日記詩文
09/20	從溥儀與文繡離異說到妾與家長法律上之關係
09/21	從溥儀與文繡離異說到妾與家長法律上之關係（續）
09/22	寡人無疾 遜帝不喜女色說 淑妃離婚之重要原因
10/02	遜帝離婚案 贍養費與衣物件數 仍須磋商尚未解決

<sup>54</sup> 〈溥儀之妃提出離異〉，《申報》，民國 20 年 8 月 30 日第十二版。

<sup>55</sup> 《鄭孝胥日記》，民國二十年七月十三日（1931 年 8 月 27 日）。

<sup>56</sup> 〈事帝九年未蒙一幸 十年相隨依然處女 宣統淑妃之離異申訴〉，《盛京時報》，民國 20 年 9 月 2 日第三版。



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關東軍隨即開始與溥儀接觸，慫恿他前往滿洲。日本人想要擁立溥儀在滿洲稱王的傳言由來已久，早在他離開北京流寓天津時，便有報紙刊文隱射日方將利用溥儀在遼寧建立一獨立國；<sup>57</sup>而在九一八事變後，溥儀附日的傳聞更是甚囂塵上，中國國內公眾對溥儀則猜疑日深。<sup>58</sup>

可以確定的是，溥儀本人對於關東軍的提議相當動心，他也不特別避諱公開發表相關見解。溥儀在 10 月 13 日接受日本《朝日新聞》記者訪問時，雖然否認自己參與時下的滿洲獨立建國運動，卻也表示了「若國民對余之努力有所希望，余當為國盡此一身」的積極態度。<sup>59</sup>然而就在舉國關注溥儀進一步行動的當下，作為東北第一大報的《盛京時報》對溥儀其人的新聞處理卻與其他中外報紙迥然有別。

除了溥儀的離婚公案，1931 年九月到十月間，《盛京時報》還有若干條關於溥儀的報導，但多是逸事性質的花邊新聞，且內容與事變爆發後溥儀實際上的行動大異其趣：一則新聞稱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溥儀派遣羅振玉到北平探尋遷居回平的可能性。<sup>60</sup>之後的另一則後續新聞，則指出遷回北平的計畫已失敗，並對於當時盛傳溥儀將前往東北復辟的流言有如下評述：

……外間謠傳，其（溥儀）將遄歸瀋陽獨立帝制之說，據知者所云：溥儀為人，性本怯弱，對此並無若何表示。<sup>61</sup>

<sup>57</sup> 以下摘錄報導原文：「某國人今日實願投資於溥儀，而求日後之大收穫。某國料定與朝鮮接壤之某省將來必有變化，將俟其變化發生之時，勸其將溥儀迎回，自建獨立國，與中國宣告脫離關係。此等消息之真實性究有幾何，非吾人之所能預知。但異說紛傳，不能不令人無疑耳。」見〈溥儀秘密赴津之京津通信〉，《申報》，民國 14 年 3 月 1 日第六版。

<sup>58</sup> 例如鄭孝胥便在日記中記有「外人傳言，宣統帝已乘天潮丸行（赴東北）」（民國二十年九月初三，10 月 13 日）；此外，當時中國各地的抗日群眾運動，也常有針對溥儀而來的訴求，例如在上海縣的抗日宣傳週活動，群眾要求政府應嚴密監視溥儀的行動（〈抗日救國運動昨聞〉，《申報》，民國 20 年 10 月 1 日第十三版）；在無錫，當地商會會長錢孫卿去電溥儀，呼籲他「勿為日人利用」（〈地方通信·無錫〉，《申報》，民國 20 年 10 月 3 日第十二版），當時公眾對時事之認識由此可見一斑。

<sup>59</sup> 〈時之人宣統帝を訪ふ〉，《朝日新聞》，昭和 6 年 10 月 14 日朝刊第三版。據鄭孝胥在日記中所記，訪問是在 13 日進行。

<sup>60</sup> 〈清遜帝將返故都 或居清宮北海萬壽山〉，《盛京時報》，民國 20 年 10 月 8 日第三版。

<sup>61</sup> 〈遜清帝后妃向關帝廟求籤〉，《盛京時報》，民國 20 年 10 月 25 日第三版。



此外，這篇報導還聲稱溥儀的后妃託人到北平關帝廟求籤，並求得了這樣的籤詩：

南販珍珠北販鹽，水中撈月總徒然。勸君且省閒思慮，靜閉柴門得早眠。

62

很顯然地，這篇報導的真實性相當可疑，甚至不禁令人懷疑《盛京時報》製造這則新聞的用意為何。<sup>63</sup>無論如何，在當時的情境下，《盛京時報》對於溥儀其人的新聞處理與其他報紙相較，顯得異常低調。

與此同時，日本外務省對於事變後蠢蠢欲動的復辟派也相當關注。外務省在這段期間發往駐華各領使館的電文中，一再要求各領館應注意溥儀的動靜，警告他不要輕舉妄動，並阻止他離開天津；<sup>64</sup>外務省內部的分析，也顯示擁立溥儀成為新國家領袖無法取得國際輿論和滿洲當地居民的支持。<sup>65</sup>可以說，外務省自始至終都反對讓溥儀等人牽扯進滿洲的亂局中。《盛京時報》處理相關新聞的方式，似乎與外務省的立場遙相呼應。

《盛京時報》的這種曖昧態度也反映在溥儀赴滿洲之後的新聞處理上。11月8日，關東軍在天津策劃了一場「反日」騷動（天津事件），溥儀與一批近臣在日軍的協助下，於10日晚上趁亂離開天津，並在13日於營口上岸，進入滿洲。

《盛京時報》的報導聲稱，日方因人道考量決定收容溥儀，但不願他捲入政治紛爭，因此將限制他與外界的接觸。<sup>66</sup>之後溥儀便被關東軍軟禁在旅順，而他的身影也從《盛京時報》的版面徹底消失。

1931年十一月初，東北三省已宣告「自治」，滿洲「獨立建國」的方向已

<sup>62</sup> 〈遜清帝后妃向關帝廟求籤〉。

<sup>63</sup> 從這篇報導以及此「籤詩」出現的時機來看，我認為有可能是當時的某一勢力透過《盛京時報》表示不希望溥儀捲入滿洲亂局的意思。而能夠透過日資的《盛京時報》進行這一工作的，應以日本在滿洲的派駐機關、團體可能性最大。

<sup>64</sup> 〈溥儀の租界外脱出阻止について〉，昭和6年10月1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一卷第二冊，頁1；〈擁立運動に対し自重方溥儀に警告について〉，昭和6年10月1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一卷第二冊，頁1-2。

<sup>65</sup> 〈溥儀擁立運動の中止について〉，昭和6年11月1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一卷第二冊，頁18-19。

<sup>66</sup> 〈前清遜帝溥儀確在营口上陸 現由日本側慎重保護中〉，《盛京時報》，民國20年11月24日第四版。

經確定，《盛京時報》便將報導的重點放在新國家的政治體制問題。日本國內的報紙早在事變爆發後不久就開始討論在東北三省建立一共和國的構想；<sup>67</sup>十月初的報導則指出，滿洲當地人士對於新國家國體意見對立。<sup>68</sup>這類的新聞一直到十一月底，才開始在《盛京時報》出現，內容也不甚具體：一則新聞宣稱東北新政權將採用「聯邦共和制」，但此外並無太多資訊。<sup>69</sup>

張學良於十二月底放棄錦州後，東北三省大部已為日人控制，關東軍便著手整合事變後扶植的各地方政權。1932 年一月以降，《盛京時報》對於各地方的「自治」進程做了密集的報導；除了報導參與其事的重要人物（如臧式毅、熙洽、張景惠等）的相關言行，也報導了各地居民參與「自治運動」的情形。<sup>70</sup>2 月 17 日，各省領袖於奉天（其時瀋陽已更名奉天）集會正式商討建國事宜，並於 19 日發表獨立宣言，宣佈將建立一新國家。

儘管各種政治活動如火如荼地進行，溥儀卻直到 2 月 20 日才總算又在報端現身。這篇報導指出，新國家元首人選溥儀「絕對有望」。<sup>71</sup>24 日的《盛京時報》又以全版刊載了溥儀前半生的事跡。這篇文章形容溥儀「英語流暢」、「對思想方面亦有研究」，還形容他雖看似體弱，卻注重健康、喜好運動，並說他對待「帝師」陳寶琛禮數非常周到；但對於他為何有此資格擔任新國家的元首，則未置一詞。<sup>72</sup>

而事實上，溥儀本人對於新國家不採行帝制的安排相當抗拒。他先是派羅振玉和鄭孝胥前往奉天與關東軍溝通，又於 23 日與板垣征四郎會面，最後才勉強同意出任新國家的「執政」。<sup>73</sup>在一切定案後，各地響應「建國」的活動在二月下旬展開，報端每天可見各地群眾集會擁護新國家的新聞。這類活動大都強調東北民眾在軍閥統治下的困頓，主張新國家的成立合乎民意，希望新國家行「王

<sup>67</sup> 〈東北各省呼応して 滿蒙獨立運動進展す〉，《朝日新聞》，昭和 6 年 9 月 28 日朝刊第二版。

<sup>68</sup> 〈共和、帝政の兩派 端なくも対立〉，《朝日新聞》，昭和 6 年 10 月 3 日朝刊第二版。

<sup>69</sup> 〈東北獨立新政體 採取聯邦共和制〉，《盛京時報》，民國 20 年 12 月 1 日第四版。

<sup>70</sup> 〈隴畝閭里間不期而同聞 新政更始聲不容忽視〉，《盛京時報》，民國 21 年 2 月 1 日第四版。

<sup>71</sup> 〈新國家之元首 溥儀絕對有望〉，《盛京時報》，民國 21 年 2 月 20 日第四版。

<sup>72</sup> 〈春風秋雨歷二十載 曾不知幾掬傷心淚 將膺元首之溥儀半生衰史〉，《盛京時報》，民國 21 年 2 月 24 日第四版。

<sup>73</sup>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頁 219-226。

道政治」等等。<sup>74</sup>此外，報上也刊載了制定國旗、國都、年號的各項消息。3月1日，正式發表滿洲國建國宣言，並決定於9日舉行建國式。

在建國式舉行之前，關東軍還安排了萬民擁戴的「請願」戲碼。3月1日，張燕卿、謝介石等人代表「全滿促進建國聯合大會」前往旅順向溥儀請願，請他出任新國家的元首。在行禮如儀的婉拒之後，第二次請願代表團於5日再度拜見溥儀勸其出山，溥儀這才表示接受，並由旅順出發前往長春就職。途經湯崗子時，又接受了臧式毅、張景惠等人「迎駕」。9日，溥儀在簡單的儀式後就職成為「滿洲國執政」。

《盛京時報》在3月10日詳細報導了溥儀抵達長春以及建國式的情形。報導稱有「紳商萬餘人」在長春車站迎接溥儀，並稱有遺老、旗人以跪拜禮接駕。<sup>75</sup>另外有一篇文章回顧了溥儀前半生的經歷，稱他「含辛茹苦，而從事於學問之研究」、「思想開豁」，「固一活潑潑地文質俱秀、可作模範之俊士也」。<sup>76</sup>這篇文章還簡短論證了溥儀所以能出任滿洲國元首的資格。對於極力避免使人將滿洲國與清朝復辟聯想起來的關東軍，和亟欲復辟而不可得的溥儀本人而言，這樣的歸結不免顯得有些諷刺：

……執政今日所以得海內百姓之愛戴者，誠以元首當年為清朝皇帝，曾君臨天下四百餘州，而祖先發祥於白山之間。數百年來，實造福於滿州（洲）之臣民耳。<sup>77</sup>

### 第三節 小結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的兩個月間，東北局勢處於混沌不明的狀態。儘管事變本身是經過了外在條件的長期發展，以及關東軍內部長時間的醞釀、策劃造成的結果，然而事變後的事態發展卻令人難以掌握。究其原因，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

<sup>74</sup> 例如在2月26日，《盛京時報》刊登了東北各地擁護滿洲獨立的集會消息。大石橋「建國促進大會」的宣言指出，東北民眾在「軍閥擅權」以來，「屢受苛政誅求，軍擾匪劫」，因此民意亟望建立一新國家；在奉天，「市民促進建國運動大會」一致通過決議文，聲稱在軍閥治下「民不聊生」，並希望新國家能行「仁政」，消除盜匪等等。

<sup>75</sup> 〈執政入都記〉，《盛京時報》，大同元年3月10日第一版。

<sup>76</sup> 〈執政溥儀之略歷〉，《盛京時報》，大同元年3月10日第一版。

<sup>77</sup> 〈執政溥儀之略歷〉。

在未獲得政府授權的狀況下獨斷進行的；而在事變爆發後，政府與軍方對於後續處理的方針也沒有共識。在政府與軍方不同調的情況下，滿洲的戰況持續擴大，處於被動的政府只能一再追認軍方的行為並為之辯護。

官方政策的搖擺不定也反映在媒體的報導上。《盛京時報》在立場上無疑傾向日本，也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日方在滿的利益，於是一般常會認為這類日資媒體在事變前後為日軍大肆宣傳，是侵略的幫兇。但詳細爬梳事變爆發後該報對相關事件的報導，卻可發現其論述欠缺一致性，也看不出有明確的整體論述策略。一方面，《盛京時報》在立場上可能較接近外務省，不見得真正支持軍方的擴張行為以及擁立溥儀建立新國；另一方面，作為一份面向中國讀者的中文報紙，《盛京時報》也必須顧及其讀者群的觀感。此外，這種現象也可以說明，事變初期關東軍並無法全盤掌控媒體輿論，也無法透過媒體對滿洲地區的居民進行組織性的、有效的政治宣傳。直到「建國」已經箭在弦上，《盛京時報》才較積極地鼓吹滿洲獨立的正當性。

從媒體的報導以及一些檔案資料中，可以發現滿洲國的成立是非常匆促的。關東軍藉由武力與謀略，結合當地的各種勢力促成了這個國家的誕生，但對於當地居民而言，卻顯然欠缺對這個橫空出世的新國家效忠的動機。儘管日本人策劃了種種塑造輿論的活動，但當地居民對這些論述的接受程度如何卻相當可議。本應發揮關鍵作用的媒體，在這方面的作為卻相當有限。從現有的一些資料，可知當地居民對於滿洲國的態度相當冷淡。<sup>78</sup>

《盛京時報》對於溥儀其人的報導也証實了滿洲國建國過程的倉促。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夕，溥儀在媒體上的形象可說不甚體面；事變爆發後，在報社特意低調的報導方針下，溥儀一直無法在滿洲的主流媒體版面上有所表現，也就難以在當地人民心中形成較正面的形象。直到他被推為新國家的元首，他在報上出現的頻率都非常有限；報上對他的描述，也無法直接與政治領袖所需的特質聯結起來。可以想見的是，除了一些遺老、旗人的支持，溥儀在滿洲國建國前後並不具

<sup>78</sup> 例如日本駐哈爾濱總領事館於 1932 年四月向外務省提出的報告中，指出在滿洲里，當地商會強烈反對新國家；雖舉辦了慶祝建國集會，市內也張貼許多文宣、懸掛滿洲國旗，但只是「依警察及市會命令而行，一般（市民）對新國家認識之程度仍極淡薄」。這類資料除了顯示當地居民的態度，可能也顯示出滿洲國初期對於地方（特別是黑龍江、興安地區）的控制仍相當薄弱。見〈滿洲里市民の滿洲国に対する批判的態度について〉，收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滿洲事變》第二卷第一冊，頁 493。

備真正的民意基礎。這個在外力作用下倉促成軍、根基薄弱的國家，將來勢必需要持續強化、爭取人民的認同，才可能維續其統治。







圖 1-1 滿洲國地圖（1933）





圖 1-2（左）

1931 年 9 月 19 日日軍進入  
瀋陽



圖 1-3（下）

1932 年 2 月「建國會議」。  
左起袁金鎧、臧式毅、熙  
洽、張景惠、馬占山、趙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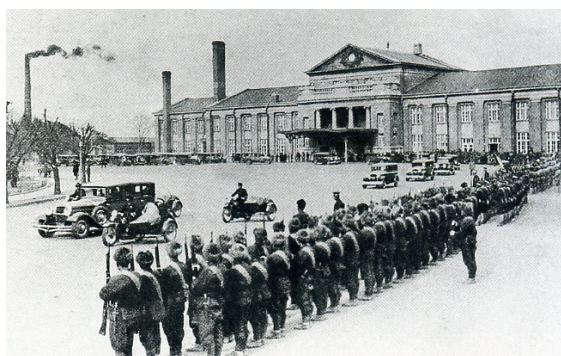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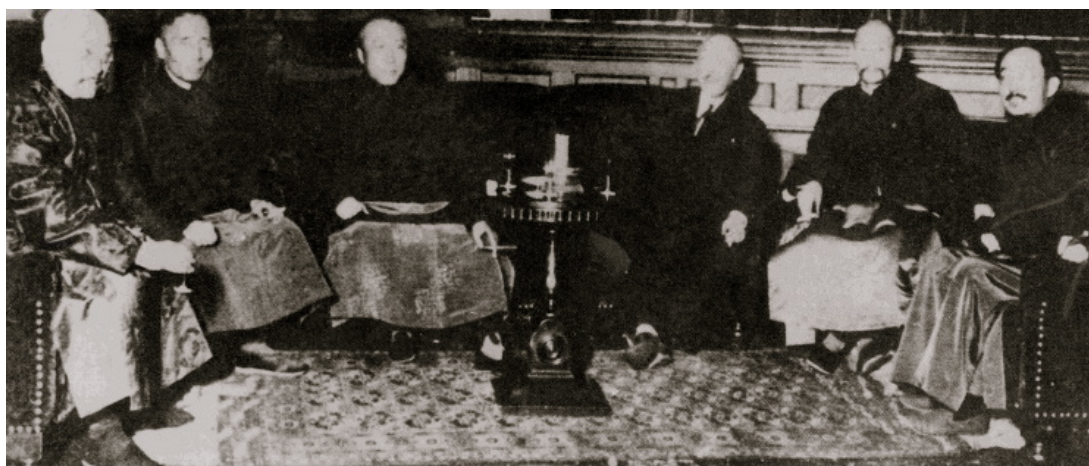


圖 1-4（上）

溥儀抵達新京（長春），1932 年 3 月  
8 日。

圖 1-5（左）

《盛京時報》對於溥儀就任執政的報  
導，1932 年 3 月 9 日。





## 第二章 願禔天之明命：「皇帝」登極

溥儀之所以和日本人合作，參與滿洲國，其目的自然是在謀求清王朝的復辟。在滿洲國成立初期，溥儀與其支持者、復辟派仍一再尋求復辟的機會。然而對關東軍而言，建立滿洲國的目的是要將滿洲從中國分離出來。既然如此，便必須否認滿洲國是清王朝的延續。於是自籌劃「建國」以來，關東軍以及日本當局一直以相當謹慎的態度處理滿洲國的國體問題。溥儀在 1932 到 34 年間的「執政」頭銜，便是關東軍的主事者們經過反覆思考形成的產物。溥儀直到建國兩年後才終於冠上了皇帝的尊號，成為滿洲國皇帝。

對於滿洲國帝制的形成，目前學界一般認為是關東軍希望能藉由施行帝制強化滿洲國的中央集權，並藉此確立關東軍對滿洲國政治的指導性角色。帝制建立之後，透過地方省份的分割重劃以及中央政府機關的改制、人事調度，關東軍以及「日系」官僚在滿洲國政府的地位逐漸提升，最終成為了這個國家的主導力量。

滿洲國帝制的建構，關係到這個國家的政治論述、意識形態，也與國家的合法性基礎緊密相關。那麼當時生活在滿洲國的民眾又是如何認知帝制的成立呢？他們會如何看待這位「皇帝」的粉墨登台？國家機關是如何論述建立帝制的必要性和正當性？溥儀作為皇帝的權威又是怎麼被建構出來？而這些論述又是如何透過各種管道展示在人民面前？

本章將會分析滿洲國建國後，官方對於政權正當性、合法性的各種論述，以及帝制成立前後出現在新聞媒體上的各種相關報導、評論，討論時人對於滿洲國帝制建構的可能認識。

### 第一節 「民為邦本」：政權合法性、國體問題與帝制運動

滿洲國的「獨立」，其前提必須是在法理上與中國分離並立。於是在滿洲國建國以後的各種文件中，均可見到論證滿洲自古即不屬於中國的論述。如鄭孝胥便從歷史的觀點提出，滿洲本是愛新覺羅氏的領土，而中國則是在後來併入，成

為清帝國領土的一部份；因此當清帝國瓦解，放棄對中國的統治，滿洲與中國的關係便也終結了。<sup>1</sup>

另一方面，關東軍的主事者們也注意到，復辟清朝在當時並不是一個能引起多數人民共鳴的理念；<sup>2</sup>但在建構新國家的過程中，溥儀作為前清遜帝的身份卻讓他更有利用價值。<sup>3</sup>那麼，又要如何論述溥儀在滿洲國的地位，以及他擔任國家元首的合宜性呢？鄭孝胥雖然聲稱滿洲國的成立與溥儀出任新國家元首是出於大多數滿洲人民的意願，與清室的復辟無關，但他也指出，溥儀出面主持滿洲國，是回歸故土「奪還祖業之一部」：

……辛亥革命（A.D. 1911）時……革命軍承認皇室優待條件，保障繼存皇帝之稱號……在理論上觀之，繼承當時革命軍政府權利存續之國民政府，對清廷仍然負履行和議條件之義務……國民政府對於溥儀氏，年來不交付優待年金，且褫奪其尊號，並由宮闈驅逐等之暴戾的行動，完全違反辛亥革命時之誓約……故國民政府，全無繼承清廷版圖之權利，就中如滿洲宗主權，亦當然有復歸溥儀氏之掌中之性質者也。<sup>4</sup>

由這樣的論述來看，溥儀作為新國家元首的正當性來源，還是與他前清遜帝的身份有直接關係。

滿洲國當局將人民的「意願」與國民政府／張家政權的「惡政」作為其政權合法性的來源，而國體問題與政權合法性來源的論述頗有關聯。滿洲國「建國」時發佈的〈滿洲國建國宣言〉批判民國政權的失德失能，並以此論證滿洲人民「自立」的合法性。這篇由鄭孝胥起草的〈宣言〉宣稱，國民政府「黨國」體制下的

<sup>1</sup> 鄭孝胥，〈滿洲建國溯源史略〉，收入滿洲國文教部編，《普及建國精神之教育資料第一集》（新京：文教部，1932），頁 54-70。「滿洲自古為一獨立國」的主張在當時是正當化滿洲國獨立的重要依據之一，因此可說是當局宣傳的重點。同樣的，這套歷史觀也藉由學校教育向滿洲的兒童、學生灌輸。相關研究可見周婉窈，〈歷史的統合與建構〉。收入氏著，《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臺北：聯經出版，2012）。

<sup>2</sup> 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国の肖像》（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4 增補版），頁 146-148。

<sup>3</sup> 山室信一指出，關東軍之所以選擇溥儀作為新國家的領袖有幾個原因：一、身為前清遜帝的聲望；二、滿人出身，「回歸故里」出任新國家元首可望減輕國際輿論的攻擊；三、溥儀強烈反對國民政府，與蔣介石、張學良合作的可能性極低；四、溥儀本身無政治實力，需要仰仗關東軍支持；五、溥儀非地方派系出身，因而有較超然的象徵意義，可以避免地方派系間的分裂。見氏著，《キメラ——滿洲国の肖像》，頁 142。

<sup>4</sup> 鄭孝胥，〈滿洲建國溯源史略〉。

中國「民怨沸騰，無不痛心疾首於政體之不良，而追思曩昔政治清明之會」。<sup>5</sup>〈宣言〉直指二十年以來的亂象代表了民國政體的失敗，於是滿、蒙地區人民，在日本出面干涉的契機之下「自脫於政治萬惡國家範圍之外」，並主張「為政不取多言，只視實行如何；政體不分何等，只以安集為主」，強調新國家將會以恢復秩序為己任。<sup>5</sup>

頗堪玩味的是，鄭氏雖然明白否定了民國的政體，甚至隱隱然暗示了他支持復辟的立場，卻沒有明確指出他所屬意的理想政體。對於鄭孝胥等復辟派而言，若能實施帝制當然是最為理想；但在現實條件的限制下，「執政制」便是相對可接受的妥協性結果。<sup>6</sup>此外也正如山室信一指出的，「執政制」可以凸顯新國家相對於共和制的中華民國在政體上的優越性。<sup>7</sup>

「執政制」下的滿洲國政府在制度設計上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化的政治體系。依照 1932 年頒布的《政府組織法》規定，執政擁有幾近「準帝制」的獨裁權力。<sup>8</sup>然而滿洲國的成立，相當程度上得力於各地方派系的妥協與支持，於是在建國初期，各省省長仍握有相當大的財政、人事權力。<sup>9</sup>在地方社會基層，中央當局的實質的控制能力也有限，甚至在建國一段時間後還有地方人士對於「新國家」的情況不甚了了。<sup>10</sup>

目前學者多半將滿洲國帝制的成立視為關東軍強化對滿支配的手段。解學詩認為，經由對帝制的支持，關東軍也藉機再度確認了日本方面對滿洲國國家政策的指導權。<sup>11</sup>山室信一則認為，當時已自國際聯盟退出的日本，不再需要在滿洲維持一個在意識形態上對抗中華民國的立憲共和制的政體。<sup>12</sup>樋口秀實則進一

<sup>5</sup> 鄭孝胥，〈滿洲國建國宣言〉，收入滿洲國文教部編，《普及建國精神之教育資料第一集》，頁 1-3。

<sup>6</sup>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頁 222-226。

<sup>7</sup> 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国の肖像》，頁 149。

<sup>8</sup> 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国の肖像》，頁 153-154。「準帝制」一說出自駒井德三（1885-1961）。駒井是滋賀縣人，歷任滿鐵、外務省、陸軍省各項職務，於 1932 年出任滿洲國首任「國務院總務廳長官」，任內強力主導政務，與時任總理鄭孝胥多有齟齬。

<sup>9</sup> 解學詩，《偽滿洲國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 224。

<sup>10</sup> 在 1933 年 3 月滿洲國建國一周年時，在鐵嶺的慶祝大會上有人懸掛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遭到滿洲國國務院發文糾正；興安局總長齊默特色木丕勒亦曾發文，糾正下轄學校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使用民國教科書。見興安局訓令第 38 號，《滿洲國政府公報》。

<sup>11</sup> 解學詩，《偽滿洲國史新編》，頁 207-208。

<sup>12</sup> 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国の肖像》，頁 223。

步指出，滿洲國帝制之形成，牽涉到滿洲國擁護帝制的「帝政派」官吏與「土著派」政治人物的鬥爭。他們與日本陸軍高層的「皇道派」合作，希望達成滿洲國的中央集權化，從而推動了滿洲國帝制的形成。<sup>13</sup>大致來說，學者一般認為國體的變動代表了日本勢力在滿洲國的提升，以及東北舊有地方勢力的衰微。那麼，當時的人對於這一過程有什麼樣的認識呢？

滿洲國建國之後，坊間就已有不少溥儀意圖復辟為皇帝的傳聞。<sup>14</sup>但直到1933年七月，時任關東軍司令官的武藤信義才向滿洲國總理鄭孝胥提及於翌年實施帝制的可能性。<sup>15</sup>同年十月，關東軍司令官菱刈隆正式向溥儀告知，日本方面將支持他登基為滿洲國皇帝。<sup>16</sup>隨後關東軍方面便開始與鄭孝胥等商議相關事宜；12月26日，滿洲國政府重要官員集會，決定溥儀於翌年3月1日即帝位，並設籌備委員會。<sup>17</sup>一月初，國務院、參議府等機關相繼集會，並起草「建議書」。此外，當局也開始策動各地方政府發起「勸進」活動。<sup>18</sup>

上海《申報》在當年十月報導滿洲國將建立「君主立憲政體」。<sup>19</sup>十二月，《申報》的報導指出「滿洲盛傳溥儀不久將宣佈為帝」；這篇報導指出這類消息當下尚無法証實，但是「近十二個月以來，屢有此種傳聞，群眾蓋已慣聞之矣，但彼等皆信日人遲早必以溥儀為帝」。<sup>20</sup>這篇報導顯示，當時在滿洲以及中國內

<sup>13</sup> 樋口秀実，〈滿洲国皇帝制度の成立と皇帝即位儀礼〉，《国史学》第200号(2010：東京)，頁159-163。

<sup>14</sup> 如上海《申報》即有熙洽、榮厚等人意圖運作溥儀登極，卻遭到時任關東軍司令武藤信義喝止的新聞。見〈溥儀僭位失敗〉，《申報》，民國22年2月2日第十二版。此文內容並無實證，可能是數則虛實傳聞彙整而成，但由此可以想見溥儀意欲復辟應是時人共同的認知。

<sup>15</sup> 中田整一，〈滿洲国皇帝の秘録—ラストエンペラーと「嚴秘会見録」の謎〉（東京：幻戯書房，2005），頁122-123。

<sup>16</sup>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頁259-260。菱刈在武藤信義於33年七月暴卒後接任關東軍司令官兼日本駐滿大使。

<sup>17</sup> 《鄭孝胥日記》，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1933年12月26日）。

<sup>18</sup>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011795000、昭和9.3.6~9.3.31「滿受大日記（普）其32/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鄭孝胥日記》，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廿四日（1934年1月9日）條：「金壁東來遞（新京）特別市區勸進表。熙洽來遞吉林全省官民勸進表。孫其昌遣林康年來遞黑龍江官吏勸進表。」

<sup>19</sup> 〈偽國之前途〉，《申報》，民國22年10月26日第七版。該報導指出，時任滿洲國立法院長的趙欣伯之所以赴日考察憲政，是要替滿洲國的君主立憲政體做準備；日本報刊也在該年七月報導了趙欣伯赴日考察憲政的新聞，並稱趙氏宣稱滿洲國「鑒於建國之精神及支那共和政體之失敗決採君主政體」。見〈溥儀氏を皇帝に 滿洲国君主制へ〉，《朝日新聞》，昭和8年7月15日第二版。

<sup>20</sup> 〈東北謠傳溥儀竟欲稱帝〉，《申報》，民國22年12月21日第三版。

地，一般咸信溥儀將在日人的扶持下登上帝位。

另一方面，東京《朝日新聞》也在十二月報導滿洲國內開始出現滿洲國人「擁戴」溥儀稱帝的活動。<sup>21</sup>相較之下，奉天《盛京時報》一直要到1月5日才刊出將「發表重大聲明」的消息；<sup>22</sup>12日才開始報導帝制運動的開展：

對完整滿洲國基之希望，已瀰漫於全滿之內。三千萬民眾，爭先恐後，向政府請願或建議……對於溥儀執政，速就帝位之渴望，日益高漲，呈人心歸一之勢；而帝制運動，遂因之出現。……<sup>23</sup>

之後《盛京時報》每天以一定篇幅報導帝制運動的進展以及各地人民對溥儀的「擁戴」。在日後的新聞報導及相關宣傳中，「完整國基」、「奠定國本」之類的詞彙不時出現，成為當局宣揚施行帝制之合法性的重要概念。「奠定國本」這一概念在當時的滿洲國社會下，常被用以表示國家成立未久，因此須建立體制，使國家運作漸上軌道。這個概念的使用，必須與君主制的優越性結合起來。那麼當時的這些作者，是如何論證君主制的優越性呢？

滿洲國建國以來，即宣稱以「王道主義」作為立國的理念。正如林志宏指出的，滿洲國揭櫫的「王道」內涵相當龐雜，它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因各種參與其中的理念、利益力量的角力，產生了多樣甚而彼此矛盾的內容。<sup>24</sup>但大體上，滿洲國在建國之初所建構的「王道主義」，是要透過強調儒家綱常倫理，建立一新的政治、社會體制，一方面抗衡西方帝國主義的擴張，另一方面則重建辛亥以來因革命運動而遭破壞的傳統社會秩序；此外，也是要消除民族革命理論中的反滿民族主義。在這樣的定義下，王道主義的實踐必然會導向支持建立君主制政體，以回復舊有的綱常倫理。於是，在此時期鼓吹建立帝制的種種言論，會以儒家傳統道德規範作為主要論述，便是理所當然的選擇。例如其中一位作者便這樣寫道：

……凡是人類，就必須要有道德；既有道德，就必須要有綱常倫理……君臣

<sup>21</sup> 〈突如、滿洲國に帝政運動起る〉，《朝日新聞》，昭和8年12月9日第三版。

<sup>22</sup> 〈奠定百年邦基 歲首定於都門 日內發表重大宣言〉，大同3年1月5日第二版。

<sup>23</sup> 〈白山黑水普天率土 帝制運動方興澎湃〉，《盛京時報》，大同3年1月12日第四版。

<sup>24</sup>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2009），頁344。

一倫，尤其重要……有了君主，就有名分，就有上下尊卑的秩序；有了君臣，就有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凡屬人民，就應該脩明綱紀、尊重倫常，……是這樣社會就自然安寧，國家就自平治……<sup>25</sup>



除了建立理論的支持，民國共和政體的腐敗失能也是映証建立帝制之正當性的元素。《盛京時報》在當年 1 月 20 日發表的社論便如此陳述：

滿蒙各地之人民，關於帝制之運動，蓋不自今日始。溯自民國以來，滿蒙各地，幾於無時不有此項運動。誠以民國以來，名雖共和，實不過少數黨人之專制。<sup>26</sup>

1 月 20 日，國務院正式宣告將在同年 3 月 1 日建國兩週年時改行帝制。在國務院的宣言中，對於帝制的施行，強調滿洲國蒙「皇天眷佑」，而「百姓又發至情竭誠，請願我執政順天登極」，稱帝制的施行是「順天應民」的結果。<sup>27</sup>滿洲國官方輿論在向公眾論述施行帝制的正當性時，多半都延續著類似的論調：建立帝制是出於人民對溥儀的擁戴，確立國體才能真正施行王道政治云云。那麼溥儀的民意基礎又是從何而來呢？以下將以「協和會」推動的請願活動為例加以說明。

協和會是一個半官方的政治團體，其前身是在石原莞爾等人於九一八事變後主導成立的「自治指導部」。自治指導部在事變爆發後積極介入各地的「自治」運動，策動鼓吹獨立建國的輿論。滿洲國建國後，石原希望能建立一個仿義大利法西斯政權的「一國一黨」政治體系，主導國家意識形態的走向，並且透過「黨」深化對滿洲國基層社會的控制。石原將自治指導部改組為政黨形式的協和會，然而這一機構後來並未能發揮石原最初設想的功能，而逐漸演變成爲關東軍的外圍團體，從事各種宣傳活動。

1934 年一月中旬，滿洲國各大小城鎮均發起了支持帝制的請願大會。協和會於 1 月 18 日在奉天省城主辦市民大會，會中奉天各界代表聯合發表宣言支持

<sup>25</sup> 〈帝制由來及命意〉，《盛京時報》，康德元年 3 月 1 日第十版。

<sup>26</sup> 〈帝制之必然性〉，《盛京時報》，大同 3 年 1 月 20 日第一版。

<sup>27</sup> 〈天長地久邦基永固 大滿洲君主國〉，《盛京時報》，大同 3 年 1 月 21 日第一版。

溥儀即帝位。這篇宣言聲稱溥儀受全國人民景仰，且「王道之行，必待王者王天下者也」，而「執政」頭銜無法彰顯「王者」氣度威嚴；「我國」自三皇五帝以來「聖聖相承」、「代有賢君」，已成慣例。<sup>28</sup>這篇宣言還提及溥儀身為前清遜帝，受到滿洲國各民族的擁戴：

執政昔為漢滿蒙回藏各族之共主，凡此諸族之熱望帝政，自不待言。即今日之寓我之日鮮各族，亦莫不萬人一心，如望雲霓。故早一日實施帝政，各族早一日感覺得所……<sup>29</sup>

作為協和會主辦的活動，這場大會的官方性質是相當明確的，但即便如此，溥儀遜帝的身份卻仍是論述的重點。這種論調雖看似與官方否認帝制是滿清復辟的立場相悖，卻在媒體上不斷出現，進入當地人民的視野。

這篇宣言所呈現的另一面向，則在於它試著強化滿洲國境內諸民族團結一致的願景，爭取滿洲國境內各民族的認同。在滿洲國建國的政治理論當中，「五族協和」一直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正如邵丹的研究指出的，「五族協和」的理論是要凸顯出辛亥革命前後中國社會瀰漫的反滿民族主義，並藉由這樣的操作與中華民國的「五族共和」論述相抗。<sup>30</sup>

在這方面，《盛京時報》滿族記者、小說家穆儒丐（1884-1961）的紀實長文〈登極恭禮記〉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子。<sup>31</sup>〈登極恭禮記〉自3月1日開始在《盛京時報》上連載，穆氏是以《盛京時報》記者的身份前往新京參與大典，奉報社的要求寫一篇儀典紀實。穆儒丐在此文中記敘了他參與登極大典的見聞和感

<sup>28</sup> 〈市民大會盛況〉，《盛京時報》，大同3年1月19日第四版。從這段引文中的「我國」二字，可以一窺宣言起草者想像的滿洲國與「中國」之間在歷史、文化上或有互為承繼的關係。因與論文主旨關係較遠，故於註腳略加說明此點。

<sup>29</sup> 〈市民大會盛況〉。

<sup>30</sup> Shao Dan, *Remote Homeland, Recovered Borderland: Manchus, Manchukuo and Manchuria, 1907-1985*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pp. 139-141.

<sup>31</sup> 穆儒丐，北京出身正藍旗人，原名穆都哩，漢名寧裕之，係民國初年於東北地區活躍的小說家，著有《徐生自傳》、《北京》等作品，並有一些譯作，如法國作家 Victor-Marie Hugo 的《哀史》（原題 *Les Misérable*，今多譯為《悲慘世界》）。穆氏自日本留學歸國後即加入《盛京時報》，曾任該報文藝版「神皋雜俎」的編輯，對於東北現代白話文學的提倡、發展頗有貢獻。關於穆氏生平經歷，可參考長井裕子撰、莎日娜譯，〈滿族作家穆儒丐的文學生涯〉，《民族文學研究》2006年第2期（北京），頁163-170。

穆氏陳述溥儀因受滿洲人民擁戴而稱帝，並強調登極儀式對於東方君主的重要性以及施行王道、促進道德的國家理念，<sup>33</sup>接著他又將焦點轉向民國以來滿族在中國社會的處境。身為滿人，他抱怨中國社會和國民黨政府對於滿族充滿敵意與不信任，甚至視滿人爲非我族類的「夷狄」。<sup>34</sup>穆氏並稱在此情況下，滿族只能回歸滿洲故土與「血親」（蒙古人）、「友邦」（日本人）一起「獨樹一幟」了：

……自己不說是滿人還好，一說出來自己是滿人，那你的公權就被剝奪了……滿族中一個小主人，尚且不許他安寧過活，使他無處存身，私財墳墓，一切都被奪了，讓他怎麼辦呢？他惟有希望他最初發祥的故鄉了……你不要我，我躲開你還不成嗎？<sup>35</sup>

此外，穆儒丐也盛贊清朝對臣民的恩德，稱「大清國沒有一個昏君」；他還認爲，滿洲國的「康德」年號，其本意大概是在「仰體康熙大帝之德」。<sup>36</sup>「康德」年號是否確與康熙有關，尚無直接證據可稽，但穆氏這樣的論述或許可以反映當時人的一些想像，同時也映証了帝制的支持者在有意無意間，仍以清代的歷史作爲一種論述的資源。<sup>37</sup>在《盛京時報》於登極儀式後刊登的另一篇報導中，也可見到類似的論調：

凡事因為利害相反，常行反目之蒙古人、漢人，關於實施帝政，各因自己的立場，極度謳歌帝政。即蒙古人認爲清朝歷代之皇帝，對我等施仁政其恩亦不能忘。此非為復辟，但得奉戴溥儀皇帝為我等之君者，實蒙古人非

<sup>32</sup>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穆儒丐在行文間以一介百姓自居，但從他有資格列席登極儀式一事來看，他的身份恐怕也並不只是單純的平民，而仍可能與當局有一定程度的關係。

<sup>33</sup> 儒丐，〈登極恭禮記〉，《盛京時報》，康德元年3月1日第一版、3月2日第一版。

<sup>34</sup> 儒丐，〈登極恭禮記（續）〉，《盛京時報》，康德元年3月2日第一版。

<sup>35</sup> 儒丐，〈登極恭禮記（續）〉，《盛京時報》，康德元年3月4日第一版。這段引文中的「小主人」應是暗指溥儀。

<sup>36</sup> 儒丐，〈登極恭禮記（續）〉，《盛京時報》，康德元年3月2日第一版。

<sup>37</sup> 在決定新年號時，原本亦傳出將以「啓運」作爲年號，但後來即放棄此構想。根據日本《朝日新聞》的報導，「康德」二字是由溥儀親自選定，取《尚書·說命》「俾率先王，迪我高後，以康兆民」，以及《論語·爲政》「道之以德」的典故而成。見〈滿洲国の年号「康德」と變更〉，《朝日新聞》，昭和9年2月22日朝刊第三版。



常感謝之事。一方面漢人不能忘清朝時代蒙地施政之恩，得溥儀皇帝為滿洲國皇帝，漢人甚為欣喜。於是常相反目之蒙漢人，觀其共仰陛下之德，則於過去常常相爭之蒙漢人感情，依皇帝之仁德，其抗爭亦能緩和。<sup>38</sup>

然而以關東軍的立場而言，卻也必須極力避免世人將滿洲國帝制與滿清復辟聯繫起來。如前所述，日人扶植滿洲國的目的，原本就是希望能藉此將滿蒙地區從中國分離出來，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之下，因此也就必須建立滿洲與中國在歷史上、現實上互不相屬的的論述。於是在滿洲國政府於1月20日發表的正式宣言中，便又一次否認了滿洲國帝制與滿清復辟的關聯：

再此次實施帝制，乃我滿洲國運發展之歸結，亦其建國之理想及其使命，益加發揚，國基益加鞏固，而藉以永保東亞和平之福。若誤以為清朝之復辟，則殊非忠於建國之理想與使命之政府所取者也。<sup>39</sup>

在國內進行的種種活動以外，此時期滿洲國內媒體論述也相當重視來自外國的反應。自李頓報告書否定滿洲國政權的地位正當性之後，各主要國家對滿洲國多採取不承認的立場，但仍保留派駐東北各城市的領事館，執行與滿洲國當局實質上的外交往來。對於近代國家而言，國際承認畢竟是國家合法性的重要指標，滿洲國當局也透過許多方式意圖在外交上有所表現。

1月20日，《盛京時報》刊登消息，指出英國政府在與滿洲國方面交涉後，決定將駐奉天總領事館遷往新京，並改歸入駐日大使館轄下；<sup>40</sup>在同日的同一版面上，還刊登了滿洲國駐日公使館將升格為大使館的消息。<sup>41</sup>《盛京時報》主筆菊池貞二在署名社論中，引用外文報紙評論，稱各國已有與滿洲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之輿論出現，同時歐美各國紛紛派員來滿考察訪問；他以這些對外往來的例子指出，在滿洲國帝制行將成立之際，國家的國際地位正在日漸提升。<sup>42</sup>從這類

<sup>38</sup> 〈實施帝制以後漢蒙抗爭緩和〉，《盛京時報》，康德元年3月10日第四版。

<sup>39</sup> 〈天長地久邦基永固 大滿洲君主國 最高宣言已煥發矣〉。《盛京時報》，大同3年1月21日第一版。

<sup>40</sup> 〈英國擬在新京開設總領事館〉，《盛京時報》，大同3年1月20日第二版。

<sup>41</sup> 〈駐日使館升格為大使館 本年內可實現〉，《盛京時報》，大同3年1月20日第二版。

<sup>42</sup> 傲霜庵，〈滿洲國與駐外員〉，《盛京時報》，大同3年2月9日第一版。

報導的頻繁出現或可推論，當局有意藉由強調將來可期的國際承認，強化滿洲國政權在人民心目中的正當性地位。

滿洲國當局宣稱帝制的施行是基於「天意」；而這裡的「天意」實際上是要以滿洲國人民的「民意」支持作為基礎。在詳加考察當時所謂「民意」形成的過程，可以發現其中明顯有著許多人為斧鑿的痕跡。滿洲國與關東軍的主事者們將「民意」與傳統道德價值聯繫起來，建構滿洲國這個國家以及其皇帝制度的正當性；但這樣的論述策略，卻必然要借用清帝國所遺留的種種政治、歷史遺產方能完成。於是在討論滿洲國帝制正當性之建構時，也就不能忽略論述本身與上位的國家意識形態、下位的實際操作層面之間隱然存在的矛盾。

## 第二節 「天與人歸」：即位儀式與慶祝活動

滿洲國當局在 1933 年十月中旬開始就針對即位儀式的規劃進行討論。<sup>43</sup>大致而言，即位當天的儀典有幾個部分：祭天儀式、登極儀式以及各種慶祝活動。這些活動佔據了滿洲國內各種傳媒的主要版面，將 1934 年一月以來官方努力主導營造的社會輿論氛圍推上高潮。

在這場儀典中，中國傳統皇帝制度的元素與近代性的元素並陳於其中。樋口秀實的研究指出，關東軍與日系官僚希望將滿洲國塑造成一個「以日滿合作為中心，五族協和為經綸的嶄新國家」，這一概念與中國傳統政治秩序的概念相結合後，便刻劃出滿洲國作為「受天命即帝位之皇帝統治的近代國家」的圖像。在這樣的前提下，樋口認為滿洲國皇帝的即位儀式雖在形式上倣效傳統中國「二重禮儀」的特性，經過「祭天」與「登極」完成整個即位的儀式，但事實上卻也在「登極」的儀式中展現了這個國家的近代性元素。樋口氏還指出，這場即位儀禮反映了滿洲國這個國家的「性質」，<sup>44</sup>那麼，這裡所說的「性質」又是怎麼呈現在當時社會大眾眼前的呢？

在實施帝制的宣言於 1 月 20 日正式發佈後，滿洲國當局亦先後宣佈了配合

<sup>43</sup> 關於滿洲國皇帝即位儀式的大致過程，以及關東軍方面與溥儀方面交涉的內容，可參考波多野勝，《ラストエンペラーと昭和天皇：溥儀と満州国の真実》（東京：草思社，2007）；樋口秀実，〈満洲国皇帝制度の成立と皇帝即位儀礼〉。

<sup>44</sup> 樋口秀実，〈満洲国皇帝制度の成立と皇帝即位儀礼〉，頁 180-181。

慶典活動的各項措施，這些措施也一一見於報端：24 日，《盛京時報》報導皇帝登基後將在全國各地賜宴；<sup>45</sup>25 日，該報又報導即位儀式後將進行大赦。<sup>46</sup>此外，當局也宣佈將會進行「大典紀念恩恤事業」，在各地舉辦「救濟難民」、「社會事業團體表彰」、「孝子節婦敬老表彰」等活動。<sup>47</sup>這類活動一方面可以視為民間參與的慶祝活動中，承襲自中國傳統政治活動的部分，但另一方面，這也體現了滿洲國當局如何透過這類具有傳統色彩的活動，將民間力量收編為國家進行政治動員的資本。<sup>48</sup>

另一方面，當局也透過許多近代國家常見的手段進行政治動員。自發表實施帝制的宣言後，當局也策動了各地民間團體發起集會，擁護政府建立帝制的宣言。各地地方政府也在中央的要求下，展開各種慶祝活動的籌備，諸如市民大會、運動會等等。<sup>49</sup>文教部也發函給各地方政府，要求督促管下各學校於即位當天舉辦祝賀儀式。<sup>50</sup>在奉天省教育廳發佈的紀念帝制辦法中，則明定該廳將辦理刊行紀念演說集、散發傳單、舉行巡回演講和電影放映、推廣國歌國旗、設立教育會館、紀念體育館等事務，並責成全省各學校向學生募捐興建帝政紀念塔、獻呈學生成績品等等。<sup>51</sup>此外，在即位儀式前後，官方也多次派遣宣傳隊下鄉進行宣傳，宣傳手段包括演說、電影放映甚至免費醫療。<sup>52</sup>

滿洲國皇帝制度權威的各種象徵物也開始出現在人民的視野中。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象徵物也同樣並陳近代性與傳統性的特質。《盛京時報》於 1 月 26 日首度公佈「滿洲帝國皇帝旗」的設計，並且宣佈以蘭花作為「帝室」的象徵，<sup>53</sup>蘭花徽紋的設計明顯模仿了日本皇室的菊花紋章（見附圖 2-1）。2 月 10 日，該

<sup>45</sup> 〈新帝即位後皆賜餐〉，《盛京時報》，大同 3 年 1 月 24 日第四版。

<sup>46</sup> 〈即位紀念恩赦及於逆產〉，《盛京時報》，大同 3 年 1 月 25 日第四版。

<sup>47</sup> 〈大典紀念三大恩恤事業具體辦法決定〉，《盛京時報》，大同 3 年 2 月 8 日第四版。

<sup>48</sup> 杜贊奇（Presanjit Duara）的研究指出，滿洲國成立後，政府便積極地收編在東北活動的各種民間社會、慈善團體，經由對這些團體的獎勵、支持，將王道主義的建國理念與民間宗教信仰以及傳統儒家倫理的道德觀聯繫起來，爭取基層民眾的支持。見氏著，*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ria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Maryland: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3)。

<sup>49</sup> 熱河省公署訓令第五八號〈指示各縣組辦運動會，準備建國三週年運動大會〉，《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331 號，大同 3 年 2 月 8 日。

<sup>50</sup> 文教部訓令第一二號〈責令各地方首長各學校於即位大典當日舉行祝賀儀式〉，《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339 號，大同 3 年 2 月 23 日。

<sup>51</sup> 〈紀念帝制辦法 教育廳隆重擬定〉，《盛京時報》，大同 3 年 2 月 10 日第二版。

<sup>52</sup> 〈帝政實施宣傳班 定期出動各縣鎮〉，《盛京時報》，康德元年 3 月 10 日第二版。

<sup>53</sup> 〈滿洲帝國皇帝旗〉，《盛京時報》，大同 3 年 1 月 26 日第四版。

報又報導當局將延聘著名玉石雕刻家陳古陶赴滿製作國璽。<sup>54</sup>



儘管滿洲國帝制形成的過程以及儀典的籌備，大量採用了來自傳統中國皇帝制度的元素，但參與籌劃的總務廳官員與關東軍官員在論述上與實行面上仍極力避免外界將這次儀式與清廷復辟之間聯繫起來。<sup>55</sup>《盛京時報》於儀典舉行前夕發表社論，提醒「臣民」一些「應知事項」。這篇文章指出，滿洲國建國以來仍有一些人襲用跪拜禮等前清舊制禮儀，但「居今日而恢復此種禮節，未免違反潮流」，主張政府應當明定禮制；此外，這篇文章也提出政府應當制訂服制、訂定御名避諱的標準以及公文格式等各種主張。<sup>56</sup>對於臣民如何自稱，這篇社論則提出這樣的疑問：

……沿用清制，滿員則稱奴才，漢官則稱臣。今滿洲國而行帝制，凡屬於滿洲國者，一律稱奴才乎？稱臣乎？抑仍自稱其職官乎？<sup>57</sup>

這篇社論雖看似只是向當局提出建議，但也顯示滿洲國帝制的施行在一些人心，仍是和清代帝制有著某種延續的關係。在滿洲國帝制行將建立的時候，時人很自然地會將其與清代的政治傳統聯想起來，無論是復辟派遣老或者一般人士皆然。在整個即位儀式以及相關的敘述中，這種現象十分常見。而這篇社論的主張，便是希望能在皇帝制度建立之際，界定出一套更「合於潮流」的禮制，也對中國傳統帝政做出某種區別。

在經過緊鑼密鼓的籌備與宣傳後，溥儀在 1934 年 3 月 1 日，滿洲國建國兩週年之際登上帝位。儀典從當天早晨的郊祭展開。當局在城郊的杏花村搭建天壇，溥儀身著藏青色的龍袍以及祭服主祀，並由鄭孝胥、羅振玉、沈瑞麟、張景惠等四人陪祀。溥儀依循古禮祭拜，誦讀祭天禱文，並接受國璽，隨後會場燃放禮炮。<sup>58</sup>儀式完成後，溥儀等人回到新京皇宮的勤民樓正殿。溥儀換上西式的「陸

<sup>54</sup> 〈國璽 玉璽 陳古陶寶玉赴奉謹製〉，《盛京時報》，大同 3 年 2 月 10 日第九版。

<sup>55</sup> 樋口秀実，〈滿洲国皇帝制度の成立と皇帝即位儀礼〉，頁 168-171。

<sup>56</sup> 〈大典前臣民應知事項〉，《盛京時報》，大同 3 年 2 月 21 日第一版。

<sup>57</sup> 〈大典前臣民應知事項〉。

<sup>58</sup> 傳統上，郊祭應當祭祖以作為配祀。在籌辦過程中，關東軍方面惟恐世人產生聯想，強烈要

海空軍大元帥正裝」，宣讀即位詔書；總理大臣鄭孝胥則宣讀賀表，並率領文武官員朝賀、三呼萬歲，儀式到此告一段落。

滿洲國當地媒體視此為建國以來的盛事，連續數天大篇幅報導相關新聞。3月1日當天，《盛京時報》詳細報導了儀式的流程，以及儀式過程中各項設施的相關細節。<sup>59</sup>此外，也刊載許多文章陳述成立帝制的緣由。這類文章基本上依循官方論調，形容帝制的施行是滿洲國國家發展必然的結果，是王道主義政治的實踐，但同時也一再澄清滿洲國帝制並非清代的延續：

凡屬我們民眾，先要明了這是順天安民的帝制，不是暴民專制的帝制；這是滿洲國的帝制，不是大清朝的帝制。……是基礎在民意上的，不是基礎在清……<sup>60</sup>

接下來幾天，《盛京時報》也刊載了諸多滿洲國要人的文章、題字，營造集體擁戴帝制成立的景象。<sup>61</sup>此外，還大篇幅報導了滿洲國內各地慶祝帝制成立的場面：在首都新京，市民、駐軍以及各級學校學生排列於路旁，對出城行郊祭的皇帝車隊低首奉拜；<sup>62</sup>在奉天，當局於清故宮十王亭舉行慶祝大會，會上群眾合唱國歌、向溥儀「御影」（肖像）遙拜，會後組織市民舉旗遊行，過程中並有飛機空投傳單；<sup>63</sup>在哈爾濱，市內各處均懸掛起大小彩旗裝飾，並且組織市民遊行，活動一直進行到晚上才告暫歇。<sup>64</sup>類似慶祝活動的相關消息在之後幾天中反覆報導；新京市公署出動四架特別裝飾的飛機在空中巡航，並從天空散發傳單、廣播

---

求不得以清太祖、清太宗配祀。鄭孝胥就此問題與關東軍方面數度交涉，並曾提出以清肇祖配祀的可能性。最後溥儀在此爭論上讓步，儀式當天的祭天過程中沒有祭祖，而是在祭天結束後回到宮廷，在登極典禮前的空檔，於正殿旁的房間向祖宗牌位祭拜，作為替代方案。關於此爭論的過程，可見樋口秀実，〈滿洲国皇帝制度の成立と皇帝即位儀礼〉，頁172-175、178-179。

<sup>59</sup> 〈白山黑水霞蔚雲蒸 今日慶逢登極大典〉，《盛京時報》，康德元年3月1日第一版。

<sup>60</sup> 〈帝制由來及命意〉。

<sup>61</sup> 在大典翌日（3月2日）的《盛京時報》，羅振玉（監察院長）、張景惠（軍政部大臣）、張燕卿（實業部大臣）、增韞（參議）、金璧東（新京市長）、遠藤柳作（國務院總務廳長）等高官均有文章發表；鄭孝胥（總理大臣）、謝介石（外務部大臣）、熙洽（財政部大臣）、沈瑞麟（宮內府大臣）等人均在報上題字。

<sup>62</sup> 〈百姓低首奉拜環道如堵 汽車鹵簿極呈壯觀〉，《盛京時報》，康德元年3月2日第一版。

<sup>63</sup> 〈故宮十王亭中官民同慶大典〉、〈盛大遊行蜿蜒數里 旗幟招展途為之塞〉，《盛京時報》，康德元年3月2日第二版。

<sup>64</sup> 〈哈市黎民慶祝 夜間提燈遊行〉，《盛京時報》，康德元年3月2日第二版。



在官方發起的各種慶祝活動之外，民間人士的回應也是值得注意的層面。由於史料的限制，今人很難確知當時滿洲國內一般人民對於施行帝制的普遍評價。但仔細爬梳後，仍可以從報刊媒體的一些言論中推敲時人對於滿洲國帝制的理解、想像。另一方面，雖然滿洲國當局此時尚未全面控制新聞輿論，<sup>66</sup>但這些報刊媒體上可見的言論可能仍顯現出此時官方對相關言論的容許範圍。

當時有許多文人在報紙發表詩文，慶祝溥儀登極。這類詩文中有不少是出自一些「遺老」的手筆，於是內容也就充滿了對於前清的仰慕思眷之情，以及對遜帝重登大寶的喜悅。即使官方極力否認帝制建立和滿清復辟之間的關聯，但這些作者在有意無意間，還是將在滿洲國帝制當中產生了復辟的聯想：

祖宗厚澤浹臣民，皇統連綿罕比倫。自此金甌永無闕，子承孫繼萬年春。

尊時養晦廿餘年，今日飛龍復在天。則法神堯恩浩蕩，從茲比戶可封焉。

67

帝國重將帝制施，欣然復覩舊朝儀。百官鵠立修臣節，一代龍興煥祖基。  
喜見新君承正統，會看紫詔下丹墀。當年遺老同相慶，盼到雲開見日時。

68

民眾三千萬，都興故主恩。由天還帝運，近日照邦基。重把乾綱握，新凝鼎命施。我皇登九五，盛典頌丹楹。<sup>69</sup>

<sup>65</sup> 〈首都舉行嶄新慶祝大典 化裝飛機翔空 天際廣播電語〉，《盛京時報》，大同 3 年 2 月 27 日第四版。

<sup>66</sup> 一般認為，1937 年國務院情報處改組，成立「弘報處」。此事標誌了滿洲國當局全面強化對新聞傳媒、輿論走向的控制。弘報處兼具輿論控制、政治宣傳的性質，對滿洲國的文化政策也有極大的影響力。在此之前，當局對媒體輿論的控制尚相對寬鬆。

<sup>67</sup> 金炳忱，〈皇上登極祝詩〉，《盛京時報》，康德元年 3 月 1 日第五版。

<sup>68</sup> 翟鏡濤，〈頌新帝登極〉，《盛京時報》，康德元年 3 月 1 日第十五版。

<sup>69</sup> 王鶴齡，〈大典祝詩〉，《盛京時報》，康德元年 3 月 1 日，第十五版。

在報端滿篇累牘的記述、頌揚文字中，穆儒丐的〈登極恭禮記〉是相當鮮明可觀的例子。這篇長文詳實地記載了作者在慶典上的所見所聞，反映了一位平民觀禮者對這場儀典的認識。穆儒丐在 2 月 27 日晚間乘火車抵達新京，在街頭看到了張燈結彩的歡慶景象。<sup>70</sup>28 日，穆氏與駐新京的報社同事前往執政府辦理參列儀式的執照。他頗費了一番唇舌與執政府官員交涉，才取得參禮的資格，他在文中對官府的「腐氣」、「腐儒見識」甚表不滿，認為他們辜負了民眾對皇帝的熱情擁戴。<sup>71</sup>他又這樣描述前來新京參與即位儀式的人們：

……這次實施帝制……不但滿洲國的官民，歡喜無量，便是在關裡頭受過前清恩惠，或是與清室有好感的，聽說三月一日舉行大典的消息，真有當褲賣襖、典房質地、集湊幾日盤纏，前來祝賀的……總而言之，遺老遺臣、紳商各界，南自閩南，北迄蒙古，或本人或代表，指不勝屈……<sup>72</sup>

在儀典期間，有許多遺老、遺臣從關內前往滿洲國。在穆儒丐筆下，這些人人數甚眾、滿懷熱忱，但有很大一部份都被執政府的掌禮官吏拒之於會場之外，使滿洲國失去了一次宣揚「皇帝仁德」、「國家善政」的機會。<sup>73</sup>穆氏批評主事機關行事迂腐，認為當局沒能充分照顧這些人的赤誠之心。

穆儒丐接著記錄了 3 月 1 日登極儀式上的見聞。郊祭時他本人並沒有前往現場，但他仍按照聽聞簡短記錄了郊祭的過程。他描述從城中通往郊祭儀式所在的大同廣場，沿路擠滿人潮，向皇帝車駕高呼萬歲。<sup>74</sup>郊祭結束後在執政府舉行登極儀式，在溥儀接受文武官員、外賓使節的朝賀後，一般無官銜的與會者輪流進入會場向皇帝朝賀。穆氏也在隊伍當中，他在文章裡形容當時的場面，提到了

<sup>70</sup> 儒丐，〈登極恭禮記（五）〉。《盛京時報》，康德元年 3 月 9 日第一版。

<sup>71</sup> 儒丐，〈登極恭禮記（六）〉。《盛京時報》，康德元年 3 月 10 日第一版。

<sup>72</sup> 儒丐，〈登極恭禮記（六）〉。《盛京時報》，康德元年 3 月 10 日第一版。

<sup>73</sup> 儒丐，〈登極恭禮記（七）〉。《盛京時報》，康德元年 3 月 11 日第一版。

<sup>74</sup> 儒丐，〈登極恭禮記（九）〉。《盛京時報》，康德元年 3 月 13 日第一版。但在其他的記述中，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景象。如時任侍從武官的石丸志都磨便在日記中指出：「（郊祭）在即使諸事簡潔也極為肅靜的狀態下進行。沿途聚集奉祝者的地方很零散。日本居留民多，而滿洲人民相對較少。從大同廣場到郊祭場只見到警戒的軍警，一個旁觀者也見不到，而感到無以名狀的寂寞。」轉引自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国の肖像》，頁 221。又，承林志宏先生提醒，在東北地區三月上旬仍是嚴寒的天氣；在這樣的季節進行動員的效果如何也是值得商榷的。若以這些跡象看來，石丸的記述可能較為貼近現實。

在場人士如何向皇帝行禮：

……一位序班官和幾位領班員，帶著大家到勤民樓給 皇上行禮。上自滿蒙王公，下逮地方人士……。有人問行什麼禮，既無宣示，也就無從而知，但是舊禮大家還沒忘，自然都行跪拜禮了。<sup>75</sup>

事實上，關東軍的內部文件顯示，當局在典禮籌辦時便明定了總理以下文武官員在各種典禮場合向皇帝致敬的方式：最敬禮是脫帽後行四十五度鞠躬禮；敬禮則是行最敬禮的一半。<sup>76</sup>然而依穆儒丐的記述，在官員之後進場朝賀的與會者們顯然並不清楚這套「新」禮儀。

這場插曲隱然喻示了滿洲國帝制在內在構造上的曖昧性。對關東軍而言，制定新式禮儀意味著對前清傳統的斷裂，也代表了對於復辟的否定。正如樋口秀實指出的，儀禮反映了國家的性質，於是新式禮儀也就提示了當時關東軍希望能建立一個作為近代國家的「新」滿洲國。於是相對地，這場儀典的與會者對於禮儀的認識與行使，也就說明了時人對於滿洲國的認知，是來自它對前清及其象徵的傳統政治秩序的延續，也顯現出溥儀在這些與會者心目中，作為「舊」清帝國繼承者的身份。在日本人營造的藍圖中，是要以「新」的要素取代其「舊」，但對溥儀的「臣民」們來說，滿洲國「舊」的性格卻更能激起他們的認同。

穆儒丐在後續的文章中再次批評了掌禮官吏的官僚作風，令許多遠道而來的「臣民」未能親身表達對皇帝的敬愛。<sup>77</sup>接著他話鋒一轉，又談到了康熙皇帝的仁德；他引述學者浮田和民（1860-1946）對康熙與俄羅斯沙皇彼得一世（Peter I）的比較，稱康熙「以聖德之心為心」，彼得則是「以盜賊之心為心」，雖然從後見之明看來「盜賊」強盛了起來，但最終彼得的子孫消亡了，行聖德之道的清

<sup>75</sup> 儒丐，〈登極恭禮記（十）〉。《盛京時報》，康德元年 3 月 14 日第一版。在溥儀的回憶裡，這些行跪拜禮的人是「北京來的宗室覺羅（載、溥、毓字輩）」以及「從前內務府的人」，見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北京：群眾出版社，2003 重印版），頁 338。但在後來出版的全本《我的前半生》中，則不見這段記述；而在當時《盛京時報》發佈的其他新聞報導中，則未提及這段插曲。

<sup>76</sup> JACAR Ref. C04011795000、昭和 9.3.6~9.3.31「滿受大日記（普）其 32/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sup>77</sup> 儒丐，〈登極恭禮記（十二）〉。《盛京時報》，康德元年 3 月 16 日第一版。



朝子孫卻存續了下來，在滿洲稱王。<sup>78</sup>他還以歷史上八旗包含了漢、蒙各族人爲例，稱滿人的政權「在歷史上，專能容合各民族的」，希望各族人民對新興的滿洲國「照舊捧場」。<sup>79</sup>

在〈登極恭禮記〉一文中，穆儒丐對掌禮官員辦事不力的批評，或可佐證當時確有許多遺老遺臣、地方人士前往新京參與儀典，人數之眾可能超過了當局的預期，因而在慶典過程有許多力有未逮之處。而從另一角度來看，這篇文章也提示了滿洲國政權的支持基礎，有相當部分是來自滿人社群。

穆儒丐多次將時人對溥儀即帝位的「支持」與前清的「恩惠」聯繫起來，並暗示溥儀承繼了康熙皇帝的仁德。此外，這篇文章也顯現出身爲滿人的穆儒丐，對於民國以來滿人不見容於社會的情形感到相當不滿。穆氏將滿洲國的建立看作是滿族人民回歸故土的結果，並且藉此合理化溥儀在這個國家中的領導地位；而帝制的成立，則代表了滿洲境內諸民族對於建立「容合各民族」的國家的認同。穆儒丐的主張在當時的滿洲國社會不見得代表多數人的看法，但卻也呈現出當時對滿洲國與其帝制另一可能的理解。<sup>80</sup>

### 第三節 製造康德皇帝：傳媒上的溥儀形象

滿洲國的國家性質揉合了近代性與傳統性的要素，而作爲這個國家元首的身分的「執政」以及「皇帝」，也同樣兼具有這兩種要素。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溥儀元首身份的正當性來源是「民意」的基礎，而「民意」的形成則聯繫到儒家傳統下的政治道德價值，即駒込武所謂「朱子學的王道主義」的儒家政治道德觀。<sup>81</sup>另一方面，作爲一個「近代的」國民國家，「民意」的形成也不能只依賴傳統道德的基礎。身爲滿洲國元首的溥儀必須直接與其人民建立關係，才能証成國民對於溥儀的認同、擁戴。於是，溥儀個人公眾形象的建構便成爲帝制建立

<sup>78</sup> 儒丐，〈登極恭禮記（十四）〉。《盛京時報》，康德元年 3 月 20 日第一版。浮田和民係熊本出身，近代日本法學家、思想家，提倡「倫理的帝國主義」，一時頗具影響力，曾任教於東京專門學校（今早稻田大學）。

<sup>79</sup> 儒丐，〈登極恭禮記（十四）〉。《盛京時報》，康德元年 3 月 20 日第一版。

<sup>80</sup>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穆儒丐可能代表了部分旗人對於滿洲國的期待，但在滿人社群中，仍有相當一部份人對滿洲國並無認同之意。最著名的例子應屬金毓黻（1887-1962），金氏在九一八事變後遭到日軍拘禁，強迫其出任奉天省府參議、奉天圖書館副館長等職務。他一方面抗拒日人對他的職務安排，一方面埋首於研究工作，最後在 1936 年假藉赴日研究之機脫逃，回到關內。這段經歷可見氏著〈瀋陽蒙難記〉，錄於《靜晤堂日記》（瀋陽：遼瀋書社，1993），頁 2656-2660。

<sup>81</sup> 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頁 272-276。

過程中無可回避的部分。

溥儀之所以需要重新建構公眾形象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前近代中國的皇帝身為「天子」，本來就擁有先驗的神聖性與道德性權威，於是傳統君主也少有營造自身形象的必要。然而溥儀雖然擁有前清皇帝的身份，但他在經過遜位、出宮、流亡的歷程後，已經成為報刊媒體上的一介「公眾人物」，而不再享有前近代君王不可侵犯的權威。於是，當溥儀要再度成為皇帝時，他的形象與權力正當性也就需要重新塑造，以符合滿洲國這一「近代」國家的需要。

自溥儀就任滿洲國執政以降，官方便極力頌揚他的形象，除了強調他深受民眾「擁戴」之外，也期望能建立起一定的權威性。如前所述，滿洲國在意識形態上否定民主制，於是在制度設計上，關東軍的主事者們傾向建立一個獨裁體制。於是滿洲國初期「執政」一職的制度設計、形象建構，相當程度上是要比附真正的皇帝制度，或者更精確地說：近代日本的天皇制。其中一個有趣的例子是「萬壽節」的制定。

萬壽節是傳統中國君王的誕辰，是帝政時代的重要節日；但實際上，在滿洲國的政治脈絡中，萬壽節模仿的藍本是近代日本的天長節（天皇誕辰）。萬壽節自滿洲國建國初期就是國定節日，國務院明定以陰曆正月十三日為「執政萬壽」，此後每年放假慶祝，舉辦園遊會、晚宴，並動員市民參與慶祝集會、遊行等慶祝活動，這些安排都可以看見對日本自明治朝以來天長節的模倣。從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出滿洲國萬壽節所帶有的近代性意涵。

在實施帝制之前，滿洲國的傳媒是如何描繪溥儀的形象呢？1933年九月，時任執政府秘書處長的胡嗣瑗（1869-1949）在《盛京時報》發表〈執政起居紀要〉一文。這篇文章先回溯了溥儀離開天津前往旅順的轉折，聲稱溥儀離津是因為遭到國民政府「猜忌」，原本只是避禍，但滿蒙人民在九一八事變後「皇皇無主」，於是「追念大清累朝之德澤及當年 遜政之勇決」，推舉溥儀為領袖。<sup>82</sup>胡氏在文章中列舉了溥儀的種種「德行」：他形容溥儀起居節儉，每天早上接見臣僚外賓，下午讀書、打網球；他形容溥儀廣讀各種報刊，對世界局勢有深刻瞭解，並引英籍「帝師」莊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的評價，稱溥儀「生長於專制守舊之皇室，然喜歡新思想」。<sup>83</sup>胡氏在最後總結道：

<sup>82</sup> 胡嗣瑗，〈執政起居紀要（一）〉，《盛京時報》，大同2年9月20日第六版。

<sup>83</sup> 胡嗣瑗，〈執政起居紀要（二）〉，《盛京時報》，大同2年9月21日第六版。

執政態度誠懇。觀其容表，即知為意志堅強之人物……余與執政會議之後，知其為一堪當大任之統治者，蓋其能注重實際而不重虛談……<sup>84</sup>



胡嗣瑗的文章是出自其近身觀察，但他並未詳論溥儀何以「意志堅強」、「堪當大任」，也沒有提出溥儀擔任執政期間究竟有何具體的政治成就。他對於溥儀的推崇集中在生活習慣與人格特質，並舉了一些例子說明溥儀對於人民的關懷之情。類似的書寫也可見於其他許多地方。（詳後述）

較值得注意的是，胡嗣瑗也已經意識到，「新」國家的領袖需要凸顯某些「現代的」、「進步的」特質。胡氏特別強調溥儀其人的學問素質，特別是對於當代思想、西方語文知識、國際政治的深厚造詣，也指出溥儀有運動健身的習慣，不只是一介白面書生。胡氏這樣的描述為溥儀帶來了有別於傳統中國帝王的「現代」形象，也暗示了滿洲國執政這一身份的複雜性質，而這樣的複雜性也延續到日後對「滿洲國皇帝」這一身份的論述。

除了這類見諸報端的文字，滿洲國的一些要人也會藉由廣播傳遞溥儀的公眾形象，而這類廣播演說稿也常以各種形式印刷出版。<sup>85</sup>這類宣傳的內容和胡文大同小異，多半強調溥儀日常作息之健康、規律以及其人生活之儉省、智識之深厚、品性之寬厚等等。

溥儀形象塑造的另一個重點，是要回應外界對滿洲國與溥儀的種種負面評價。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溥儀與參與滿洲國的中國人士一直備受批判，關內傳媒斥之為日本的傀儡，大力撻伐其賣國求榮的行徑。這些攻擊顯然對滿洲國政權的正當性基礎有很大影響，而關東軍的主事者們也意識到，溥儀公眾形象的建構必須對這種批判作出反擊。

在確定將實施帝制後，滿洲國當局以及關東軍內部也就如何宣傳、彰顯新皇帝的公眾形象作過討論。在關東軍的內部文件中，對於宣傳的要點做了如下的歸納：

<sup>84</sup> 胡嗣瑗，〈執政起居紀要（三）〉，《盛京時報》，大同 2 年 9 月 23 日第六版。

<sup>85</sup> 如中島比多吉，〈執政之日常放送詞〉。原為大同 2 年 10 月 1 日發佈之廣播演說，後收錄於《聖德記述纂要》。收入吉林圖書館偽滿洲國史料編委會編，《偽滿洲國史料》第一本（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2）。



使新皇帝之人格正確、廣泛地為人所知。

新皇帝富有溫情慈愛，另又正義感強，苟不敢不正、不興不義，不犯剛毅，觀察銳利，判斷正鵠如神。

作為哲理的國家滿洲國的初代皇帝，確實具有可敬仰的風格。

瞻仰者見之，起無意識的尊崇之念。

強調此點：（實施帝制的）理由，其一，以之增進滿洲國之團結；其一，「日本於帝制樹立後至憲法發佈之間籠絡皇帝，利用其獨裁權遂其野心」云云，斥為誣蔑。

應使人盡周知：皇帝有嚴謹自持的一面，明朗潤達，其日常生活誠開朗，毫無陰鬱之處。

宣揚皇帝明快的日常生活，以之打破「溥儀淪為日本傀儡，生活不論應接外賓來客，日常起居也全部受人監視」等流傳的謬論。<sup>86</sup>

從上述條列的要點來看，關東軍希望將溥儀塑造成一位眾所景仰、深具智慧與王者風範的君王；此外，也希望打破坊間流傳的「謬論」，改善民間對溥儀的負面觀感。

滿洲國當局於一月下旬正式宣佈將施行帝制之後，媒體上便出現許多對於溥儀其人的敘述。在政府發表宣言後次日，《盛京時報》再度刊登文章介紹溥儀的生平事跡。這篇文章以同情的口吻聲稱，「中國共和政體係依帝之好意，使之繼承者也」，將清帝的遜位處理成看似出於溥儀自身的決斷，即使他此時年僅六歲。<sup>87</sup>同一天，《盛京時報》也刊登文章稱揚溥儀的生父醇親王載灃，稱他在攝政期間壓制袁世凱「攪亂和平之暴舉」的對滿政策，使滿洲免於戰禍，「興念及此，溥儀執政父子，洵東洋和平之守護神，滿洲建國之大恩人也」。<sup>88</sup>

在這段期間，《盛京時報》上另一篇詳細論述溥儀功業的文章，是時任執政府府中令的寶熙所撰的〈執政德業紀要〉一文。寶熙追溯滿洲國建國的過程，聲稱溥儀雖是以皇帝之尊就任執政，但一心為的是百姓的福祉，並未把虛名放在心

<sup>86</sup> 〈滿洲國帝制樹立ニ関し宣伝上注意スヘキ事項〉，轉引自樋口秀実，〈滿洲國皇帝制度の成立と皇帝即位儀礼〉，頁 167。

<sup>87</sup> 〈幼冲登極據遭變故 可歌可泣皇上半生〉，《盛京時報》，大同 3 年 1 月 21 日第二版。

<sup>88</sup> 〈東洋平和史上偉績 君臨此邦固屬當然〉，《盛京時報》，大同 3 年 1 月 21 日第二版。

上；他聲稱溥儀的政權剿匪、接濟春耕、統一貨幣，溥儀本人也多次賑濟慈善團體。<sup>89</sup>寶熙稱溥儀生活簡約，不願以公款修葺宮室，也不在個人生活上浪費。<sup>90</sup>寶熙推崇溥儀尊孔孟護禮教的理念，他特別指出滿洲國建國後溥儀主持祭孔，在儀式上向孔子行跪拜禮，還向教員講習所的每位畢業生頒贈《四書》，希望「人人皆讀孔孟之書……貴乎實行，不在乎口頭標語，也不在乎徒託空言」。<sup>91</sup>寶熙將溥儀對禮教的維護看成滿洲國人民支持他的重要原因，強調溥儀在道德上的高尚無瑕；此外，也把溥儀形容成合於禮教規範、施行王道的領導人。在溥儀登極成為皇帝之後，這類的宣傳文字仍持續出現，<sup>92</sup>內容上也不脫述的套路，強調其節儉、愛民的美德，甚至形容他每日早晚「必行默禱」，祈求「國民豐衣足食」；以及他穿著的衣履多有縫補云云。<sup>93</sup>

在這些成篇累牘的宣傳文章中所描繪的溥儀，是一位愛民、節儉、飽讀詩書而富有智慧的領導者，同時也是一位潛心學問、通曉各種新知識、喜好運動的青年。這些形象一方面呼應了一些儒家傳統的美德，另一方面也呈現出新時代青年的理想形象。然而我們也可以發現，這些宣傳文字中，很少提及溥儀的政治成就或者施政風格。

溥儀公眾形象的建構，是滿洲國初期重要的政治課題之一。這個形象建構的工程中，有相當多的論述資源是來自對理想傳統君王的想像，但也揉合了一些近代性的要素。更重要的是，這種對於公眾形象的需求本身，其實就顯現出滿洲國作為一個「近代」國家的性質。然而，滿洲國在政治制度上既是高度集權的獨裁政體，身為領袖的溥儀卻沒有多少值得大書特書、大加宣傳的政治建樹，這其中的矛盾不言可喻。

#### 第四節 小結

滿洲國獨立建國的正當性基礎，是它宣稱獲得人民的「支持」；而這種「支

<sup>89</sup> 寶熙，〈執政德業紀要（上）〉，《盛京時報》，大同 3 年 1 月 31 日第六版。

<sup>90</sup> 寶熙，〈執政德業紀要（中）〉，《盛京時報》，大同 3 年 2 月 1 日第六版。

<sup>91</sup> 寶熙，〈執政德業紀要（中）〉。

<sup>92</sup> 如沈瑞麟，〈皇上乾德恭記〉、〈今上起居恭記〉等，均收入吉林圖書館偽滿洲國史料編委會編，《偽滿洲國史料》第一本，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2。

<sup>93</sup> 林出賢次郎，〈宵旰御情〉。收錄於《聖德記述纂要》。

持」的來源，則是中華民國政權的失德失能，因此它的政治制度設計，也就必然不會選擇民國標榜的民主共和制。另一方面，溥儀以及其近臣，出於對復辟的希望與對民國的反感，在形式上與制度上也都排斥共和制。在這些作用之下，滿洲國的政治制度自然會傾向專制獨裁、中央集權的設計。而所謂的「執政制」，更是在溥儀、復辟派與關東軍各自的算計、妥協下誕生的產物，自始就顯露出過渡性質。當日本方面認為時機已成熟，「執政制」便水到渠成地換上了帝制的外衣。

滿洲國帝制的建立便是順應著上述的脈絡產生的。當關東軍、滿洲國官方要向人民論述帝制的正當性時，必然會聯繫到民國政局與共和制的失敗，而又進一步上溯到時人對於清代舊有政治、社會秩序的想像，並以此貶抑民國政治的混亂局面。經由對清代歷史「盛世」的聯想，身為愛新覺羅氏後裔的溥儀，也就得以繼承清代明君的聲名，成為眾望所歸的當代明君。但是這樣的論述策略也反映了一個諷刺的事實：儘管關東軍與滿洲國官方極力撇清實施帝制與前清復辟的關聯，但在論證民國的失敗時，卻又不可避免地以清代的歷史作為比較，以清代的「盛世」呼喚起人民對於當下的滿洲國、滿洲國皇帝的認同。

然而，這種歷史資源的引用，卻也與現實產生了極大的矛盾。對日本當局而言，扶植滿洲建國的根本原因，是因應帝國擴張的需求，希望藉此將滿蒙地區自中國分離出來，納入帝國的控制範圍。於是對日方來說，自然不希望世人將滿洲國建立帝制與清朝的復辟聯繫起來。在滿洲當地實際的宣傳活動使用的語彙，與日方的意圖，顯然有著落差。

在這場即位儀式以及各種慶祝活動的籌劃安排上，也可以發現，當局利用了許多前近代中國政治、社會的元素，爭取民眾的認同；此外，也透過許多新的宣傳、動員方式，鼓勵民眾表達對於國家和新皇帝的忠誠。滿洲國皇帝的即位儀式本身兼具有中國傳統政治的元素與近代國家的元素，而民眾參與周邊活動的方式，在有意無意間同樣也反映了這種特性；當這種特性反映在時人的認知上時，我們也可以發現，當時的人們對於整個滿洲國、滿洲國帝制的認識，仍是透過與前清政權的參照形成的。縱然此時一些復辟派的滿洲國當局高層，已日漸傾向放棄直接尋求復辟前清的可能性，<sup>94</sup>但直接呈現在滿洲國人民面前的滿洲國帝制論述，卻仍有著隱隱約約的復辟傾向。

除了從歷史上尋找支持論述的資源，塑造溥儀個人的領袖特質，也是正當

<sup>94</sup>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頁 339-340。

化滿洲國皇帝制度的主要手段。當時這些推崇溥儀人格特質的文字，一方面援引了儒家傳統價值觀下所重視的要素，將溥儀形容成言行合於禮教的君子；另一方面也強調他有著現代青年的作風與學識涵養，這或許足以反映當時人心目中理想的政治人物應有的素質。然而，縱使溥儀在名義上是握有大權的國家元首，他在滿洲國的政治體制下，並沒有真正的政治實力與權力基礎，自然也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有什麼作為。於是，溥儀受到推崇、稱頌的緣由，在這類歌功頌德的文字中，是他的道德性、出身、智識，而不是他在政治上的實際作為，這毋寧是頗堪玩味的現象。

在關東軍的檔案中，即位儀式的各種慶祝活動獲得了當地民眾熱情自發的響應。<sup>95</sup>但這樣的描述是否真正反映了時人的心聲呢？而無論如何，可以確知的是，時人對於滿洲國實施帝制的認知並不單純；它涉及到時人的歷史想像、民族情感乃至於認同問題。而對溥儀來說，這個皇帝頭銜是否能讓他獲得更強的政治號召力與民意基礎，則還有待驗證。

---

<sup>95</sup> 在即位儀式與慶祝活動完成後，關東軍派駐滿洲各地的機構奉命向關東軍司令部回報慶祝活動的情形。在這些報告中，報告者多半宣稱當地民眾熱情參與慶祝大會，帝制之實施深得民心云云；例如哈爾濱方面的報告即表示，人民普遍發自真心地將帝制的施行當作喜事，而民眾的這種情緒對於反制當地共產黨宣傳活動、排除民間排滿情緒，有著顯著的幫助。見 JACAR Ref. C04011805200、昭和 9.3.6~9.3.31「滿受大日記（普）其 32/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圖 2-1（上）溥儀像。

圖 2-2（左）

溥儀墨跡：「願禔天之明命」。《盛京時報》，  
康德元年（1934）3 月 1 日第一版。

圖 2-4（右）

陳寶琛墨跡：「旁觀者清」，大同 3 年  
歲首題字。《盛京時報》，大同 3 年  
（1934）1 月 1 日。陳寶琛終身支持清  
室復辟，但對溥儀投身滿洲國始終頗  
有疑慮。在溥儀即將登基為滿洲國皇  
帝的時節，他的題字顯得意味深長。



圖 2-3（左）

鄭孝胥像。







圖 2-5（左上）

溥儀祭天。《盛京時報》康德元年 3 月 2 日。

圖 2-6（右上）

穆儒丐〈登極恭禮記〉。《盛京時報》大同 3 年 2 月 28 日。

圖 2-7（下）東京《朝日新聞》對溥儀登極的報導。昭和 9 年 3 月 2 日附錄。



### 第三章 1935 年溥儀訪日與滿日關係結構

滿洲國是在日本扶植下成立的政權，而對日本當局而言，滿洲國的成立是大陸擴張策略的一環。爲了使日本在滿洲的活動正當化，滿日關係自然是該國政治論述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滿洲國在 1932 年三月成立之後，關東軍的主事者們對滿日關係架構的設計下了許多工夫，將關東軍對滿洲國的控制制度化。相應地，此時期許多「日滿親善」的政治宣傳也開始出現。這類宣傳批判中國反日的民族主義思潮，宣揚滿洲國內諸民族（包括日本人）的團結，也強調日本與滿洲之間的特殊關係。而滿日兩國皇室的往來，則是強化兩國關係論述的重要依據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從 1932 到 34 年間，呈現於人民面前的論述有一演化的過程，最終在 1934 年實施帝制，以及翌年溥儀訪日並頒發〈回鑾訓民詔書〉時建立起完整的滿日關係論述。

溥儀登基成爲滿洲國皇帝後，滿日雙方便開始籌劃兩國皇室的互訪。溥儀身爲國家元首，又有了皇帝的頭銜，他與日本天皇理論上享有對等的地位，他本人也希望能藉由與日本皇室的來往，提升在滿洲國內的政治實力和聲望。而對日本當局而言，一方面要營造滿日兩國對等交往、互相提攜的形象，維持其在滿洲擴張勢力的正當性，另一方面也要藉此確立日本之於滿洲國的「指導」地位。兩國皇室的往來，反映了滿日兩國間的權力關係。

溥儀在 1935 年第一次前往日本進行國事訪問。爲了歡迎溥儀來訪，日本當局籌劃了盛大的歡迎活動，並且動員國內媒體進行大規模的宣傳。溥儀回國後，滿洲國當局隨即發佈了〈回鑾訓民詔書〉這一重要文件，對兩國的往來與關係做出定義，溥儀訪日一事對於吾人理解滿洲國史的重要性由此可見。目前學界對於溥儀訪日的政治意涵已有一些討論，那麼這些訊息又是如何呈現在一般民眾眼前呢？這次訪問是否影響了一般人民對於滿洲國政權和溥儀本人的評價呢？

本章將討論滿日兩國間的權力結構如何反映在民間基層的認知架構中。首先本章將整理、分析滿洲國建國後，在該國盛行的滿日關係論述，並簡單梳理滿日兩國皇室往來的過程；此外，也將針對各界報刊對於 1935 年溥儀赴日訪問

的記述、書寫進行分析；最後，也將試著探討〈回鑾訓民詔書〉的形成以及在滿洲國的傳佈。



## 第一節 滿洲國建國後的滿日關係論述

滿洲國建國後，日本當局以及關東軍便開始討論滿日關係的制度化，確立日人在滿洲支配地位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日本於 1932 年九月正式給予滿洲國外交承認，可說是滿日關係架構成型的第一步。日本當局一方面將滿蒙地區視為「帝國對俄、華國防的第一線」，<sup>1</sup>但也認識到強化滿洲國的「主權獨立國家」地位，鞏固此政權的統治基礎有其重要性，因而致力於使滿洲國「逐漸具備獨立國家的實質要件」。<sup>2</sup>

在國際聯盟派遣調查團赴滿訪查，國際干預的態勢日益明顯的情況下，在滿日本人社群以及日本國內輿論一再呼籲應給予滿洲國外交承認，確立兩國關係的發展。<sup>3</sup>然而考慮到美國方面的反應，日本國內對於承認滿洲國的時機一直有所爭論。<sup>4</sup>日方最終於 1932 年八月底開始與滿洲國政府進行外交承認的交涉。

9 月 15 日，日本正式承認滿洲國，由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兼任駐滿大使，並總管日本在滿洲的各種派駐機關。<sup>5</sup>同時，兩國也簽署了稱為《日滿議定書》的共同協定，確立軍事同盟的關係。<sup>6</sup>而在《議定書》之外，雙方也暗中簽署了

<sup>1</sup> 〈支那問題處理方針要綱〉，昭和 7 年 3 月 12 日閣議決定案。收入小林龍夫、島田俊彥編，《現代史資料 7 滿洲事變》（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頁 494。

<sup>2</sup> 〈滿蒙新國家成立に伴ふ對外關係處理要綱〉，昭和 7 年 3 月 12 日閣議決定案。收入小林龍夫、島田俊彥編，《現代史資料 7 滿洲事變》，頁 495。

<sup>3</sup> 例如，在 1932 年七月號的《滿蒙》，刊載了數篇文章鼓吹日本應承認滿洲國。這些文章強調日本在滿蒙地區經營多年，對新國家的健全發展有其義務（刊頭語〈滿洲國の承認は最大急務〉），也有文章分析列強在滿洲的經營，主張應儘速造成滿洲國獨立的事實，抗拒第三國（尤其是美國）介入的可能（川合正勝，〈滿洲國の承認問題〉）。見《滿蒙》（大連：社團法人滿洲文化協會）第十三年第七號。

<sup>4</sup> 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國の肖像》（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4 增補版），頁 208-209。

<sup>5</sup> 當時日本派駐在滿洲國的機關，包括滿鐵、軍方系統的關東軍、外務省系統的駐滿各地領事館，以及隸屬拓務省、管理關東州租借地與鐵道附屬地的關東廳。滿洲國建立後，日本當局便開始著手整合這些單位的業務。

<sup>6</sup> 《日滿議定書》之主要內容，是滿洲國承諾繼承中日之間各種條約、協定，承認日本在滿既有的特殊權益，並且承認日本在滿駐軍的權力。該文件日、漢文原件可見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3021877600、御署名原本・昭和七年・昭和第九号・昭和七年九月十五日ノ日滿議定書（国立公文書館）。

關於鐵道、港灣、水道、航空運輸等事業的合作協定以及共同防禦協定。透過上述文件的簽訂，關東軍成為了日本方面主導滿洲相關事務的機構，實質上主導了滿洲國的軍、政、經大權。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國內媒體對於滿洲局勢就非常關注。<sup>7</sup>日本承認滿洲國是當時重大的政治事件，滿洲國和日本國內的媒體均對此事做了不少報導。東京《朝日新聞》在9月14日的晚報以大篇幅的專題報導，介紹滿洲國的立國精神、政情、政治制度以及溥儀的經歷。這組報導還強調日滿經濟一元化的展望，<sup>8</sup>並重申滿洲國對日本國防的重要意義。<sup>9</sup>

奉天《盛京時報》同樣對滿日建交作了大篇幅報導。該報主筆菊池貞二（傲霜庵）在署名社論中指出，日本承認滿洲國並派遣大使駐滿，代表兩國邦交的穩定發展，也讓日本對滿洲抱有領土野心的說法不攻自破；文章強調日本對滿有其一貫政策，即維持特殊利益、合作發展經濟，日後的滿日關係也仍會是這種相互合作的關係。<sup>10</sup>菊池還進一步指出日本援助滿洲國對中國的意義：

日本包藏之野心……即欲援助滿洲國，整頓一切，對於中國實行「訓政」，企圖文化的一大侵略而已……日本管轄之關東州與滿鐵租界……亘二十年之久，對於東北全土，維持「訓政」地位……東北地居邊陲，其交通經濟，卓著成績，駕關內而上之者，無論直接間接，未始非日人「訓政」。

11

菊池的文章顯現出在滿日本人對於滿日關係的某些想像。一方面，滿洲國的成立將保障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日本將「扶持」、建設滿洲國，為東亞諸國建立表率。換言之，滿洲國是日本國家經濟策略的一大環節，而日

<sup>7</sup> Louis Young 的研究指出，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日本各大報刊都相當關注事件發展，且口徑一致地支持關東軍在滿洲的軍事行動，並大肆頌揚甲午、日俄戰爭以來日軍在滿洲的戰績，強調滿洲對日本國勢的重大意義。Young 還指出，這些對戰爭的報導隨即衍生出相當多的文化商品：如書籍、唱片、繪畫等等，於是媒體產業在這股風潮中也獲得了極大的利益。見氏著，*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1998), chap. 3: "War Fever".

<sup>8</sup> 〈日滿經濟を一単位化する重要な課題〉，《朝日新聞》，昭和7年9月14日夕刊第四版。

<sup>9</sup> 〈滿洲国の国防は即ち日本の国防〉，《朝日新聞》，昭和7年9月14日夕刊第三版。

<sup>10</sup> 傲霜庵，〈日本承認滿洲國〉，《盛京時報》，大同元年9月16日第一版。

<sup>11</sup> 傲霜庵，〈日本承認滿洲國〉。

本作爲東亞地區的先進國家，將引導東亞國家的近代化，建構東亞新的國際秩序。《日滿議定書》以及相關附屬條約的簽訂，代表的是日本確立對滿「指導」地位的第一步。

然而與此同時，菊池也注意到滿日關係的營造必須考慮到滿洲當地人民的感受。他在另一篇社論中指出，雖然有些人認爲九一八事變一週年之際「理應引觴慶祝」，但滿洲局勢仍然動蕩不安，「一般人民之痛苦，不減去年九月以前」。<sup>12</sup>菊池認爲，爲了滿日兩國人民的和諧著想，不應該大肆慶祝九一八紀念日：

窃以為欲使兩國人民成一家之親，則彼此至少須先共其憂喜，然後始可望和衷協濟、融洽一致。……聞今年是日，日人方面擬舉行大規模之慶祝典禮……依吾所見，日本官憲與日本人民，若真為顧念不幸無辜的蒼生計，則須中止揚厲鋪張的慶祝典禮……更有進者，去年九、一八事件，雖係打倒舊軍閥之快舉，然亦是同種間之傾軋，並無紀念價值。為銷滅過去傷痕起見，須抹煞一切，視為過去陳跡……<sup>13</sup>

從菊池的意見中，可以看出一些在滿日本人對時局的顧慮。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裡菊池將九一八事變看作應該「抹煞」的「過去陳跡」，而非後來官方宣傳中滿日「同心一德」的象徵。可見當時已有人認知到，當地人民並不認同日本在滿洲的作爲，甚至認爲「揚厲鋪張」的慶祝活動可能反而招致當地人的負面觀感。

日本給予滿洲國外交承認之後，滿洲國各地都於 10 月 8 日舉辦集會慶祝。在各地的大會上，均宣讀了溥儀的「教書」以及總理鄭孝胥的訓辭。鄭的訓辭對滿日關係多有著墨，他以男子成年比喻國家初建，「紀綱稍定，規模粗立」，在各種制度尚未完備的狀況下，日本率先承認滿洲國，便有著相當重大的意義：

……大日本帝國，首先承認，派遣全權，來京定約，此真日在仗義之舉……  
日本對滿洲國，既已仗義於先，必不至於爭利於後，此吾人之可以深信

<sup>12</sup> 傲霜庵，〈致武藤全權書〉，《盛京時報》，大同元年 9 月 13 日第一版。

<sup>13</sup> 傲霜庵，〈致武藤全權書〉。



綜觀鄭孝胥這篇訓辭，雖然強調兩國關係的緊密與日本的「仗義」，但並未提及滿日兩國的主從順序。在滿洲國早期的各種官方文獻對滿日關係的陳述，也大抵不脫這樣的脈絡。例如，滿洲國建國之初發佈的〈建國宣言〉，在提及對外關係時，也只強調將遵行門戶開放原則，與各國親善。<sup>15</sup>然而，隨著日本於1933年三月因滿洲國問題退出國際聯盟，以及日本內閣於同年八月通過了〈滿洲國指導方針要綱〉（以下稱〈要綱〉），滿日關係架構逐漸走向了新的階段。而日本相對於滿洲國的先進國地位在此後的論述中日益凸顯出來，

〈要綱〉進一步詮釋了日本對滿洲國的「指導」地位。該文件開宗明義地指出滿洲國與日本有不可分之特殊關係，並且「基於《日滿議定書》之精神」對滿洲國的「指導」訂定原則。這份文件指出，以關東軍司令（兼駐滿大使）為首的「日系」官僚將在實際上負責運作滿洲國的政務，也明確提示了滿日兩國間經濟、國防上「共存共榮」的關係，指出對滿洲國的「指導」須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sup>16</sup>

〈要綱〉揭示了日本控制滿洲國的基本方針。日系官僚在滿洲國政府佔據了各種重要職位，實質上主導了滿洲國的政治事務。日系官僚的權力隨著時間而不斷膨脹，關東軍對滿洲國的控制能力也與日俱增。<sup>17</sup>在制度設計之外，〈要綱〉還指出，應向滿洲人民宣揚兩國的特殊關係（底線係筆者所加）：

就滿洲國民之教化，著眼於涵養該國國民，使自覺該國對帝國之不可分的關係，並懷有確保東洋和平的特殊使命之自尊心以及五族協和之理想，且關注勞作教育，振興實業教育。<sup>18</sup>

<sup>14</sup> 〈今日慶祝承認大會・總理訓辭〉，《盛京時報》，大同元年10月8日第二版。

<sup>15</sup> 鄭孝胥，〈滿洲國建國宣言〉，收入滿洲國文教部編，《普及建國精神之教育資料第一集》，頁1-3。

<sup>16</sup> 〈滿洲國指導方針要綱〉，昭和8年8月8日，收入小林龍夫、島田俊彥編，《現代史資料7・滿洲事變》，頁589-590。

<sup>17</sup> 山室信一，《キメラ——滿洲國の肖像》，頁167-181。

<sup>18</sup> 〈滿洲國指導方針要綱〉。



〈要綱〉中所謂「與帝國之不可分的關係」，明顯包含了「日主滿從」的概念。此後這樣的觀念成為滿、日當局與關東軍建構滿日關係論述時的重要基調，並在滿洲國的種種政治宣傳中日益彰顯。1933年九月，滿洲國慶祝九一八事變兩週年暨日本承認一週年時，就有不少相關宣傳、言論呈現出以日本為尊的內在邏輯。舉例來說，外交總長謝介石發表的聲明，便感謝了「友邦」日本對滿洲國建設的貢獻以及對國家獨立的「擁護」，並呼籲國民「舉國一致，宣揚大義，使與友邦之提攜，愈趨鞏固」。<sup>19</sup>

1934年滿洲國實施帝制，溥儀登極時頒發的〈即位詔書〉，也明確地向其「臣民」表述了同樣的兩國關係架構。〈即位詔書〉重申對日本不畏國際輿論壓力「仗義」扶持的感念之情，並且強調滿日之間「協力同心」的特殊關係（底線係筆者所加）：

我國肇基，國號滿洲，於茲二年，原伏天意之愛民，賴友邦之仗義。其始凶殘肆虐，安忍阻兵，無辜籲天，莫能自振。而日本帝國，冒羣疑而不避，犯眾咎而弗辭，事等解懸，功同援溺……世難未艾，何敢苟安？所有守國之遠圖，經邦之長策，當與日本帝國，協力同心，以期永固。<sup>20</sup>

〈即位詔書〉所描述的滿日關係藍圖，可說是此後十餘年間滿洲國對其人民進行的宣傳之基礎：讚揚歷史上日本軍在九一八事變中「驅逐軍閥」的「貢獻」、稱頌日本為了維護滿洲國不惜退出國際聯盟的「仗義」、並且強調日本在滿洲國的建設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隨著滿日兩國的特殊關係逐漸確立，這種隱含「日主滿從」意涵的兩國「提攜」圖像，可見於滿洲國的各種政治宣傳，並透過各種管道滲透到滿洲國人民的視野中。而也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溥儀和日本皇室間的交往，以及他在1935年首度赴日訪問，便成為值得加以討論的課題了。

1934年五月，秩父宮雍仁親王代表裕仁天皇前往滿洲國訪問，祝賀溥儀登極，並為溥儀授勳。秩父宮是天皇的胞弟，是日本皇室中排行第二的重要人物。日本方面期望藉由他的到訪，能爭取人心，贏得滿洲國人民的「感念」之情。<sup>21</sup>

<sup>19</sup> 謝介石，〈九一五紀念聲明〉，《盛京時報》，大同2年9月15日第一版。

<sup>20</sup> 〈即位詔書〉。詔書全文可參見附錄。

<sup>21</sup> JACAR, Ref. C01003001100、昭和9年「陸滿密綴 第10号」自昭和9年6月7日至昭和

此外，日本派遣皇族訪滿，意味著滿洲國也須以同等的規格對日本「答禮」；<sup>22</sup>也就是說，秩父宮訪滿可以說是次年溥儀訪日的前奏。日方對於秩父宮這次出訪相當重視，以極高的規格辦理這次出訪的相關事務及禮儀。<sup>23</sup>

滿洲國當局隆重地接待秩父宮一行，動員各地民眾參與各種「奉迎」活動、遊行、運動會等。媒體極力向其人民陳述秩父宮來訪的重大意義，如《盛京時報》的報導便稱，秩父宮「為日本最高之皇族」，他與溥儀的會面「實無異兩元首之會見」。<sup>24</sup>該報還指出，裕仁天皇、秩父宮與溥儀年歲相近，兩國皇室可望建立私交，令兩國關係更上一層。<sup>25</sup>這類對皇室外交的想像，還出現在其他許多報導中：

滿洲國皇帝陛下，親切奉迎秩父御名代宮殿下；……（秩父宮）捧呈慶祝滿洲國帝政之（天皇）親筆書，及進贈皇帝皇后兩陛下勳章。

此實為表徵崇高敦厚之國誼，同時並為滿日一億二千萬兩國民永遠握手之象徵。<sup>26</sup>

《盛京時報》還並列刊登了秩父宮和溥儀的事歷簡表，營造兩國皇族親善的氣氛。<sup>27</sup>另外，該報也有一些報導指出秩父宮就讀陸軍大學時就曾隨軍來滿視察，強調他與滿洲的淵源。<sup>28</sup>此外，也描述秩父宮身為皇族青年的正面形象，極力形容他的「英姿颯爽」，也渲染其關懷臣僚的言行和勤於學問、軍務的日常生

---

9年6月8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sup>22</sup> JACAR, Ref. A01200678100、公文類聚・第五十八編・昭和九年・第十九卷・外事三・雜載（国立公文書館）。

<sup>23</sup> 例如，海軍省軍務局訂定秩父宮親王此次出訪登艦、離艦時的禮儀時，援引了《海軍禮儀令》第六十三條「天皇駕臨軍艦時所行禮儀」作為秩父宮自橫濱出航時乘艦官兵行禮的範例；作為對照，秩父宮於1925年出訪歐洲時，採用的禮儀是以《海軍禮儀令》第六十八條「第三條第二款之皇族非公式來艦時所行禮儀」規定為本。前者的規格是比較高的。見 JACAR, Ref. C05023403800、公文備考 昭和9年 C 儀制 卷1の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sup>24</sup> 〈恭迎御名代宮殿下〉，《盛京時報》，康德元年6月8日第一版。

<sup>25</sup> 〈恭迎御名代宮殿下〉。

<sup>26</sup> 〈兩廷結合之鞏固 東洋和平之基礎〉，《盛京時報》，康德元年6月6日第二版。

<sup>27</sup> 〈茲逢盛典爰尋往事 兩宮御事歷之對照〉，《盛京時報》，康德元年6月6日第一版；〈秩父宮殿下御事歷〉、〈康德皇帝御事歷〉，《盛京時報》，康德元年6月6日。

<sup>28</sup> 〈陸大學生時代曾遊連奉 此次乃二次蒞臨 御名代宮殿下日程〉，《盛京時報》，康德元年6月4日第二版。



活。<sup>29</sup>日本的新聞媒體同樣強調兩國皇室成員往來對兩國關係的特殊意義，一篇報導描述溥儀和秩父宮在餐會上暢談「政治、軍事、經濟、運動」等各種話題，並引述翻譯官林出賢次郎的談話，稱兩人「如兄弟般親睦」。<sup>30</sup>而滿日兩國間的「兄弟」邦誼，便透過這些敘述逐漸營造出來。

## 第二節 溥儀在日本

滿洲國實施帝制，為滿日關係帶來了新的局面。溥儀登極成為皇帝，意味著滿日兩國元首是兩位君主的對等關係。然而如前所述，滿洲國與日本的關係實際上並非真正主權國家間的對等關係。兩國關係中的這種雙面性也反映在兩位君主的交往，以及隨之而生的種種政治宣傳上。

溥儀於 1935 年 4 月 2 日清晨自新京乘火車前往大連渡海赴日。鐵路沿線各地方當局都動員民眾組成「奉送」皇帝的行列，溥儀一行搭乘的專車沿途受到地方人士夾道歡送。專車於當天下午抵達大連，溥儀一行隨即前往埠頭登上前來迎接的「御召艦」——日本軍艦「比叡」號，拔錨航向橫濱。

這次行程受到滿、日兩國媒體的高度關注。滿洲國各主要報社組成了記者團隨行，每日均在報上刊載訪問的動向。此外，在訪問結束後也有一些相關書籍出版。在這類出版品中，內容最完整豐富的是林出賢次郎的《扈從訪日恭記》一書。林出作為這次出訪的隨員，擔任溥儀的翻譯官，全程參與了其在日本的各項行程。翌年林出便完成了本書，並以日、漢文兩種版本在滿洲國內出版。<sup>31</sup>林出是日本外務省官員出身，立場上與軍方並不完全一致；他在滿洲國宮廷內任職，深受溥儀信任，而他本身對溥儀也抱有相當的敬意與好感。<sup>32</sup>於是他筆下

<sup>29</sup> 〈秩父御名代宮殿下御平素之御生活〉，《盛京時報》，康德元年 6 月 6 日第四版。

<sup>30</sup> 〈康德皇帝との濃かな御友情〉，《朝日新聞》，昭和 9 年 6 月 10 日第二版。

<sup>31</sup> 林出賢次郎（1882-1970），和歌山人，1905 年進入日本外務省擔任通譯。滿日建交時派任駐滿大使館，其後因受溥儀賞識進入滿洲國執政府任職，擔任溥儀的翻譯，也因此有接觸滿日要人和各種機密情報的機會。外務省與軍方在立場上多有對立，林出在外務省授意下蒐集情資，暗中將溥儀與關東軍司令官的對談記錄發回國內。戰爭末期這批稱為「嚴密會見錄」的記錄在混亂中散佚，直到林出去世後，他當時留存的底稿才被發掘出來。由於環境所限，筆者只能取得《扈從訪日恭記》的日文版。本文中關於本書的引文、討論均以 1936 年改訂版（新京：滿洲帝國國務院總務廳情報處）為主。此版本收入東北亞研究所編，《滿蒙地理歷史風俗誌叢書》第 145 本（首爾：景仁文化社，1997）。

<sup>32</sup> 中田整一，《満洲国皇帝の秘録：ラストエンペラーと「厳秘会見録」の謎》（東京：幻戯書房，2005），頁 24-27。

的溥儀，便呈現出與一般官式文章不盡相同的形象。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將不會詳述溥儀在日本的行程。<sup>33</sup>以下筆者將爬梳滿、日媒體以及《扈從訪日恭記》對於此次訪問的各種報導、記述，討論這些報導文章中所呈現的兩位君主的互動關係以及滿日兩國關係。

## 溥儀與天皇

溥儀和裕仁天皇的會見是此次行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對當時滿日兩國的新聞媒體而言，兩位君主的交往也是報導的焦點。溥儀一行在東京停留了十一天（4月6日到16日），期間有數次與天皇共同出席的公開活動，並有若干與日本皇室其他成員往來的行程。在這些行程當中，他和天皇的交流是怎麼呈現在大眾面前的呢？

溥儀搭乘的列車於4月6日早上抵達東京車站，裕仁天皇親自在月台上迎接。在用過午飯後，溥儀一行在秩父宮親王的陪同下進入皇宮會見天皇以及皇后；《盛京時報》以「曠古盛儀」來形容這場會晤，並稱列席的滿日兩國隨員都對此「御交驩」感到「甚為感激」。<sup>34</sup>林出賢次郎詳細地記述了這次談話的過程，形容溥儀和裕仁天皇「進行了光輝於青史之交歡」。<sup>35</sup>當日下午，天皇前往溥儀寄宿的赤坂行宮「回訪」，兩人再度進行交談。在場擔任翻譯的林出對兩人的會面做了這樣的描述：

（溥儀和天皇）隔著小小的桌子相對而坐，真切地領會到（兩人）親近的態度……我 天皇陛下的態度誠為親切，我沐浴在作為翻譯的光榮當中，漸漸湧現強烈的感激之情。<sup>36</sup>

在林出的記述以及當時各種報刊的敘事中，類似的說詞反覆出現。滿日兩國的媒體都強調兩國君主會面的歷史意義以及兩人會面情境的融洽，並由此衍申出滿日兩國關係的和諧。在這類文字當中，溥儀和天皇的形象多半顯得莊重、尊貴，流露出作為有德君主的人格特質，同時也極力渲染兩位君主的人格感染力。

<sup>33</sup> 溥儀此次訪日行程，請見附表 3-1。

<sup>34</sup> 〈皇帝晉宮御歡談 滿日交親彌固〉，《盛京時報》，康德 2 年 4 月 7 日第一版。

<sup>35</sup> 林出賢次郎，《扈從訪日恭記》，頁 33。

<sup>36</sup> 林出賢次郎，《扈從訪日恭記》，頁 35。

在這些官式文章之外，林出在《扈從訪日恭記》還記錄了溥儀許多私底下的言談，他筆下的溥儀雖然仍維持著莊重溫文的君王形象，但也是個相當生動、情感豐富而有人情味的人物。<sup>37</sup>在當時的新聞媒體或出版品上，對於溥儀這類形象的描述相當普遍，而溥儀前半生的波折過程更是當時許多出版品的題材。<sup>38</sup>相較之下，此時期無論是日本國內的媒體或者是滿洲國方面的報刊對於裕仁天皇的敘述，就極少看到這樣的面相。讀者在媒體上看到的，是一位莊重嚴肅而面目模糊的君主。

相較於與天皇的官式會面，溥儀與其他日本皇室成員的互動就輕鬆得多。溥儀滯留東京期間，他在各種場合曾多次與秩父宮會面；秩父宮與其弟高松宮親王、澄宮親王亦曾前往溥儀投宿的赤坂離宮拜訪。林出對於這幾次會面的記述也相當生動，他描寫溥儀前往表町御殿拜訪秩父宮時，寫下溥儀和秩父宮及其王妃一同欣賞庭中孔雀的情景，並且也提到他們與同席的溥儀之弟溥傑等人享用內江皇太后贈與的甜點的場面。<sup>39</sup>溥儀於4月10日晚上設宴款待秩父宮親王以下的日本皇室成員，同席的還有溥儀的三妹韞穎及其夫潤麒。在宴會結束後，溥儀對席間擔任翻譯的林出發出了這樣的感言：

林出，今晚的宴會太好了，沒有客人那樣的氣氛，而像是真正一家人的聚會，真的很愉快、很開心。<sup>40</sup>

「一家人」這樣的表述是頗值得玩味的。正如波多野勝所指出的，「家人」這個概念在日後滿日兩國皇室的交流中有著相當深長的意義。<sup>41</sup>溥儀的這番感想，一方面顯露出他本身對於滿日關係的想像，但另一方面也在無意之間預示

---

<sup>37</sup> 其中一例是，林出賢次郎在《扈從訪日恭記》書中記錄了溥儀乘船渡日時發生的趣聞，摘錄如下：「自艦上乘組員聽聞，午後五時左右，有一隻鶴自南方飛來，掠過御召艦上空，輕拍翅膀向東飛去。將這件事稟報陛下，陛下在展望台上聆聽後說道：『禽獸大概也感受到日滿親善、東方和平之喜悅吧。天地與人、物的氣相相通啊。』」見氏著，《扈從訪日恭記》，頁29。雖然內容稍有不同，但這個故事在當時滿、日兩國報紙上都有刊出。

<sup>38</sup> 例如中保与作，《滿洲国皇帝》（東京：日本評論社，1935），東北亞研究所編，《滿蒙地理歷史風俗誌叢書》第165本（首爾：景仁文化社，1997）翻印本。

<sup>39</sup> 林出賢次郎，《扈從訪日恭記》，頁86-89。

<sup>40</sup> 林出賢次郎，《扈從訪日恭記》，頁117。

<sup>41</sup> 波多野勝，《昭和天皇とラストエンペラー：溥儀と満州国の真実》（東京：草思社，2007），頁111。

了滿日兩國關係的特殊性和曖昧性；畢竟，自始至終這種「家人」般的情誼似乎並未出現在溥儀與裕仁天皇的交往中。

1930 年代的日本正處於君主立憲制度逐漸弱化、國粹主義抬頭的時期，天皇和皇族成員的公眾形象也有了轉變。此時裕仁天皇的形象正逐漸神秘化，被塑造為勤於政事、軍務的「大元帥」君主。<sup>42</sup>縱然公眾媒體上天皇和溥儀的往來看似和睦，但對兩位君主形象、人格敘述的差異，仍顯露出滿日君主互動關係在媒體的呈現，是如何受到日本國內政治氣氛的影響；而滿日君主的交往關係，亦屈從於日本國內政治秩序的需求之下。

### 「奉迎」活動

為了迎接溥儀來訪，日本軍政當局安排了各種「奉迎」活動，也對兩國人民宣揚滿日邦誼的重要性。自 1935 年年初以降，日本的報刊媒體便經常刊載滿洲國皇帝即將來訪的消息，以及官方「奉迎」活動的籌備進度。這些相關的報導，也同時持續在滿洲國內報紙上刊載。此外，當局也動員民眾參加諸多活動，參與這場「奉迎」的盛典。

溥儀來訪前夕，民間的各種奉迎活動便開始醞釀：關西地區的小學生與熱河的學校透過滿洲國公使館交換書信、明信片，報導稱此活動共收集了五百多件書信；<sup>43</sup>東京市內各主要商業區也準備奉迎活動，搭建牌樓、懸掛旗幟、燈籠。<sup>44</sup>這類活動除了在回應政府的動員，同時亦有商業的考量。溥儀訪日也帶動了許多商業活動：遞信協會發行了紀念明信片；朝日新聞社則舉辦了「大滿洲國展覽會」，展示滿洲國要人的相片、溥儀的墨跡以及介紹滿洲國民土風情的各種展品。而以慶祝皇帝訪日為名的商業廣告，在此時期的報刊上更是多不勝數。

這段期間有許多與滿洲國相關的出版品出現在市面上。新聞媒體也順應市場需求製作了各種專題報導。以東京《朝日新聞》為例，自溥儀抵達日本之後，便先後以號外或者加刊的形式提供溥儀在日行程的報導，該報大量使用照片作

<sup>42</sup> 伊藤之雄的研究指出，昭和初年裕仁天皇以及其他皇族成員的形象仍承襲大正時期「健康」、「平民化」的傳統，但到 1930 年代以後，天皇就越來越常以戎裝的形象示人，也藉此營造其君主權威，回應保守派與軍方人士對天皇的不信任。見氏著，《昭和天皇と立憲君主制の崩壊：睦仁、嘉仁から裕仁へ》（名古屋：財団法人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5）。

<sup>43</sup> 〈可憐な日滿親善〉，《朝日新聞》，昭和 10 年 3 月 14 日夕刊第二版。

<sup>44</sup> 〈銀座の裝飾豪華版〉，《朝日新聞》，昭和 10 年 3 月 14 日夕刊第二版；〈日滿親善の旗模様 街に氾濫する奉迎色〉，《朝日新聞》，昭和 10 年 3 月 22 日夕刊第二版。

為報導的手段，鉅細靡遺地介紹溥儀其人、滿洲國歷史以及滿日關係。此外，朝日新聞社派員拍攝溥儀在日行程的新聞影片，並在第一時間於日本國內放映。除了朝日新聞社等民間企業團體，日本文部省也在日本國內放映影片，介紹滿洲國的國情與滿日親善的理念。另外，文部省也委託東京音樂學校編寫了一首〈滿洲國皇帝陛下奉迎歌〉，在各級學校教唱。<sup>45</sup>

除了皇室以及政府當局，各級學校、地方政府、民間團體也舉辦了「奉迎」集會活動，而相關的消息也可見於滿洲國內的報刊。溥儀抵達東京時，當局動員了市內各機關團體夾道歡迎，《盛京時報》形容場面「呈未曾有之偉觀」。<sup>46</sup>4月10日，溥儀出席東京市主辦的「奉迎會」，並欣賞歌舞伎演出。而在溥儀滯留東京期間，市內各級學校也被動員起來，參與提燈遊行、花車遊行等活動。《盛京時報》在一篇報導中寫到當地小學生冒著大雨「奉迎」，熱誠之情讓擔任侍衛武官長的張海鵬流下「感激之淚」。<sup>47</sup>

這些報導自然是要讓滿洲國人感受到日本人的親善之情，增進國人對日本的信賴。除了媒體報導以外，滿洲國當局也試圖透過各種管道向其人民宣揚溥儀訪日的歷史意義，以及他在日本獲得的盛情歡迎。其中一例是，奉天省政府下令轄下各學校須在每天朝會、授課時，「依據報紙之所載」向學生講述皇帝在日本訪問的景況。

在這些報導之外，放映影片也是當時頗受重視的宣傳方式。溥儀在日本的公開行程均有攝影班拍攝影片，完成後製後隨即自日本空運回新京，並對一般人民公開放映。<sup>48</sup>除此之外，在黑河等地則有溥儀訪日新聞照片的公開展覽；<sup>49</sup>當局事後也派遣宣傳班下鄉宣揚。<sup>50</sup>這些宣傳活動的成效如何雖無從判斷，但也足可說明當局的宣傳意圖，以及皇帝訪日時「奉迎」活動的政治意義。

### 「骨肉的支援」

在溥儀一行乍抵日本時，滿洲國宮內府大臣沈瑞麟接受記者訪問，表示除

---

<sup>45</sup> 歌詞與樂譜見附件 3-1。

<sup>46</sup> 〈奉迎誌盛〉，《盛京時報》，康德 2 年 4 月 7 日第二版。

<sup>47</sup> 〈如此熱誠：京橋小學生豪雨中奉迎〉，康德 2 年 4 月 12 日第一版。

<sup>48</sup> 〈內廷謹映東都御影 皇后陛下親臨御覽〉，《盛京時報》，康德 2 年 4 月 9 日第四版。

<sup>49</sup> 〈至尊渡日寫真 省署門前揭示〉，《盛京時報》，康德 2 年 4 月 23 日第版。

<sup>50</sup> 〈各校敬謹講述皇帝東幸御情〉，《盛京時報》，康德 2 年 4 月 13 日第四版。

了促進兩國關係，溥儀此次訪問日本是要答謝日方對滿洲國的「援助」。<sup>51</sup>溥儀訪日期間，這樣的言論一再於報刊上出現，而且不只出於官方人士。例如滿洲國內各報組織的隨行記者團在抵達日本後，隨即公開發表聲明，對日本公眾說明此行的目的：

……對於貴國朝野，自我國建以來，所示絕大好意與援助……表示深甚之謝意。……我國得貴國官民之骨肉的支援……我等滿洲國民將貴國之可學者，則必學之……為我國運之發皇，與兩國國交之敦睦親善，極希願致微力……<sup>52</sup>

這篇聲明提示了溥儀此次訪日的幾個面向：首先，溥儀之行的「答謝」、「感激」意涵，再度確認了滿日兩國間的主從關係。而在政治上的主從序位之外，這段文字也推崇日本是「先進」之國，是滿洲國尋求「長短相濟」的對象，於是這篇宣言可說再一次肯定了日本相對於滿洲國的優越地位。以下將就滿日兩國相對地位的問題作進一步的討論。

在滿洲國的歷史敘述與滿日關係論述中，日本軍人的「犧牲奉獻」是相當重要的環節。在歷年的建國紀念活動上，溥儀均會主持慰靈祭，祭祀在九一八事變以及日後戰事中陣亡的日本官兵。1935年也是日俄戰爭三十週年，奉天省城舉辦了盛大的紀念活動，當時《盛京時報》這樣歸納日俄戰爭的歷史意義：

追溯日俄戰爭之目的，東鄰日本，從驅逐俄國併吞滿洲之野心，暨保護東亞和平，及確保東亞民族之地位起見，毅然舉其王師，轉戰滿洲曠野……善鄰日本，毅然與歐洲強國以干戈相見，打倒東漸之野心……普遍王道之恩澤。<sup>53</sup>

在溥儀訪問日本的過程中，許多行程的安排也反映了滿日兩國的這種特殊

<sup>51</sup> 〈皇帝此行係為酌答貴國好意 沈宮相在橫濱發表聲明〉，《盛京時報》，康德2年4月7日第三版。

<sup>52</sup> 〈扈從記者團訪日通信：足印蓬島第一步 發表聲明書〉，《盛京時報》，康德2年4月7日第四版。

<sup>53</sup> 〈為我民族挫彼勁敵 日俄戰爭三十週年〉，《盛京時報》，康德2年3月10日第四版。

關係。溥儀於 4 月 7 日參拜了奉祀明治天皇的明治神宮；同日，又參拜了奉祀殉國官兵的靖國神社，以「悼念成為東洋和平之高貴礎石，以鮮血揮灑滿洲之曠野的我（日本）戰歿勇士之靈」<sup>54</sup>。4 月 13 日，溥儀一行又造訪了陸軍第一衛戍醫院探望傷兵。根據報導，溥儀一一慰問在院內休養的日軍官兵，並向陪同的日本陸軍大臣林銑次郎下達敕語，對日本軍人「援助滿洲建國之勞苦」表達感謝之意。<sup>55</sup>

日本軍人在滿洲的種種「貢獻」，是滿日關係論述中的重要部分，也是日本在滿洲維繫其特殊權益的正當性來源之一。自九一八事變以降，關東軍便致力於各種宣傳活動，對公眾製造「良好」印象。而在前一年秩父宮親王以「親善」之名訪滿時，也特別參訪了九一八事變時的主要戰場北大營，以及日俄戰爭時旅順戰場的遺址，並前往紀念日軍陣亡官兵的「忠靈塔」憑弔。

溥儀在日本的這些行程，也可以視為軍方營造這種「日滿親善」想像的策略。顯而易見地，這類行程的安排意圖強化日本與滿洲國在歷史與精神上的聯繫，也向滿日兩國人民再一次展現日本軍的武功，以及軍隊作為「日滿一體」的主要實踐者的角色。

日本的文化實力也是決定滿日關係秩序的一大要素。溥儀在日本的參訪行程包括了諸多重要的文化景點。溥儀在東京滯留期間曾參拜奉祀孔子的湯島聖堂，也數次參觀設於赤坂離宮內的帝室博物館。他也參訪了京都金閣寺、二條離宮、奈良東大寺等古剎名勝。根據林出賢次郎的記述，溥儀對於日本傳統文化遺產有相當的興趣，也對日本傳統文化的保存留下極深的印象。在訪日期間，他曾數度提及這方面的看法：

此來東京，感到日本人完善地保存了古老的習慣，名勝古蹟的保存也相當良好，日本固有之精神昂然存續了下來。<sup>56</sup>

千年以上的文物被確實完善的保存，終究是由於日本國體使然，顯示出

<sup>54</sup> 林出賢次郎，《扈從訪日恭記》，頁 74-75。

<sup>55</sup> 〈對為國辛勞將士賜優渥敕語〉，《盛京時報》，康德 2 年 4 月 14 日第一版。

<sup>56</sup> 4 月 14 日，溥儀與秩父宮親王談到在東京訪問的感想。林出賢次郎，《扈從訪日恭記》，頁 151-152。

國民對皇室的尊崇之念。確實感到日本國民對皇室的忠節之念的深厚。<sup>57</sup>

觀現下世界之狀態，其大勢是西洋的物質文明已無前途。物質文明之弊是利己心。反之，東洋文明的真精神乃是仁恕……無東洋文明根本的仁恕，進步的物質文明亦無用處，而會見到有害於人類的結果。<sup>58</sup>

在這幾次的談話中，溥儀表達了對日本維繫傳統道德價值的肯定，將之視為滿洲國應效法的對象。這種思維隱含著對 1920 年代以來中國社會排斥傳統、崇尚西化風潮的反感。另一方面，溥儀在談話中，也流露出對日本天皇制國體下仍保有對皇室的尊崇的欽羨之意。而這種心態與他在日本的這些經驗也影響了溥儀回國後的種種言行，期望在滿洲國建立以日本為藍本的君主制度（詳見本章第三節）。

以日本為文化的先進國的論述在此時期相當普遍，在溥儀訪日期間，許多滿洲國的官方要員也都有類似的言論。<sup>59</sup>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言論也往往強調日本在文化上與滿洲國的共通性，一方面論證滿日兩國之間的特殊關係有文化上的淵源，另一方面也藉由這種文化共通性的論述，指出滿洲國倣效日本建立各種制度、維持傳統道德文化的必要性，並且推導出日本在政治、文化體系上的優越性以及其在東亞諸國中的領導地位。林出賢次郎便對記者發表了這樣的談話：

日本國民對於友邦君主，熱烈歡迎。以此一事，亦可以明瞭日本國民，對於皇室忠誠之念，如何深切矣。夫人道之大本，五倫五常之道，日本有之。將東洋精神，廣播於世界者為日本國也。<sup>60</sup>

<sup>57</sup> 4 月 19 日，溥儀參觀奈良正倉院的感言。林出賢次郎，《扈從訪日恭記》，頁 194。

<sup>58</sup> 4 月 24 日，溥儀返國前夕在座艦接見林權助男爵等日方接待要員時的談話。《扈從訪日恭記》，頁 239-241

<sup>59</sup> 例如沈瑞麟在對記者談話時，稱許日本兼重經濟產業的發展與傳統文化的留存：「於東京觀文明之發達，輝煌燦爛；於京都觀維持滿都之繁榮，風景燦然；於奈良觀不遺餘力，保存文化古物；於大阪觀生產之繁盛，進步無窮……」見〈貴國至厚友好 陛下聖懷暢悅：宮內府尚書沈瑞麟謹話〉，《盛京時報》，康德 2 年 4 月 24 日第一版。

<sup>60</sup> 〈林出賢次郎謹話〉，《盛京時報》，康德 2 年 4 月 23 日第一版。



另外一例是《盛京時報》的隨行記者裕振民就他在日本的見聞所發表的感想：

日本文化之進步，固為吾人夙所聞知者……信非受善良之政治支配，恐不能如此，各極其妙……

此外最使吾人傾心，而滿洲全國民，又必須效法者，即日本國民精神之振作……滿洲國有此友邦，是滿洲國之幸；遠東有此國家，信亦遠東人民之幸。<sup>61</sup>

裕振民在他的系列文章中一再稱許日本社會的「文明」、「進步」，也對日本軍民的「忠君思想」留下極深的印象。<sup>62</sup>經由這些實地的觀察，裕氏在文中試圖向其讀者展示日本政治、社會體制的優越性，提示滿洲國應以日本社會為發展的藍本，特別是應當效法日本人民「精神之振作」以及對天皇的尊崇。在他的文章當中，這些概念反覆呈現，呼應了官方的政治訴求，無形中也再度確認了滿日兩國之間的次序關係。

### 第三節 〈回鑾訓民詔書〉及其頒行

溥儀於 4 月 26 日結束出訪行程歸國。在此次行程結束之後，關東軍以及滿洲國政府便開始籌劃各種紀念活動，向國內人民宣揚皇帝訪日的意義。而這系列活動中最重要的一項，便是〈回鑾訓民詔書〉的頒行。

〈回鑾訓民詔書〉的形成以及頒行是多方參與的結果。波多野勝的研究指出，溥儀本人積極地介入了詔書形成的過程。而根據溥儀本人的回憶，由於在日本受到的款待以及對日本人尊君思想的觀察，他開始認為可以倣效日本天皇制，樹立自己身為滿洲國皇帝的權威。<sup>63</sup>他還在日本時，就數次向其臣僚表示希望在歸國後頒佈詔書，使國民理解「日滿兩國不可分的關係」。<sup>64</sup>而在歸國之後，

<sup>61</sup> 裕振民，〈扈從記者團東遊記（五）〉，《盛京時報》，康德 2 年 4 月 24 日第三版。

<sup>62</sup> 裕氏記述參訪陸軍衛戍醫院的感想如下：「最使我感觸印像的，就是他們的洗臉所的自來水前，有一個諭條，上面寫的是每朝洗臉後務要向皇城遙拜。這可見他們素日的忠君思想，是我們佩服的地方。」見氏著，〈扈從記者團東遊記（四）〉，《盛京時報》，康德 2 年 4 月 23 日第十一版。

<sup>63</sup>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北京：群眾出版社，2007），頁 263。

<sup>64</sup> 波多野勝，《昭和天皇とラストエンペラー》，頁 140。

他便開始向其臣僚陳述「與天皇精神如一體」的觀念，意圖利用天皇對日系官僚的權威，強化自己的政治影響力。

4月28日，關東軍司令官（兼日本駐滿大使）南次郎入宮覲見，與溥儀討論赴日參訪的感想。溥儀提及應效法日本在滿洲國建立起忠君的政治體系。<sup>65</sup>溥儀也在一些重要場合提及對日本行的感想，多次提及日本軍民表現出的盛情，讚揚日本人的忠君精神。4月29日，溥儀出席日本駐滿大使館的天長節慶祝儀式，向南次郎表示自己與天皇「完全一體」。<sup>66</sup>溥儀又於翌日（30日）召集文武官員，發表談話，他在回憶錄《我的前半生》中記述了這段訓示的內容：

……我認為：如果日本人有不利於滿洲國者，就是不忠於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有滿洲人不利於日本者，就是不忠於滿洲國的皇帝；如果有不忠於滿洲國皇帝的，就是不忠於日本天皇，有不忠於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於滿洲國皇帝……<sup>67</sup>

5月2日，宮廷舉辦了詔書宣誥式，〈回鑾訓民詔書〉正式發佈。<sup>68</sup>這篇詔書明確地指出滿洲國皇帝和日本天皇「氣同道合，依賴不渝」，除了強調日本對於滿洲國「建國」的貢獻，也論及日本國民的尊君思想以及「忠勇奉公、誠意為國」的精神。詔書末段如此定義滿洲國皇帝與日本天皇的關係：

朕與 日本 天皇陛下，精神如一體。爾眾庶等，更應體仰此意，與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兩國永久之基礎，發揚東方道德之真義。則大局和平，人類福祉，必可致也。<sup>69</sup>

翌日（3日），包括《盛京時報》在內的各大傳媒發佈了此一消息，並刊載了詔書全文。《盛京時報》同日還刊登了總理鄭孝胥的訓辭，號召國民奉行詔書

<sup>65</sup> 波多野勝，《昭和天皇とラストエンペラー》，頁130-131。

<sup>66</sup> 波多野勝，《昭和天皇とラストエンペラー》，頁138。

<sup>67</sup>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頁263。

<sup>68</sup> 此詔書定稿的過程，可參見波多野勝，《昭和天皇とラストエンペラー》第五章「回鑾訓民詔書」。

<sup>69</sup> 〈回鑾訓民詔書〉全文，詳見附錄四。

的訓示，「以陛下聖心爲心，全力躬行」。<sup>70</sup>政府並且決定於5月15日於全國各地舉辦慶祝活動，對人民宣揚詔書的理念，並督促各地政府展開籌備工作。另外，當局也著手推動各種「詔書渙發」的紀念事業；以新京市爲例，內容包括興建公會堂等紀念性建築、辦理「夏期王道大學」、爲國內中小學生募集書刊等等。其中最特別的，是號召市內日系官員納稅，以「將自（治）外法權之一部自動的撤廢」。<sup>71</sup>治外法權的撤廢是「建國」以來頗具能見度的政治問題，選擇將此事納入「紀念事業」，雖然僅具有象徵意義，但也可見當局意圖借此機會改善人民對日觀感的用意。

5月15日，滿洲國各地同時舉行慶祝大會。這些集會多半由當地官員向與會者宣讀詔書以及對日本的「感謝狀」，並合唱「滿日交歡歌」；<sup>72</sup>集會結束後，還動員當地學生參與遊行，散發宣傳品，並高呼口號。同日的報紙上還刊登民政部的消息，向國內各地方政府、學校、法人團體徵求感謝狀以及賀表。<sup>73</sup>此外，各地也舉辦了各種演講會、電影放映會，宣揚皇帝訪日的種種意義。

這段期間在報端也可見到許多相關的宣傳報導文章。重要官員如鄭孝胥、<sup>74</sup>金璧東（新京市長）、馮涵清（司法大臣）等人均發表談話，宣言「奉戴」詔書；各中央官署也紛紛召集下屬官僚，舉辦公開恭讀詔書的集會。此外，各地方政府也在中央的號召下，辦理「詔書傳達式」，集合各縣市首長和省府官員「傳達」詔書內容和皇帝的「聖旨」，並再往地方基層宣達。在這些官式活動中，滿洲國的政府高官是怎麼理解溥儀訪日的意義，並且轉譯詔書的意旨呢？以下引述新

<sup>70</sup> 〈聖旨昭昭不勝感激 我等臣民只有實踐躬行：鄭國務總理大臣謹話〉，《盛京時報》，康德2年5月3日第四版。

<sup>71</sup> 〈皇帝訪日紀念事業 八項設施成案發表〉，《盛京時報》，康德2年5月12日第十版。

<sup>72</sup> 各地慶祝大會的流程可見康德2年5月14日至16日間《盛京時報》刊登的數篇報導。〈日滿交歡歌〉歌詞如下：「東亞兮光明，海晏兮昇平/富士山美玉龍飛，長白山麗采鳳騰/長白富士相輝映，龍飛鳳舞慶康寧/慶康寧，慶康寧，日滿交歡若弟兄；相親兮扶助，相愛兮提攜/兄弟怡情和樂忱，□□□□□□□/□□□□□□，兄弟提攜永弗替/永弗替，永弗替，天恒綿綿無盡期」。見穆景元口述實錄〈我所經歷的偽滿農村小學〉，收入齊紅深主編，《日本對華教育侵略：對日本侵華教育的研究與批判》（北京：昆侖出版社，2005），頁159-173。

<sup>73</sup> 〈慶祝大會以外 民政部廣徵賀表及感謝狀〉，《盛京時報》，康德2年5月15日第四版。

<sup>74</sup> 事實上，鄭孝胥雖也參與了詔書的草擬，但和關東軍方面的意見卻有扞格。關東軍中佐吉岡安直（時任滿洲國帝室御用掛）主張詔書中應當強調「日滿一體」的兩國特殊關係之「永久鞏固」，對鄭氏所擬的詔書稿表示不滿。後來溥儀召見鄭氏與吉岡兩人定奪，主張在詔書中強調與天皇的「兄弟」情誼。鄭氏所擬草稿以及溥儀、吉岡對鄭氏的批評，可參見〈昭和十年/康德二年五月二日宣詔セラレタル詔書ノ真義〉，轉引自波多野勝，《昭和天皇とラストエンペラー》，頁140-149。

京市長金璧東在 4 月 27 日的廣播談話為例：

……我國自建國以來……無論政治軍事物力財力，均賴友邦大日本帝國朝野之仗義援助……皇帝陛下鑾駕東渡以後……（日本）舉國官民奉迎之周備與熱烈，如火如荼，歷歷在目。……從此遂鑄成日滿兩國萬古不磨之親善基石，而兩國間好盟之關係，自愈成不可分之形勢……<sup>75</sup>

除此之外，金氏在 5 月 3 日詔書發佈後對市公署僚屬的演講當中，陳述皇帝訪日過程中體現的「日滿一體」精神：

皇上鑾駕東渡以後……（日本官民）招待之殷勤、迎送之熱烈，教我們無法形容……在我國建國以來，世界上對於友邦種種援助我們，多感懷疑。老實說，就是我們本國人民，也有覺得靠不住的，因此對於日滿親善幾個字，祇能作到五成……現在友邦的誠意已竟整個表達出來了……<sup>76</sup>

金璧東的這兩場談話分別發佈於詔書頒布前後，談話的內容也大同小異，均強調日本官民對溥儀的盛情款待以及日本對滿洲國的援助與特殊情誼，並呼籲公眾應當擁護皇帝對日親善的意旨。但基本上，兩場談話的內容並無太大差異，看不出詔書發表對於金氏的言論取向有明顯的影響。金氏在 15 日新京市慶祝大會上的致詞內容，大抵也不出上述的範疇。<sup>77</sup>

值得注意的是，金氏在 5 月 3 日的演講詞中公開承認滿洲國人民對於日本的種種「援助」頗不信任，並且聲稱經過皇帝此次出訪，應可消除人民對日本的不信任感，將日滿親善的信念「作到十成」。<sup>78</sup>溥儀的出訪，在金璧東等滿洲國要人看來，是一個提升滿洲國人民對日好感的契機。然而在這個例子當中，溥儀透過〈回鑾訓民詔書〉以及其中隱含的天皇權威提升對其臣民的威望之意圖，似乎未能直接引起國內官民的共鳴。

<sup>75</sup> 金璧東，〈皇帝陛下御訪日歸國奉祝辭〉，《盛京時報》，康德 2 年 5 月 9 日第七版。

<sup>76</sup> 〈奉戴之餘感悚交加 金市長宣達聖詔〉，《盛京時報》，康德 2 年 5 月 9 日第七版。

<sup>77</sup> 〈兩國共存共榮信念已達到最後之成功：金市長致開會詞〉，《盛京時報》，康德 2 年 5 月 18 日第七版。

<sup>78</sup> 〈奉戴之餘感悚交加 金市長宣達聖詔〉。

在日本外務省的內部文件中，也認為溥儀訪日對各階層滿洲國人民的對日觀感有明顯的正向影響。<sup>79</sup>但另一方面，日本駐安東領事益谷秀夫卻在報告中指出，安東當地民眾對於皇帝訪日一事「沒有發表什麼特別感想」，雖然知識階級對這場「盛儀」表達了肯定之意，但「大部分的滿人沒有對於此事的關心」。<sup>80</sup>一方面，或許可以由此推論當時滿洲國的宣傳機器的力量有地域上的差異；另一方面也可以發現，一般人民可能並未意識到溥儀施展其皇帝權威的嘗試。從一些口述資料來看，當時多數人只理解到〈回鑾訓民詔書〉強調「日滿親善」的面向。<sup>81</sup>

駒込武指出，〈回鑾訓民詔書〉的頒行是滿洲國史上的標誌性事件，象徵日本天皇制意識形態開始向滿洲國移植，進而使滿洲國的國家政治理論和意識形態日本化，並被納入日本帝國的政治秩序理論之下。<sup>82</sup>在這樣的脈絡下，詔書當中「朕與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體」的表述，已經不再是要肯定滿洲國皇帝權威，而是要追認日本天皇相對於滿洲國皇帝的更高權威，並且為關東軍深化對滿洲國的實質控制建構了有利的理論基礎。1936年四月，時任關東軍司令官的植田謙吉在內部文件〈滿洲國的根本理念與協和會的本質〉（〈満洲国ノ根本理念竝協和会ノ本質ニ關シ茲ニ永久ニ之ヲ闡明ス〉）當中，明確地將天皇與滿洲國皇帝的關係定義下來，主張「滿洲國皇帝基於天意即 天皇之大御心即帝位」。<sup>83</sup>至此，關東軍徹底實現了對滿洲國的支配，也就注定了溥儀此後只能背負「傀儡」的罵名。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表示，在他發表那番「天皇與我平等」的言論之

<sup>79</sup> 〈満洲国皇帝陛下御訪日盛儀に依る同国態度の動向〉，轉引自波多野勝，《昭和天皇とラストエンペラー》，頁 150。

<sup>80</sup> 波多野勝，《昭和天皇とラストエンペラー》，頁 151。安東即今丹東，引文中所謂「滿人」係泛指滿洲國內非日籍的本地人。

<sup>81</sup> 從一些曾受滿洲國治下的學校教育的人的口述訪談來看，多數人對於〈回鑾訓民詔書〉的認識，只在於其中強調「日滿親善」的面向，並未由中意識到皇帝本身的權威。例如據穆景元的說法，〈回鑾訓民詔書〉是溥儀「美化日本侵略者……命令東北人民要像他一樣，與日本侵略者『一德一心』，忠於日本天皇」；陳尊三則回憶道：「在〈回鑾訓民詔書〉中通篇是向日本皇室搖尾乞憐的奴才腔調……大肆宣揚所謂『日滿親善』。說什麼『朕與日本天皇精神如一體，爾眾庶等，更應仰體此意，與友邦一德一心』，這就是說他當奴才還不夠，還要老百姓也跟他一道當奴才，而且永遠當下去。」見穆景元口述實錄〈我所經歷的偽滿農村小學〉；陳尊三口述實錄〈我經歷的奴化教育〉，收入齊紅深主編，《日本對華教育侵略：對日本侵華教育的研究與批判》，頁 173、203。

<sup>82</sup> 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頁 279-281。

<sup>83</sup> 〈満洲国ノ根本理念竝協和会ノ本質ニ關シ茲ニ永久ニ之ヲ闡明ス〉。

後，關東軍便開始限制他與其他大臣的往來。<sup>84</sup>而在〈回鑾訓民詔書〉頒佈之後的政府改組，則代表了東北舊官僚與「遺老」勢力的淡出，和更親日的新一代滿系官僚的抬頭。<sup>85</sup>這樣的結果，也就証實了溥儀終究無法利用政治操作壓抑關東軍與日系官僚在滿洲國的權力。

#### 第四節 小結

爲了使日本在滿洲的擴張行爲以及九一八事變的軍事行動獲得法理上的正當性，自滿洲國「建國」之後，滿日關係論述就一直是關東軍和滿洲國當局關注的焦點。透過《日滿議定書》的簽署，滿日兩國間的特殊關係架構被確立起來；而另一方面，關東軍也開始建構「日主滿從」的兩國秩序，並在這樣的前提下推動「日滿親善」的交流互動。秩父宮 1934 年的訪滿，以及溥儀翌年的訪日，也都是在這樣的脈絡下進行的。

日本方面對於溥儀訪日的行程安排，是要藉由兩國元首的交流，以及強調滿日之間在歷史上與現實中的聯繫，呈現出滿日兩國緊密的「親善」關係。但綜觀媒體對溥儀與裕仁天皇以及其他皇室成員互動的敘述，仍可以看見兩位君主之間隱然浮現的主從關係；而這樣曖昧的「家人」關係，也正與現實政治環境下的滿日關係遙相呼應。

除了政治上的主從關係，溥儀的行程以及旅程中的種種言行，也進一步確認了日本相對於滿洲國的「先進國」地位。一方面，在政治、軍事和經濟層面，滿洲國均高度仰賴日本的「援助」。另一方面，日本作為當時東亞唯一的現代化強權，在「文明」的發展上較其他東亞國家進步。而對溥儀來說，日本也是一個在現代化過程中保有「東洋傳統道德」的國家，是同樣以傳統道德為政治號召的滿洲國理應仿效的對象；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天皇制意識形態令溥儀倍感欽羨。於是，在溥儀訪日的過程中，便一再表示對日本維護文化、傳統的肯定與敬意，而「先進國」日本的形象便不斷出現在媒體宣傳上，從另一個層面形塑了兩國間的次序。「日滿親善」的圖像在媒體上大肆傳播的同時，兩國之間關係的實像也隱約地浮現出來。

<sup>84</sup>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頁 263。

<sup>85</sup> 浜口裕子，《日本統治と東アジア社会：植民地期朝鮮と満洲の比較研究》（東京：勁草書房，1996），頁 112-114。

溥儀對於〈回鑾訓民詔書〉的重視與干預，顯露出他希望透過此次訪日以及對天皇權威的轉引提升本身政治實力的意圖。但若觀察〈回鑾訓民詔書〉發佈之後在大眾媒體上的傳佈情況以及其他滿日高官對詔書意旨的轉譯、詮釋，溥儀圍繞著詔書實行的政治操作顯然沒有什麼作用。而一般人民似乎也並未由此意識到皇帝權威的存在。於是最後，這份詔書反而成為關東軍強化本身在滿洲國支配地位的理論基礎的一部份。自此之後，日本對於滿洲國的掌控逐漸強化，直至 1945 年這個國家隨著日本的戰敗而終結。

**滿洲國皇帝陛下御來訪紀念繪葉書**

☆

(入ウトラ組一枚二) 錢二料送 錢十 組一 價 費

明 說 書 葉 繪 念 記

(黃 黑 白 青 赤) 旗々國洲滿 は枚一

金は廓輪 副ブイタロコは像帝御の下陸帝皇 内形圓楕  
。色櫻は花櫻 し出浮の銀は鳳凰 し出浮の  
其 色藍は譜曲 赤てに陽太は國 色藍は海 金は廓外 は枚一  
てに金は國 緑葉は葉 緑薄は葉の葉高 色水は下上の  
。し出浮

(日五十二月三賣發)

友邦善隣を象徵せる意匠の精  
印刷の美斷じて他の追隨を許さず

東京市麹町區大手町逓信省内  
財人 遞 信 協 會  
電話九ノ内(二)七二〇番

トーパデ各内市  
キガハエ名有及  
す賣發にて店

**滿洲國皇帝陛下奉迎畫報**

四月特輯號盛裝して出づ(一冊50錢送2錢)

滿洲國皇帝陛下御近影數種を謹載……  
玉座・皇后陛下・溥傑・潤麒氏等御近影數種  
御大禮關係被服其他の調製品畫帳……  
滿洲國政府諸大臣扈從者畫帳……  
滿洲帝國陸軍の活況と江防艦隊グラフ……

▲▲▲▲▲

各顯官の筆蹟と建國史を語るグラフ……  
我が陸海軍大臣及大實業家の奉迎の辭……  
各顯官の奉送の辭と陛下の日常御生活記事……  
溥傑・潤麒兩氏の御日常を語る……  
皇帝陛下御生立秘史と建國重要日誌……  
數百圖の寫眞挿入の紀念畫帳出づ!

▲▲▲▲▲

東京市日本橋區吳服橋 平凡社 發賣  
九三六九二東京替振

東京市麹町區 陸軍畫報社發行  
ルビ坂大町華内

圖 3-1(上): 遞信協會,「滿洲國皇帝陛下御來訪紀念繪葉書」廣告(《朝日新聞》, 昭和 10 年 3 月 22 日夕刊第二版)。

圖 3-2(下): 平凡社,「滿洲國皇帝陛下奉迎畫報」廣告(《朝日新聞》, 昭和 10 年 3 月 23 日第六版)。



**友邦 皇帝 御來訪映畫**

**即夜 謹映**

料無場入

東京御出發〔本社〕二日夕六時

(荒天飛行不能の場合は三日夕七時より)

横濱東京御到着の光景 六日夕六時

東京公會堂 日本橋公會堂 泰山會館 在星屋講堂 牛込公會堂 下谷公會堂 淺草公會堂 本所公會堂 (二日のみ) 中野野方第五小學校 (同上) 九段軍人會館 (特別大演説・松坂屋シムフオニ) 六日のみ

◇日比谷映畫劇場、淺草富士館その他市内十一館でも同時上映◇

**東京朝日新聞社**

**友邦 皇帝 御來訪映畫 第二報**

**即夜 謹映**

料無場入

横濱御着、帝都御入京〔トキ〕

九段軍人會館 特別演説 松坂屋シムフオニ

横濱開港記念館 日本橋公會堂 淺草公會堂 下谷公會堂 牛込公會堂 在星屋講堂 青山會館 以上午後六時より

外に川崎、横浜、川口、大宮、浦和、蕨、千歳、市川各市は即夜上映其他の東京全市は七日より九日までにて連続

【同時上映】日比谷映畫劇場、浅草、馬場、早稲田、芝、大井、深川、本所各富士館 御田、上野、神樂坂、四谷金目高座、鏡院、三友館、キネマハウス、赤坂帝國館、成子二館、星橋松竹館、第一、二、三、入谷金美館、王子レコード館、五ノ橋電氣館、高島屋、甲子館、千住新橋館、三山館、大橋館、東武館、五反田館、勝田電氣館、東横館、大森劇場、新井キネマ、蒲田電氣館、オデオン座、朝日座、世英館、神奈川電氣館、川崎館、蒲田館外十五館

**東京朝日新聞社**

圖 3-3 (左)、圖 3-4 (右)：朝日新聞社「友邦皇帝御來訪映畫」影片公映廣告  
(《朝日新聞》，昭和 10 年 4 月 2 日第十一版；4 月 6 日第十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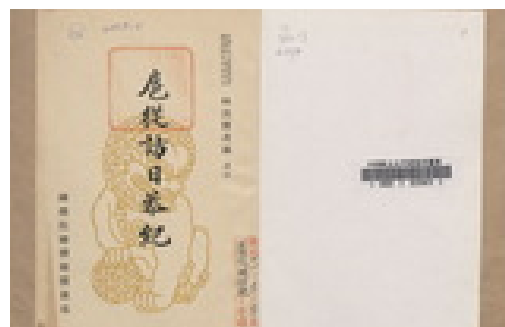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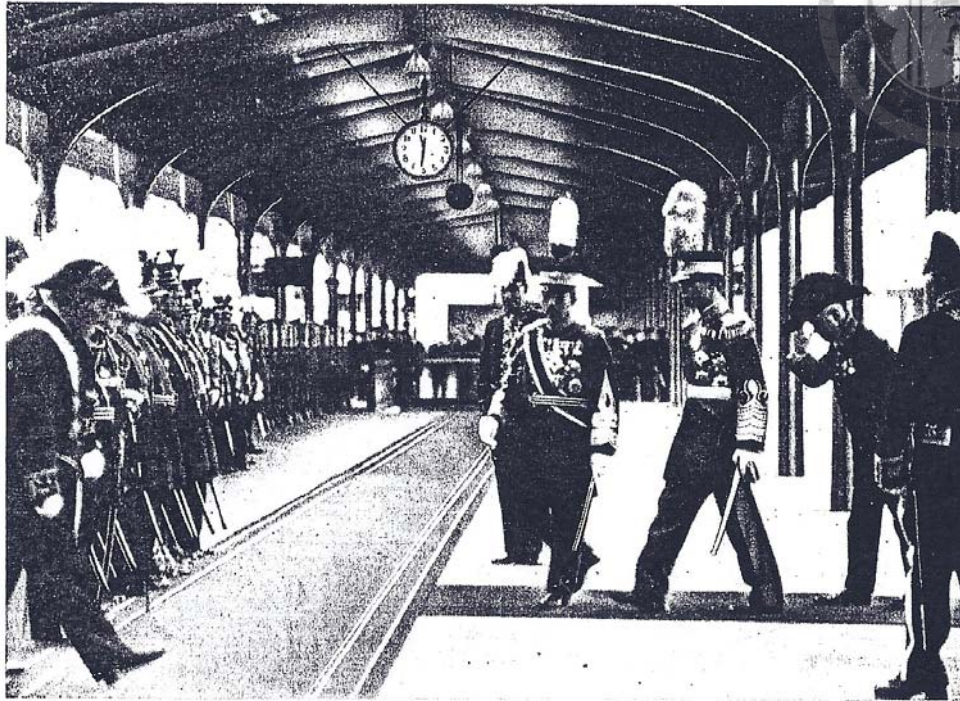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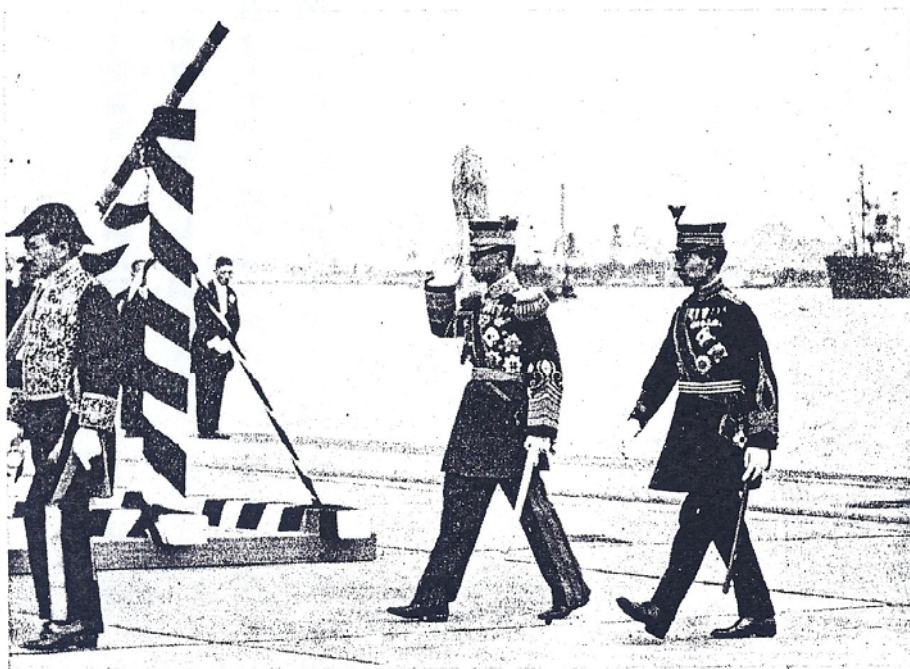


圖 3-5 (左)  
大連西川商店「海軍人牌香煙」廣告，  
《盛京時報》(康德 2 年 4 月 26 日)  
圖 3-6 (上)  
《扈從訪日恭記》書影。



もく畏 着御驛京東分十三時一十前午 日六  
るさば遊へ迎出御 下陸皇天 本日



るさば遊陸上御に濱横れらせさけ受へ迎出御の下殿宮父秩 日六

圖 3-7

上：溥儀在東京車站接受裕仁天皇歡迎。下：秩父宮親王迎接溥儀在橫濱碼頭登岸。《扈從訪日恭記》，頁 43。



圖 3-8

〈滿洲國皇帝陛下奉迎歌〉，《朝日新聞》（昭和 10 年 3 月 9 日第十三版）

文部省では「滿洲國皇帝陛下奉迎歌」を創作、東京音楽學校で作曲、八日午後發表された

一、大陸の風もしづまり  
時は春、空もうららかに  
われら今、ああ嬉しくも  
迎へまつる、滿洲國皇帝陛下ト

二、蘭かをる花の御旗に  
日章旗、光交へて  
まのあたり、ああ尊くも  
迎へまつる、滿洲國皇帝陛下ト

三、新興の國の榮は  
東洋の、平和のもと  
今日ここに、ああめでたくも  
迎へまつる、滿洲國皇帝陛下ト

♩ = 116

一 タ イ リ ク ノ カ  
ゼ モ シ ツ マ リ ト キ ハ ハ ル ソ  
ラ モ ウ ラ カ ワ レ タイ マ  
ア カ レ シ ク モ ム カ ヘ マ ツ ル マン  
シ ク コ ク クウ タイ ヘ イ カ

歌詞翻譯：

大陸之風也沈靜/時值春陽，日和天青/我等現今，啊啊，如此歡欣/奉迎滿洲國皇帝陛下  
綴着蘭花的御旗/日章旗之光交相輝映/眼前所見，啊啊，如此崇敬/奉迎滿洲國皇帝陛下  
新興之國的榮光/是東洋和平之基/今日在此，啊啊，如此喜氣/奉迎滿洲國皇帝陛下

表 3-1 1935 年溥儀訪日行程略表

日期	地點	行程
4 月 2 日	新京 大連	06:30 乘車前往大連 17:30 抵大連，登上御召艦「比叡」，拔錨啟航。
3 日 ～ 5 日		航海。
6 日	橫濱 東京	10:35 於橫濱港登岸。乘車前往東京。 11:30 抵東京，在車站接受天皇歡迎。 11:41 乘車赴皇宮拜會天皇。 15:40 天皇赴赤阪離宮回訪溥儀。接受天皇贈勳。 18:20 溥儀再度入皇宮回訪天皇。國宴。
7 日	東京	09:40 參拜明治神宮。 11:00 赴大宮御所拜見入江皇太后。 11:30 參拜靖國神社。 16:50 接見皇太后答訪使者。 18:30 設宴款待秩父宮等皇室成員。 20:30 於赤阪離宮露臺觀閱花車遊行。
8 日	東京	09:40 接見日本首相岡田啟介等文武官員。 11:28 巡幸滿洲國駐日公使館。公使館奉迎式。 15:30 赴表町御殿會見秩父宮親王。 18:30 前往首相官邸，赴日本政府晚宴。
9 日	東京	09:40 赴代代木練兵場與天皇校閱部隊。 12:30 赴濱離宮出席宮內府主辦園遊會。 18:30 首相及以下文武官員赴赤阪離宮，溥儀賜宴。
10 日	東京	15:30 赴歌舞伎座，出席東京市政府主辦奉迎會。 18:30 秩父宮、高松宮、澄宮三位親王赴赤阪離宮拜會溥儀。
11 日	東京	09:10 乘火車前往八王子，參謁多摩御陵。 20:00 於赤阪離宮露臺觀閱學生遊行。
12 日	東京	休養日。參觀設於赤阪離宮內的帝室博物館。
13 日	東京	10:02 赴湯島聖堂參訪。 11:34 赴陸軍第一衛戍醫院慰問傷兵。 15:00 再度赴大宮御所拜見皇太后。 17:00 於赤阪離宮分別單獨接見日本文武官員二十三人。
14 日	東京	12:20 入皇宮向天皇拜別。午宴。

		14:33 天皇赴赤阪離宮向溥儀拜別。 15:15 秩父宮親王赴赤阪離宮向溥儀拜別。 18:00 設宴款待日方接待人員。
15 日	東京 京都	09:12 前往東京車站，乘車赴京都。秩父宮及以下皇室成員在車站送行。 18:01 抵京都。接受當地文武官員以及市民代表歡迎。
16 日	京都	09:40 參謁桃山御陵。 15:00 參閱京都市學童遊行。
17 日	京都	10:38 參觀京都御所。 15:00 出席京都府主辦奉迎會。
18 日	京都	10:00 參觀二條離宮、金閣寺。 17:00 接見京都府知事等當地文武官員。
19 日	京都 奈良	10:00 乘車前往奈良。 11:00 抵奈良。 13:50 參觀正倉院。 19:30 參閱奈良市學童遊行。
20 日	奈良	10:00 參觀東大寺。 10:43 參觀奈良帝室博物館。 14:35 參拜春日神社。並參觀奈良縣公會堂。
21 日	奈良 大阪 神戶	10:00 乘車前往大阪。 10:50 抵大阪。 11:02 赴大阪公會堂出席奉迎午餐會。 13:20 赴大阪車站，乘車前往神戶。 14:15 抵神戶。前往武庫離宮。
22 日	神戶	休養日。下午接見皇太后特使。
23 日	神戶	09:03 登上御召艦，拔錨啟航。
24 日	廣島	11:00 在廣島灣投錨停泊，於艦上接見當地文武官員。 14:25 在廣島登岸，參拜巖島神社。 16:00 回到艦上，接見接待委員長林權助男爵。 20:07 拔錨啟航。
25 日 ~26 日		航海。
27 日	大連 新京	06:40 抵大連。乘車回新京。 17:50 抵新京。

## 結論 滿洲國歷史重構的嘗試



### 滿洲國的「前半生」

1945 年 8 月 17 日，日本宣佈向盟軍投降、大戰結束兩天後，自首都新京出亡的溥儀在通化大栗子溝的臨時行宮宣讀了〈退位詔書〉。三天後的 8 月 20 日，溥儀在亡命日本途中，於瀋陽被蘇聯軍俘虜，並自此展開了他的戰俘與「改造」生涯。滿洲國的歷史至此宣告終結。

在戰後的主流歷史敘事中，滿洲國經常被視為一個傀儡國家，而被冠上「偽」國的稱號。毫無疑義地，滿洲國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政策下的產物，它的形成是關東軍將校們的野心和謀略下的結果。隨著全面戰爭的爆發，滿洲國與此間三千餘萬居民亦捲入了大戰的漩渦之中，支持日本戰爭機器的運作。在滿洲國內，當地人民也對這個國家機器的作為有著各自的回應方式，消極合作者有之，積極反抗者亦有之。而戰爭的結束與滿洲國的崩解並不意味著歷史的蓋棺論定，滿洲國在歷史上殘留的種種遺緒對戰後東亞地區的歷史發展產生許多影響。歷來對於滿洲國歷史定位與評價問題的爭論一直持續著；而諸如戰爭遺留孤兒等問題，其餘波至今猶存。

曾經歷過滿洲國時期的歷史當事人對於這個國家有著種種看法。許多曾在滿洲國政權統治下生活的人們對於這個政權有著極為負面的評價，視之為日本支配、侵略中國的道具，並批判它對當地人民的壓迫、剝削和造成的歷史創傷。從戰後的一些回憶記敘來看，許多歷史當事人對於滿洲國政權毫無認同、忠誠之意，對於滿洲國後期的各種「大東亞聖戰」政治宣傳也極為反感，痛恨日本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也不滿現實社會中存在於日本人與當地人之間的不公平待遇。這類對日本以及滿洲國政權的激憤可見於社會的各個角落。

反抗意識也出現在受國家特別栽培的青年人身上。以培養菁英人才為其任務的新京「建國大學」（簡稱「建大」），雖然號稱是滿洲國首屈一指的高級學府，受到國家特殊的照顧，但建大的學生卻前仆後繼地投入了「反滿抗日」的行列。在數次的逮捕行動中，許多建大的「滿系」學生或被捕入獄，或前往重慶、延安

參與抗戰。<sup>1</sup>而在這些學生生活的許多細節當中，也反映出對於他們當時滿洲國社會的實況的憤慨與對於祖國的嚮往。例如建大學生劉謙第回憶他初次前往建大應試入學的情景：

到建大後，四期生負責招待我們……蹩腳的是吃飯前要默禱，無人肯做。負責招待四期的學生劉萬堂對大家說：「為什麼不默禱？不要以為這是他們的規矩，咱們祖國也默禱，還是默禱吧。」這使應考學生受到很大震動，因為在大庭廣眾之中說「他們」、「祖國」這些詞，對我們這些國高生來說不但陌生，簡直是可怕。<sup>2</sup>

除了「滿系」學生流露出的種種不滿情緒以外，建大許多日本學生也在求學過程中逐漸發現到滿洲國社會、政治的實況；他們有不少人與學生建立相當的情誼，甚至對這些參與抗日運動的中國學生抱持同情之意。<sup>3</sup>

從這些記載來看，不難發現滿洲國政權的不得人心。隨著戰爭的擴大與戰況漸趨不利，日本也日漸強化對帝國域內各地方的人力、物力動員，滿洲國作為日本帝國重要的原料供應與後勤基地，在這樣的時局下自然也受到了相當大的經濟剝削與衝擊。另一方面，中國民族主義意識也從未因滿、日當局的思想教育與宣傳工作而消退，反而隨著戰爭的激化而愈發昂揚。

山室信一指出，滿洲國國家形成的過程中，建立了完整的「支配機構」；但即使當局在「國民統合」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國民意識卻並未隨著制度的形成建立起來。一般人民感受到的不是「民族協和」，而是體制的不平等與虛偽。<sup>4</sup>生活在滿洲國境內的人們，並沒有產生「滿洲國民」的國民意識。山室氏嚴厲批評滿洲國「民族協和」口號的「實相與幻象」，對滿洲國日本人自我中心的民族觀作

<sup>1</sup> 根據參與抗日活動遭被捕入獄的建大學生趙洪事後所作的記述，建大參與抗日活動的中國學生有三類：被捕入獄者、逃亡關內參與抗戰者以及在校內以各種管道從事抗日宣傳者，總數約有七、八十人。見水口春喜著，董炳月譯，《「建國大學」的幻影》（北京：昆侖出版社，2000），頁 44-45。

<sup>2</sup> 劉謙第，〈我所認識的偽滿建國大學〉。收入水口春喜著，董炳月譯，《「建國大學」的幻影》附錄，頁 184-185。

<sup>3</sup> 根據劉謙第的回憶，1942 年日本憲兵隊對建大的反日學生進行整肅時，曾有日本學生向中國學生通風報信；更有一些日本學生主動前往獄中探視遭逮捕的同學。見氏著，〈我所認識的偽滿建國大學〉。

<sup>4</sup> 山室信一，《キメラ—満洲国の肖像（増補版）》（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4），頁 298-299。

出批判。<sup>5</sup>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歷史當事人主張不應否定滿洲國「建國」時的正面意義，認為日本在滿洲的經營對當地的現代化有所貢獻；而滿洲國「團結東方抵禦西方」的「建國精神」，在歐美帝國主義大舉侵略東方的歷史背景下有其時代意義。此外，日本人在滿洲國的經營經驗，對於戰後日本的重建、經濟發展也有相當的助益。中、日主流學界對於這樣的見解多半採取批判態度，駁斥這類觀點為日本軍國主義辯護的意圖。

近年來有些研究對於滿洲國的建國理念、意識形態以及其實踐進行了詳細的討論。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在他的研究中系統性地檢視了滿洲國建國前後日本「亞細亞主義」意識形態的流變，以及官方意識形態對基層社會的滲透；他分析了滿洲國的婦女團體、宗教團體和少數民族研究文本，驗證這類團體對於滿洲國施行統治的作用。<sup>6</sup>杜氏認為滿洲國在這些實踐中形成了一種在理論上尊重域內各種文化傳統的「多元民族主義」（multinationalism），進而產生了一種「東亞近代性」（the East Asian modern）下的跨國族認同，並由此確立國家的主權，但這一跨國族認同卻在戰爭當中逐漸異化，最終隨著國家的滅亡而消散。<sup>7</sup>

杜贊奇認為滿洲國的締造與實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超越民族國家框架的理想性，但這一理想性在中國與日本的國族主義對抗當中失去了發展的契機而消亡。這樣的觀點自然頗有爭議性，如陳永發便批評杜贊奇將焦點放在滿洲國的各種政治文宣上，太過強調滿洲國的締造者們（主要是日本人）塑造的種種理念，而忽視了這些理念在實際上如何運用，也未充分討論當時在滿洲國治下的居民對這些理念的看法。<sup>8</sup>

杜贊奇的研究以及陳永發對其的批評體現了滿洲國史研究的兩個重要問題。首先，滿洲國的肇建確實有著理念性的脈絡，亦即東亞各民族團結一致對抗西方帝國主義入侵，並發揚東方固有文化傳統、道德價值，以抗拒西方文化、價值觀在東亞的散播。在這裡，亞細亞主義以及以此基礎重構的東亞傳統道德、文化論述的思想脈絡為滿洲國的形成提供了理念、論述資源，但這樣的資源是如何

<sup>5</sup> 山室信一，《キメラ—満洲国の肖像》，頁 278。

<sup>6</sup>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4).

<sup>7</sup>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p. 253.

<sup>8</sup> 陳永發，〈關於滿洲國之建構〉評文一，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4 期（臺北：2004.6），頁 177-184。



在歷史上被運用？而理念的論述與實踐之間又是否存在落差？

第二個問題在於對滿洲國早期歷史重新書寫的嘗試。滿洲國建國理念的崩塌來自 1930 年代後期中日衝突局勢的升高，以及戰爭期間日本軍政當局對滿洲國控制的強化。目前已有許多研究者注意到，滿洲國歷史以實施帝制和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為轉折點，原本的王道主義建國理想在此時期產生質變。駒込武考察了九一八事變以降滿洲國「王道主義」思想的形成與演變過程，他認為滿洲國初期詮釋王道主義的思想資源主要來自儒家傳統下對建構「禮教國家」的想像；而在 1935 年以後，日本天皇制意識形態導入滿洲國，引發了這個國家本質上的變化。<sup>9</sup>駒込氏指出，王道主義、民族協和理念的形成本是要對抗中國國族主義，但在這些理念與日本國族主義以及帝國擴張戰略的需求產生齟齬時，便難以存續下去了。於是最後必須導入天皇制意識形態，解消王道主義的影響，以將滿洲國「統合」進日本帝國的支配體系。<sup>10</sup>在他看來，1940 年代滿洲國的「日本化」、「殖民地化」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完成的。

駒込武鉅細靡遺地重建了滿洲國國家意識形態的轉型過程，而這一意識形態的轉型在現實上則意味著滿洲國後期日本人在政治、經濟上支配力量的全面強化。滿洲國就在這樣的發展態勢下，在其「後半生」逐漸在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等層面上淪為日本的禁臠，而這也就構成了今日對滿洲國歷史的主要想像。至此，值得深思的問題在於，滿洲國的「前半生」又呈現出怎麼樣的圖像呢？

## 滿洲國的內在矛盾

當前對於滿洲國的印象，相當部分來自於幾個方面：九一八事變時關東軍對東北各地發起的侵略行為、滿洲國「建國」前後關東軍的策動，以及滿洲國中後期明目張膽的經濟剝削與種族差別待遇。在這樣的敘事結構下，1934 年帝制建立前後的滿洲國歷史有著一些曖昧未明的地方。杜贊奇和駒込武的研究，是在探究滿洲國早期意識形態形成、演變與實踐，也可以視作由意識形態層面重新建構滿洲國早期歷史圖像的嘗試；而本研究的目標，則是希望能夠補充在杜氏和駒込氏研究中隱而未顯的當地人民的視角。

<sup>9</sup> 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頁 271。

<sup>10</sup> 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頁 281。

杜贊奇的研究，將重點放在民族協和的意識形態如何透過協和會以及各種民間社團、宗教組織在社會上發揮影響。駒込武的研究，則著重於討論日本文化人、官僚在滿洲國王道主義意識形態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此外，駒込氏也提醒讀者，滿洲國的政治制度設計以及帝制的成立，是王道主義實踐的一部份，也是必然的發展結果。

本研究以滿洲國以及其皇帝制度形成過程為切入點，試圖討論滿洲國的理念如何向當地社會滲透，並希望重建時人所認識到的滿洲國帝制圖像。本研究也希望能夠探討日本人所形塑、製造的種種理念、理論如何向滿洲當地人民傳述，以及其論述的手段、內容與理念本身的落差。若更進一步論之，本研究企圖以當時滿洲當地人所接觸的相關論述為分析對象，梳理、重構 1930 年代前半滿洲國人民對於這個政權可能的認識，補充滿洲國的「前半生」歷史。

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激起了中國各地域、各階層的反日風潮；在事發的滿洲當地，也有許多人毅然投入反抗運動，與關東軍對抗；至於當地多數一般人民，則只能被動地接受滿洲國政權的成立。若仔細探究自九一八事變後到滿洲國「建國」前後見諸報端的各種報導，可以發現發起這場侵略行動的關東軍並沒有充分控制面向中國讀者的日資報紙《盛京時報》的言論走向。《盛京時報》雖然為關東軍的軍事行動辯護，批判中國當局與張學良政權的反日傾向，但對於滿洲獨立建國、擁立溥儀為元首，態度卻顯得相當保留。我們現在尚無法探知何以《盛京時報》採取這樣曖昧的立場，但可以推知的是，這樣的立場必然會對當時人對局勢的認知有所影響，也不利於滿洲國建國論述和溥儀作為元首的正當性的傳播。

從一些歷史當事人的回憶來看，滿洲國政權自始就不受當地人民歡迎，即使這個政權在一些復辟派、旗人社群裡有一些支持者，但許多東北人民對此政權抱持懷疑、反感的態度：

我記得幼時常聽到大人唉聲歎氣地說：「沒法子啊！當亡國奴啦！」也時常聽到大人們滿懷仇恨地咒罵日本侵略者為「日本鬼子」、「東洋鬼子」、「小鼻子」，咒罵那些賣身投靠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敗類是「洋奴」、「走狗」、「漢

奸」，對他們依仗日本人欺壓中國人，也常有人指斥他們是「嘍洋精」。<sup>11</sup>

儘管滿洲國建立後，當局一再透過各種管道論述滿洲獨立建國的正當性，但這類論述是否能有效對社會大眾散佈，而人們對這些論述的反應又如何，卻是令人深表懷疑的。

滿洲國初期的王道主義、民族協和理念之形塑，一方面是在回應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抗拒中國社會的排日風潮，建立滿洲國作為一多民族國家的論述；另一方面，也是在透過對傳統道德價值的呼喚，試圖建立一套有別於中華民國共和政體的國家制度，並且抗拒三民主義的意識形態。易言之，作為近代國家的滿洲國的形成，必須將「滿洲」從中華民族的歷史與國族論述中切離出來，也必須強調在政治制度上的優越性以及文化的正統性。<sup>12</sup>然而這些論述的實際運用情況，卻也透露出它的侷限。

從 1932 年建國到 1934 年帝制建立前後新聞傳媒所傳佈的宣傳訊息來看，除了王道主義、民族協和之類的口號之外，滿洲國當局（以及其支持者）大量利用了前清的歷史遺產作為溥儀的政治地位以及滿洲國政權正當性的論述資源。在許多政治宣傳文字中，溥儀作為「仁德」的愛新覺羅氏後裔、清朝的正統繼承者，是在當代實踐王道主義理想的不二人選。但這種論述的大行其道，也正提示了溥儀作為滿洲國元首的正當性與民意基礎實際上相當薄弱；更進一步言之，若滿洲國是一個相對於中國、自中國切離出來的概念，那麼將溥儀作為元首的正當性與清王朝的歷史聯繫起來的這種論述方式，毋寧是相當矛盾的。日本方面與溥儀等人對於即位儀典的意見的衝突，以及即位儀典中新舊、中日禮儀、符號雜陳的情況，也都反映了這樣的矛盾性。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許多溥儀的支持者，也將溥儀登極為滿洲國皇帝一事，看作是溥儀對於前清正統的繼承，或者將之與前清的復辟聯繫起來。更有甚者，滿洲國本身也被一些人視作清王朝的後身，如穆儒丐便將滿洲國的形成看作是滿族國家的復興。<sup>13</sup>這類見解與日本人意圖塑造的滿洲國國家論述自然多有相悖之

<sup>11</sup> 徐德源口述實錄〈我所經歷的奴化教育〉，收入齊紅深主編，《日本對華教育侵略：對日本侵華教育的研究與批判》（北京：昆侖出版社，2005），頁 112。

<sup>12</sup> 從滿洲國建立後有關「滿洲國史」的建構過程，便可一窺日本人意圖建立將滿洲與歷史上的中國切割的歷史論述。

<sup>13</sup> 然而必須提醒讀者的是，在滿洲國三千餘萬人口中，滿族所佔的比例相當低；相較之下，漢族則佔了絕對多數。於是可想而知地，這樣的見解在當時的滿洲恐怕不會是大多數人的立場。

處，也暗示了滿洲當地居民眼中的滿洲國，與日本人想像的滿洲國，在內涵上似乎並不完全相容。這類論述的取向，意味著當時人們如何接受這些建國理念、意識形態論述，並且如何建構出自身對於這個國家的想像。而這類論述在滿洲國的主流報紙上大行其道，則暗示我們在滿洲國初期，各方人士對於滿洲國這一國家的認識方式仍然莫衷一是。在滿洲國的例子裡，可以發現意識形態、政治理念在社會上的呈現與滲透方式和其本身內涵有時存在著落差。

溥儀即帝位後，於 1935 年首度出訪日本，並在回國後頒發〈回鑾訓民詔書〉，被公認為是滿洲國史上的重大事件。正如許多學者指出的，滿洲國自此展開了意識形態的轉型，政治上逐漸走向中央集權，日本的影響力也日益擴張。而也正如波多野勝所觀察到的，身為皇帝的溥儀希望能利用這個機會，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與權威。然而在爬梳溥儀訪日期間以及〈回鑾訓民詔書〉頒布前後見諸報刊的報導和宣傳文字後，可以發現在當局大肆宣揚日滿親善友好的圖像的同時，滿日兩國之間的次序關係也被確立下來，並且向民間傳播。在這樣的情況下，溥儀藉由發展與日本關係確立自身政治地位、提升聲望的嘗試，似乎並未達成什麼效果。

成立帝制是滿洲國史上重大的政治變遷，當局的宣傳也將其形容為極具歷史意義的重要事件，極力闡述其重要性與象徵意義。但在各種宣傳文字中，可以發現許多和官方宣揚的理念與意識形態有所扞格的内容。《盛京時報》這類媒體在當時尚未受到國家直接的控制，但仍可想見其立場不致與官方衝突。於是應可推知，官方的宣傳策略可以因應民眾的意向而有所妥協，以民眾可能較為認同的論調進行宣傳活動。此外應也可推知，當局意識到其政權的支持者與同情復辟的人士多有重疊，並認為這可能是滿洲國政權爭取當地人民認同的切入點。那麼這樣的策略是否也暗示了滿洲國政權終究難以倚靠其揭櫫的王道主義、民族協和理想，凝聚滿洲國內人民的向心力，而不得不借用前清的歷史遺產塑造其正當性？然而在清朝覆亡二十餘年後，對「大清盛世」的呼喚又真能喚起民眾的廣泛認同嗎？

## 追尋「滿洲國」

本研究的初衷，是在思考如何由一般人民的視角來理解滿洲國的歷史；此

外，也期望能透過對報刊資料的考察，思考歷史上的滿洲國與時人對於所處局勢、環境的認識如何聯繫起來。更進一步言之，本研究期望能從一個較少人關照的角度和取向，探討滿洲國這個國家的實質。

滿洲國作為日本帝國的一部分，其特殊之處或許在於這個國家的塑造並不只出自日本人的擘劃，一些中國人也對滿洲國意識形態與建國理念的形塑有著極大的影響；而至少在建國初期，曾經有過一些實踐這些理念的嘗試。就這個層面來說，滿洲國確實有著相較於其他日本殖民地的特殊性；它的歷史是一段具有實驗性質的國家建構過程。那麼，為什麼它最終未竟其功呢？

滿洲國在關東軍的運作下橫空出世，數以萬計的日本人參與其中，本地三千餘萬居民也捲入其中。對於當地人民來說，滿洲國的出現並不必然意味著認同的萌發。關東軍的謀略和武力固然催生了這個國家，但其操弄謀略的方式卻也暴露出滿洲國作為日本帝國主義經略亞洲大陸的基地的性質。滿洲國的失敗是無可避免的，儘管它的建立與發展過程確實有其理想性，但自從它建立以來，帝國主義的陰影卻始終飄散不去。這也就註定它無法得到當地多數人民的認同。

然而綜觀滿洲國的歷史，仍可看見尚有許多值得探討、深思的問題，殖民地近代化的取向或許不失為一個可行的切入點。正如前文所述，滿洲國同時兼具了新的近代民族國家以及傳統中國帝國的性質；日本軍政當局、財閥資本對於滿洲國政治、經濟、社會各層面的滲透，一方面在滿洲試圖排除傳統因素的影響，建立起具備近代民族國家性質的框架，一方面也透過這一過程將滿洲國整合為殖民帝國的一部份。這樣的國家建構實驗固然隨著日本帝國的瓦解而煙消雲散了，然而這段歷程又是如何影響往後的歷史發展呢？

在戰爭結束後，東北地區隨即又捲入了國共內戰的格局；昔日的滿洲國疆域成為了內戰的主戰場，中國共產黨則經由自身的苦心經營以及蘇聯的支持在這個區域站穩了腳步，進而席捲中國全境。在這段抗戰、革命的歷史敘述中，東北地區的歷史被鑲嵌進中國共產革命的歷史脈絡之下，成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建構國家認同、國族歷史意識的重要養分。從九一八事變到共產黨政權的興起，發生在這二十年間的故事為生活在當地的三千餘萬居民帶來的衝擊之劇烈不言而喻。值得深思的是，在戰後的數十年間，滿洲國經驗是如何影響著當地人的歷史認識？而新興的人民共和國政權對於這些經驗和歷史遺產，又是如何加以敘述、揉合、甚而加以解消？這些複雜的問題尚有待有識者的研究、釐清。而對於這些

問題探討，應該也能提供我們另一個視角，思考包括臺灣在內的殖民地的種種歷史問題以及去殖民、後殖民議題吧。

總而言之，透過這篇研究，我們可以發現當地人對於滿洲國的認識方式、抱持的情感和態度，都不會是單一同質的。若能夠對當時人們看待滿洲國的視角行更細緻的梳理，當更可以思考、理解這個國家以及歷史上「滿洲國人」的生命歷程在近代歷史的意義。而對於滿洲國歷史的追尋，應該也可以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國家」能夠以什麼樣的形式「創出」，而身在其中的「國民」又能如何與「國家」建立連結。希望本研究的嘗試，能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有所貢獻。

全文完

## 徵引書目



### 原始文獻

#### 報紙、期刊

《申報》  
《朝日新聞》  
《盛京時報》  
《滿洲國政府公報》  
《滿蒙》

#### 時人著作、回憶

中保與作，《滿洲國皇帝》。東京：日本評論社，1935。收入東北亞研究所編《滿蒙地理歷史風俗誌叢書》第165本，首爾，景仁文化社，1997。

中島比多吉等，《聖德記述纂要》。收入吉林圖書館偽滿洲國史料編委會編，《偽滿洲國史料》第一本，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2。

矢野仁一，《滿洲國歷史》。東京：目黑書店，1933。

沈瑞麟，《皇上乾德恭記》。收入吉林圖書館偽滿洲國史料編委會編，《偽滿洲國史料》第一本，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2。

林出賢次郎，《扈從訪日恭紀（改訂版）》。新京：滿洲帝國國務院總務廳情報處，1936。收入東北亞研究所編《滿蒙地理歷史風俗誌叢書》第145本，首爾，景仁文化社，1997。

和泉誠一，《滿洲國皇帝陛下》。東京：二松堂書店。收入東北亞研究所編《滿蒙地理歷史風俗誌叢書》第150本，首爾，景仁文化社，1997。

金毓黻，《靜晤室日記》。瀋陽：遼瀋書社，1993。

鄭孝胥，《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北京：群眾出版社，1964。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北京：群眾出版社，2007。

#### 其它出版品

文教部印刊，《普及建國精神之教育資料第一集》  
文教部印刊，《普及建國精神之教育資料第二集》

#### 政府檔案、史料彙編

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東京：外務省。

國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 網路資料庫。

小林龍夫、島田俊彦編，《現代史資料 7・満洲事変》。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

小林龍夫、島田俊彦、稻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 11・続満洲事変》。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

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編，《九一八事變》，收入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北京：中華書局，1988。

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編，《東北「大討伐」》，收入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

劉維開編，《國民政府處理九一八事變之重要文獻》。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2。

## 近人論著

中、日文部分

專書

山室信一，《キメラ——満洲国の肖像(増補版)》。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4。

王向遠，《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學者、文化人的侵華戰爭》。北京：昆侖出版社，2005。

中田整一，《満洲国皇帝の秘録：ラストエンペラーと「厳秘会見録」の謎》，東京：幻戲書房，2005。

水口春喜撰，董炳月譯，《“建國大學”的幻影》。北京：昆侖出版社，2000。

半藤一利，《昭和史（1926-1945）》。東京：平凡社，2004。

田中隆一，《満洲国と日本の帝国支配》。東京：有志舎，2007。

伊藤之雄，《昭和天皇と立憲君主制の崩壊》。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5。

曲鐵華、梁清，《日本侵華教育全史第一卷（東北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李相哲，《満洲における日本人経営新聞の歴史》。東京：凱風社，2000。

吳素惠，《盛京時報之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波多野勝，《昭和天皇とラストエンペラー：溥儀と満洲国の真実》。東京：草思社，2007。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2009。

林明德，《近代中日關係史（修訂二版）》。臺北：三民書局，2005。

易顯石等，《九一八事變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1。

東北淪陷十四年史總編室、日本殖民地文化研究會編，《偽満洲國の真相——中





- 日學者共同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 洪嵐，《南京國民政府的國聯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 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
- 姜念東等，《偽滿洲國史》。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 馬越山，《九一八事變實錄》。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
- 梁敬錚，《九一八事變史述》。紐約：聖若望大學亞洲學院、中美文化公司，1964。
- 齊紅深編，《日本對華教育侵略：對日本侵華教育的研究與批判》。北京：昆侖出版社，2005。
- 貴志俊彦，《滿洲国のビジュアル・メディア》。東京：吉川弘文館，2010。
- 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 解學詩，《偽滿洲國史新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滿洲国史編纂刊行會編，《滿洲国史・総論》。東京：財団法人滿蒙同胞援護會，1970。
- 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
- 戦前期官僚制研究会編、秦郁彦著，《戦前期日本官僚制の制度、組織、人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1。
- 浜口裕子，《日本統治と東アジア社会：植民地期朝鮮と満洲の比較研究》。東京：勁草書房，1996。
- 藤原書店編集部編，《満洲とは何だったのか(新装版)》。東京：藤原書店，2006。

#### 論文、書評

- 伊藤之雄，〈昭和天皇と立憲君主制〉。收入伊藤之雄、川田稔編，《二〇世紀日本の天皇と君主制——国際比較の視点から 一八六七～一九四七》，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
- 沙培德（Zarrow, Peter），〈溥儀被逐出宮記：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文化與歷史記憶〉。收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2002。
- 李玉敏，〈《盛京時報》關於「九一八」事變報導評析〉。《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年第3期，北京。
- 長井裕子撰、莎日娜譯，〈滿族作家穆儒巧的文學生涯〉。《民族文學研究》2006年第2期，北京。
- 周婉窈，〈歷史的統合與建構〉。收入氏著，《殖民地與海洋臺灣論集》。臺北：聯經出版，2012。
- 原武史，〈「国体」の視覚化——大正・昭和初期における天皇制の再編〉。收入

岩波講座《天皇と王権を考える 10・王を巡る視線》。東京：岩波書店，2002。

陳永發、沙培德（Zarrow, Peter），〈關於滿洲國之建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4 期，2004 年，臺北。

樋口秀実，〈満洲国皇帝制度の成立と皇帝即位儀礼〉。《国史学》第 200 号，2010 年 6 月，東京。

#### 英文部份

Duara, Prasenjit,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4.

Mitter, Rana,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Shao, Dan, *Remote Homeland, Recovered Borderland: Manchus, Manchukuo and Manchuria, 1907-1985*,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Young, Louise,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附錄



附件一 滿洲國、中華民國、日本年號與公曆年對照表

公曆	滿洲國	中華民國	日本
1927	--	民國 16 年	昭和 2 年
1928	--	民國 17 年	昭和 3 年
1929	--	民國 18 年	昭和 4 年
1930	--	民國 19 年	昭和 5 年
1931	--	民國 20 年	昭和 6 年
1932	大同元年 <sup>1</sup>	民國 21 年	昭和 7 年
1933	大同 2 年	民國 22 年	昭和 8 年
1934	大同 3 年/ 康德元年 <sup>2</sup>	民國 23 年	昭和 9 年
1935	康德 2 年	民國 24 年	昭和 10 年
1936	康德 3 年	民國 25 年	昭和 11 年
1937	康德 4 年	民國 26 年	昭和 12 年
1938	康德 5 年	民國 27 年	昭和 13 年
1939	康德 6 年	民國 28 年	昭和 14 年
1940	康德 7 年	民國 29 年	昭和 15 年
1941	康德 8 年	民國 30 年	昭和 16 年
1942	康德 9 年	民國 31 年	昭和 17 年
1943	康德 10 年	民國 32 年	昭和 18 年
1944	康德 11 年	民國 33 年	昭和 19 年
1945	康德 12 年 <sup>3</sup>	民國 34 年	昭和 20 年

<sup>1</sup> 大同元年自 1932 年 3 月 1 日滿洲國建國起算。

<sup>2</sup> 康德元年自 1934 年 3 月 1 日滿洲國施行帝制起算，大同年號於同日起廢止。

<sup>3</sup> 康德年號於 1945 年 8 月 17 日，因滿洲國滅亡、皇帝溥儀宣告退位而廢止。



## 附件二 滿洲國建國宣言

想我滿蒙各地，屬在邊陲，開國縣遠，徵諸往籍，分併可稽，地質膏腴，民風樸茂；迨經開放，生聚日繁，物產豐饒，實為奧府。乃自辛亥革命，共和國成立以來，東省軍閥，乘中原變亂之機，攫取政權，據三省為己有，猖獗相繼，竟將二十年！很厲貪婪，驕奢淫佚，罔顧民生之休戚，一惟私利之是圖。內則暴斂橫征，恣意揮霍，以致幣制紊亂，百業凋零；且復時逞野心，進兵關內，擾害地方，傷殘民命，一再敗衄，猶不悛悔。外則蟻棄信義，開釁鄰邦，悉昧親仁之規，專取排外為事；加以警政不修，盜匪橫行，遍於四境，所至擄掠焚殺，村里一空，老弱溝壑，餓殍載途。以我滿蒙三千萬之民衆，託命於此殘暴無法區域之內，待死而已，何能自脫？

今者何幸，假手鄰師，驅茲醜類。舉積年軍閥盤踞、秕政萃聚之地，一旦廓而清之，此天予我滿蒙之民蘇息良機。吾人所當奮然興起，邁往無前，以圖更始者耳。惟是內顧中原，自改革以還，初則羣雄角逐，爭戰頻年；近則一黨專橫，把持國政。何曰民生？實之置死。何曰民權？惟利是專。何曰民族？但知有黨。既曰天下為公，又曰以黨治國，矛盾乖謬，自欺欺人。種種詐偽，不勝究詰。比來內閣迭起，疆土分崩，黨且不能自存，國何能顧？於是赤匪橫行，災祲洊告，毒痛海內，民怨沸騰，無不痛心疾首於政體之不良，而追思曩昔政治清明之會，直如唐虞三代之遠，不可幾及。此我各友邦共所目睹而同深感歎者也。夫以二十年試驗，所得其結果一至於此，亦可廢然返矣。乃猶諱疾忌醫，怙其舊惡，藉詞民意從新，未可遏抑。然則縱其所之，非淪至於共產以自陷於亡國滅種之地而不已。

今我滿蒙民衆，以天賦之機緣，而不力求振拔，以自脫於政治萬惡國家範圍之外，勢必戴胥及溺，同歸於盡而已。數月來幾經集合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東省特別區、蒙古各盟旗官紳士民，詳加研討，意志已趨一致，以為為政不取多言，只視實行如何；政體不分何等，只以安集為主。滿蒙舊時，本另為一國，今以時局之必要，不能不自謀樹立。應即以三千萬民衆之意向，即日宣告與中華民國脫離關繫，剏立

滿洲國。茲特將建設綱要，照布中外，咸使聞知。竊維政本於道，道本於天。新國家建設之旨，一以順天安民為主。施政必徇真正之民意，不容私見之或存。凡在新國家領土之內居住者，皆無種族之歧視、尊卑之分別。除原有之漢族、滿族、蒙族及日本朝鮮各族外，即其他國人願長久居留者，亦得享平等之待遇，保障其應得之權利，不使其有絲毫之侵損。並竭力鏟除往日黑暗之政治，求法律之改良，

勵行地方自治，廣收人材，登用賢俊。獎勵實業，統一金融，開闢富源，維持生計，調練警兵，肅清匪禍。更進而言，教育之普及，則當惟禮教之是崇，實行王道主義，必使境內一切民族，熙熙皞皞，如登春臺，保東亞永久之光榮，為世界政治之模型。其對外政策，則尊重信義，力求親睦。凡國際間舊有之通例，無不敬謹遵守；其中華民國以前與各國所定條約債務之屬於滿蒙新國領土以內者，皆照國際慣例，繼續承認。其有自願投資於我新國境內，創興商業，開拓利源，無論何國，一律歡迎，以達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實際。

以上宣布各節，為新國家立國主要之大綱。自新國家成立之日起，即當由新組之政府，負其責任，以極誠懇之表示，向三千萬民衆之前宣誓實行。天地照鑒，無渝此言。

大同元年三月一日

滿洲國政府



### 附件三 即位詔書

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

我國肇基，國號滿洲，於茲二年，原伏天意之愛民，賴友邦之仗義。其始凶殘肆虐，安忍阻兵，無辜籲天，莫能自振。而日本帝國，冒羣疑而不避，犯眾咎而弗辭，事等解懸，功同援溺，朕以藐躬，乃承天眷，假我尺柄，授我丘民，流亡漸集，興其謳歌，兵氣潛銷，化爲日月。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而生民有欲，無主乃亂，籲請正位，詢謀僉同，敢不敬承天命。其以大同三年三月一日，即皇帝位，改爲康德元年，仍用滿洲國號。世難未艾，何敢苟安？所有守國之遠圖，經邦之長策，當與日本帝國，協力同心，以期永固。凡統治綱要，成立約章，一如其舊；國中人民，種族各異，從此推心置腹，利害與共，無逾此言，有如皞日，無替朕命，咸使聞知。

御名御璽

康德元年三月一日

#### 附件四 回鑾訓民詔書



朕自登極以來，亟思躬訪日本皇室，修睦聯歡，以伸積慕；今次東渡，宿願克遂。日本皇室，懇切相待，備極優隆；其臣民熱誠迎送，亦無不殫竭禮敬。衷懷銘刻，殊不能忘。深維我國建立，以逮金茲，皆賴友邦之仗義盡力，以奠丕基。茲幸親致誠悃，復加意觀察，知其政本所立，在乎仁愛；教本所重，在乎忠孝。民心之尊君親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誠意爲國，故能安內攘外，講信恤鄰，以維持萬世一系之皇統。朕今躬接其上下，咸以至誠相結，氣同道合，依賴不渝。朕與

日本 天皇陛下，精神如一體。爾眾庶等，更當仰體此意，與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兩國永久之基礎，發揚東方道德之真義。則大局和平，人類福祉，必可致也。凡我臣民，務尊朕旨，以垂萬禩。欽此。

御名 御璽

康德二年五月二日

國務總理大臣

宮內府大臣